刘仲敬 著

安·兰德传

生平与思想

Ayn Rand

我发誓——
我永远不为他人而活
也不要他人为我而活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我感激安·兰德对我人生的影响。遇到她，我才开了窍。此前，我做工作都是凭经验、凭数字，从来没有以价值观为导向……兰德说服我正视人类，正视人类的价值观，正视价值观如何起作用，正视人类所做所想及其缘由。这远远超出我所学的经济模型范畴，令我大开眼界。安·兰德女士将我引至一个广阔的天地，从此，我闭上了妄言的嘴。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年少时读到了《源泉》，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主人公。

——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

我和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CEO聊天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他们的商业决策有很重大的影响，即使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兰德的所有观点。

——美国BB&T银行家约翰·阿里森

我是安·兰德的粉丝。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

在访谈中被问“如去无人荒岛只能带一本书”时，齐泽克如此作答：“那你肯定要吃惊了。书我会带安·兰德的《源泉》——关于一个疯狂的极端个人建筑师的经典小说。我知道你很难理解，但这就是生活。”

——欧洲著名左派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安·兰德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左翼知识分子领袖诺姆·乔姆斯基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100-10810-2

定价：38.00元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刘仲敬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 刘仲敬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0810-2

Ⅰ.①安… Ⅱ.①刘… Ⅲ.①兰德，A.（1905～1982）—传记 Ⅳ.①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9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安·兰德传：生平与思想
刘仲敬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810-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张 9¾　插页 4
定价：38.00 元



安・兰德（1905—1982）



童年安·兰德（右）和两个妹妹



少年安·兰德



青年安·兰德

序

我对安·兰德的哲学思想及其传播有兴趣，已经出版的安·兰德传记大多寓目，比较近出的兰登书屋版大部头传记也曾浏览一过。看得多了，常感遗憾。所见传记的作者无不是安·兰德的粉丝和崇拜者，真格是树碑立传。写作传记最常见的姿态是跪着写。传主的生平和思想具有强烈的魅力，尤其是安·兰德，其人及其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征服力，一般人很难抵挡。作者浸润其中，为之折服，崇拜之心油然而生，写着写着就跪了下去。溢美遮丑、曲解护短乃至强词夺理，在传记写作中屡见不鲜，几成常态。

自安·兰德的著作和思想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二十年，其读者和思想的认同者不计其数，可是，此前没有安·兰德的传记出版，就连译本也没有，这真令日益增多的安·兰德的读者遗憾。现在坊间终于有了一本安·兰德传记，以满足读者之需，实在令人高兴。查询网络书店，刘仲敬博士的这部著作确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安·兰德的传记，更

是第一部中国人写作的安·兰德传记。

最近十年，在中国年轻白领和商业人士当中，追捧安·兰德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安·兰德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她创建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哲学，迎合了在市场中打拼的人士的需要，更为广大的无爹可拼，只能在市场经济中靠个人奋斗的底层青年，提供了精神能量，因此刘仲敬博士的这本传记来得正当其时。

首先令我满意的是，刘博士不是安·兰德的粉丝，不是跪着写此传记，相反，刘博士把安·兰德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当作一个剖析对象，态度中立甚至冷峻。不仅不溢美，在刘博士如手术刀的笔下，安·兰德及其粉丝会有些尴尬。我相信，即便是粉丝，即便奉安·兰德为“教主”，读读这本基于客观与理性的传记，是有好处的，也符合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理性至上。

相比众多的英文传记作者，刘博士的英文文献运用能力丝毫不落下风，体现出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刘博士更有他们所不及之处，那就是知人论世的史家功力。比较而言，以刘仲敬博士对西方历史，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史更为熟稔。因此仅仅 10 万字篇幅，却

能将安·兰德置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观照；既可概览安·兰德的身世履历，又能感受安·兰德所处之历史大潮。这种阅读感受，在安·兰德的同类英文传记著作中鲜少获得。

作者结合安·兰德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揭示了东方犹太知识分子的生存法则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激情狂热特性，令人对安·兰德的基因谱系恍然大悟。这位浪人知识分子与苦寒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表象不同，实质却是一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面对这种深挖入穴的史家功夫，恁谁都无话可说。再如安·兰德的发迹与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关联，也是被忽视或者刻意回避而被传记作者道出的节点。

从学术或纯技术角度来讲，安·兰德的哲学是苍白的，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偏门。她看似自洽的逻辑，被主流不屑一顾，在知识的贡献上也乏善可陈。但我们都清楚，她是一位生活和社会的体验者，从中获得认知，形成观念，终生予以捍卫。她的哲学认识与生活价值观既同东方的集权专制传统相冲突，也不见容于西方的基督伦理，因此安·兰德更是一位苦斗的战士。如果我们解开安·兰德自己罗织的哲学面纱，聆听她个人生命的体验，更能够获得认同和

共鸣，实际上，读者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安·兰德为何有那么多知音和追随者。我和众多安·兰德的读者只是普通人，不是知识分子，身处圈外，并不在乎所谓哲学或学术，在乎的是，安·兰德讲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说的心声。她得以成名，得以吸引千万读者的，是她的两部巨无霸长篇小说。文学技术视为禁忌的大段大段观念陈述，恰恰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安·兰德头上戴有许多帽子，显然这些帽子不适合她，尽管这些帽子大都是她自己戴上的。另外，一个思想家不能完美践行其倡导之观念，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许多戒烟者还得益于老烟民的劝诫呢。因此尽管作者责之甚严，作为读者则宽以待之，重要的是各取所需。

刘仲敬博士的文笔老道，传记结构单纯清晰，夹叙夹议，一气呵成，读来轻松愉悦。篇幅不大，却包含丰富的知识量。作者和本书的编辑周媛媛对读者怀有体恤之心，大量的注释省却了查阅之苦，更是受益匪浅。作为读者，我对作者和编辑心怀感激。

汪　宇

2014年12月7日

目　录

序（汪宇）/ I

第一章　永远的试金石 / 1

第二章　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 19

第三章　“价值阶梯”的倒塌 / 35

第四章　现在和未来的先知 / 49

第五章　异乡异客 / 62

第六章　创造安·兰德 / 71

第七章　好莱坞的召唤 / 80

第八章　步入光荣之路 / 89

第九章　浪人知识分子在纽约 / 101

第十章　终极问题 / 112

第十一章　蛮族名将为罗马而战 / 124

第十二章　重返加利福尼亚 / 142

第十三章　个人主义与麦卡锡主义 / 154
第十四章　旧宗师与新门徒 / 166
第十五章　兰德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 / 180
第十六章　营造公共知识分子 / 194
第十七章　文化战争 / 206
第十八章　门派与宫廷 / 219
第十九章　王者的孤独 / 229
第二十章　安·兰德之后的兰德主义运动 / 240
第二十一章　安·兰德哲学及其思想史系谱 / 253
结　语　火与电 / 263

索　引 / 266
参考文献 / 272
附录一　安·兰德年谱 / 276
附录二　安·兰德著作目录 / 280
附录三　安·兰德语录摘选 / 292

第一章

永远的试金石

如果人生可以拥有主题歌的话，我相信每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一首。我的主题歌是一种宗教、一种迷念。它或许是一种狂热，又或许是个人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一切东西。我与那种迷念相伴而生，我不曾看到，并且我现在也不知道，一种更有价值、更被误解、看上去似乎更绝望、更可悲地匮乏的理想。但是，不妨称为宿命或嘲讽吧，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生存的国家。

——安·兰德自传草稿

Autobiographical Sketch，1936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1]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宪政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2]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3]的基础上。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月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4]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最贴切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就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夹缝。

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5]，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6]。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19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Alissa Zivovievna Rosenbaum］）在圣彼得

堡出生。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未能免俗，但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7]的自由意志主义[8]和戈德沃德[9]的保守主义[10]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说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就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称"狂热自由主义者"吗？狂热的清教徒、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的民主派、狂热的激进派、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种族主义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搞错？

确实有一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一种激进的——立宪派！当然，他们不在英语世界。他们在——神

圣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11]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俄罗斯，二月革命[12]的俄罗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侨民社区[13]。他们的自由不像英国人那样，充满了封建和特权的气息；不像美国人那样，充满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诚气息。他们的感情认同和政治修辞带有浓厚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这样描绘他们[14]：这些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更在意听众的欢呼，而不是纲领的实现。斯托雷平[15]政府徒劳地请求这些社会贤达接受大臣的职位，但他们对实际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他们面对驱散苏维埃和议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原先也是这么对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满意。）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16]在其回忆录《说吧，记忆》（*Speak, Memory*）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17]市侩精神，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18]）。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

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像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太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19]、曼德尔施塔姆[20]（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21]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22]能相信吗？）、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科克[23]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

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24]。他们

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兰德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她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

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

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却很可能除了“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彻底而正确的理论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接触圈外人。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

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10 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尤宁（Stoiunin）私立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合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Gippius）和哲学家罗斯基（Lossky）。两人都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尤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25]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他的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

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兰德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甫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像老爷一样过好日子。

兰德的文学生涯从10岁就开始了。和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26]、吉普林[27]和萨基[28]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作者[29]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和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和油墨未干的感觉。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童年时代的兰德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

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地位。萨文科夫[30]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

兰德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31]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32]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33]的虚伪性。主人公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中国“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

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34]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刘易斯、门肯[35]一流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36]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

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John Galt,《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的主人公）和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源泉》里的主人公）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并非美丽新世界[37]）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

当然，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

的兰德在斯托尤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38] 上帝的光指引朴茨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注释：

1.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 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主义者，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阿克顿勋爵）。

2. 1679 年，英国国会提出《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由此形成了辉格党（拥护排斥法案者）和托利党（反对排斥法案者）。

3. 1701 年，英国国会通过《王位继承法》：王位不得传给天主教徒；非出生于英国不得担任议员或官员；凡在王室任职或领俸禄者不得担任下院议员；法官为终身制；国家所有法律和条例须经国会批准；国王的决定和政府的政令必须由有关大臣附署才能生效。这标志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国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国王的权力受到限制，仅保留了任命对其负责的枢密院大臣的行政权。

4. 1604年国会开幕前夕，天主教密谋团体准备在国会大厅下挖掘地道、放置火药，企图将詹姆斯一世和国会议员一起炸死，恢复天主教统治。他们举戴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为首。事败后，新教徒视为天佑。

5.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格兰清教独立派的领袖。他当选为1640年国会剑桥选区的议员，内战爆发后加入国会军，在大将军托马斯·费尔法克斯（Thomas Fairfax, 1612—1671）退隐后接管了全部军权。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被处决后，他发动政变，解散国会，自任护国公，直至去世。当时，保王党支持主教制。国会党多数派支持苏格兰式长老会。独立派在国会党内和新教派内都是少数派，他们不能指望自己的宗教派别取得主导地位，只能要求不立国教、良心自由。犹太教解放是克伦威尔良心自由政策的附带产物。我们必须注意：护国公政权在政治上是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军事专政，但只有他们维护宗教自由。保王党和长老派都想把自己的教派变成国教。

6.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名将，嗣后推翻共和国，自立为帝。当时，阿尔萨斯（Alsace）合并问题引发了阿尔萨斯犹太人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从法律上讲，阿尔萨斯只是法兰西国王个人的领地，并不是法兰西的领土。阿尔萨斯贵族仍然拥有帝国议会的席位和维也纳宫廷的供职资格。阿尔萨斯地区的习惯法和封建法继续适用，不受法兰西法律管辖。法兰西共和国和帝国单方面吞并阿尔萨斯，意味着撕毁旧条约，向帝国和日耳曼各邦宣战。阿尔萨斯犹太团体不同于法兰西本土高度融合的犹太人，而是类似波兰和东欧的犹太人，在法律上是“领主或君主特别保护的外邦人”。拿破仑跟法兰西犹太人长老会议协商后，

决定以法兰西国民世俗认同代替封建和宗教认同，将法兰西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定义为“信仰犹太教的法兰西人”，实现法律上的平等。同时，阿尔萨斯的基督教法兰西国王臣民也自动成为法兰西国民。

7. 穆瑞尔·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1926—1995），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alian School）知名学者，他的著作对于现代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理论有著极大贡献。

8. 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又常被译为自由放任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是一种主张只要个人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个人应该享有绝对的、以其自身和财产从事任何活动的自由的政治哲学。 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基本准则为：任何人类的互动行为都应该出于双方的自愿和同意，任何利用暴力或诈欺手段侵犯他人权利和财产的举动都是违反了这种准则。因此除了对付他人先行侵略的反击外，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自由意志主义肯定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某种类型的自由，其范围是由自我所有论（the thesis of self-ownership）界定的。

9. 巴里·戈德沃德（Barry Goldwater, 1909—1998），美国政治家，隶属共和党籍，曾代表亚利桑那州任参议员，是 1964 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选举候选人，也是美国空军预备部队的少将。戈德沃德被视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是美国的保守派先生。

10.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其特色为重视已建立之体制并试

图加以维护，并且尊重传统，视传统为不同时代所累积的智慧结晶。此一政治立场通常与社会主义（Socialism）相对。在一些西方国家，现代保守主义通常倾向于小政府、自由市场的经济架构，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抗极权主义以捍卫他们保守的价值不受威胁。

11. 1825年，俄国军官率领3000名士兵针对帝俄政府起义。起义发生在俄历十二月，因此有关的起义者都被称为“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

12. 二月革命是1917年俄历二月发生的革命，是俄国革命的序幕。其即时结果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逊位，俄罗斯帝国灭亡。革命中沙皇失去权力，而且有大约1500至2000人在混乱中被杀或受重伤。继而统治俄国的新政府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联盟俄国临时政府，用以谋求政治改革及创造一个以民主选出的行政部门和立宪会议。

13. 美洲的“白俄”侨民（White Russian）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由巴黎、柏林和布拉格的俄罗斯流亡者组成。这些流亡者再次迁移，部分由于欧洲政治空气紧张、排外情绪加强，部分由于美国的入籍政策宽大。他们如果留在欧洲，就只能终生持有国际联盟发给的难民护照，永远无法融入侨居国。克伦斯基（Kerenski）和纳博科夫都在这次再移民浪潮中来到美国。与此同时，欧洲排斥的风气也迫使部分俄罗斯流亡者返回苏联。

14.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索尔仁尼琴所著《红轮》是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的一部小说，除虚构人物外，

有几百个历史人物出场。小说所反映的事件时间跨度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小说一共20集，每集分为2—4部，每部40—70万字，总字数接近千万字。《红轮》直截了当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作者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

15. 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 1862—1911），俄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曾任俄国内政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他在任期内以镇压革命势力和土地改革而著称，1911年被暗杀。

16.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俄裔美籍小说家、文体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

17.《巴比特》(*Babbitt*）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巴比特是个学识浅薄、心地善良、自鸣得意的小市民，典型的中西部小城中产阶级。

18. 亚历山大·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 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赫尔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随想》(*My Past and My Thoughts*）中说：俄罗斯自由派对先进的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崇拜和幻想，等到发现典型的西方人不过是庸俗小市民，不禁大失所望。

19. 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y, 1879—1940）是列宁的左膀右臂、“红军之父”、“超工业化”计划的始作俑者。他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获胜的主要功臣。列宁死后，斯大林就将他逐出苏联，但实际上接受了他剥夺农村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托洛茨基

在国外提倡“不断革命论”，攻击斯大林是出卖革命的“热月党人”，最终被苏联间谍暗杀。

20. 奥西普・埃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 1891—1938）是“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天才诗人，“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哀歌》和《第四散文》，1937 年死于远东集中营。

21.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Whig）的议员。柏克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的立场，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为保守主义主要人物，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22.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23. 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 1552—1634）是好古的英格兰普通法学家、《权利请愿书》的主要策划者。他在 1828 年国会的筹划奠定了反对国王武断施政的政治联盟。

24.《塞巴斯蒂安・奈特传》（*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是纳博科夫的著名小说，1941 年出版。小说叙述者“我”想为哥哥塞巴斯蒂安・奈特（他们两人都是俄罗斯流亡者第二代）作传，找到《奈特传》的英国作者。叙述者发现：此人不学无术，完全不了解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仅凭自己的大英沙文主义想象，虚构了一个黑暗落后野蛮的俄罗斯。

25.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

1881），俄国作家，其文学风格对20世纪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6. 佩勒姆·格兰维尔·伍德豪斯爵士（Sir 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是爱德华－乔治王朝的幽默作家，喜欢嘲笑一战前的英国公学贵族子弟。他的《杰弗斯》（*Jeeves*）系列改编为电视剧《万能管家》，至今颇受欢迎。

27. 约瑟夫·路德雅德·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有《基姆》（*Kim*）和《丛林故事》（*The Jungle Book*）。

28. 萨基（Saki）是爱德华－乔治王朝幽默作家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的笔名。他的短篇小说《雷金纳德》（*Reginald*）系列和《克莱夫斯》（*The Chronicles of Clovis*）系列描绘伍德豪斯描绘的同一个阶级；但伍德豪斯的贵族子弟让“万能管家”管得服服帖帖，萨基的贵族子弟是谁也管不住的恶搞专家。

29.《海角一乐园》（*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是瑞士小说家强纳·大卫·怀斯（Johann David Wyss）的小说，出版于1812年。

30. 鲍里斯·维克多洛维奇·萨文科夫（Ьорт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Савинков, 1879—1925）是社会革命党人、作家，多次组织针对沙皇政府的恐怖活动，著有中篇小说《白马》和长篇小说《未曾发生的事》。他在克伦斯基（Kerenski）政府担任陆军次长和彼得格勒总督，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1925年被苏联间谍机构诱捕杀害。

31. 小布尔乔亚（petty bourgeoisie）是小有产者的意思，一般包括小农、小店主、工薪阶级，这些人构成了19世纪法国激进党和美国中西部共和党的主要票源。

32.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对普通法、健全常识和体面生活的坚持。这些东西都是不合逻辑的习惯力量。

33. 根据斯特拉斯堡信纲，新教徒的社区由平信徒和长老监督会组成。后者由前者选出，依靠前者的捐助维持社区事务。事实上，这种社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保守共和主义的政治组织。美国宪法史有两大主流派：其一为新教起源派，主张上述的新教自治社区构成了美国宪法的政治起源；另一派为日耳曼起源派，主张西欧封建各等级共治的传统才是美国宪法的政治起源，但他们也不否认新教传统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大。

34. 费边主义（Fabianism）是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体系。1884年，一些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该社。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简称“费边主义”。

35. 亨利·门肯（Henry Mencken, 1880—1956）是美国讽刺作家，媒体撰稿人，喜欢嘲笑“美国蠢货”的统治，表达精英知识分子对庸人大多数的优越感。

36. 指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

37.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于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描写庸俗消费主义的专制统治。人们不是在暴力专政下接受洗脑，而是在商业消费文化的诱惑下，自动放弃了思考能力。

38. 这段话出自1957年版《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的前言《关于作者》（About the Author）。

第二章

学究政治及其见习生

有一种基本信仰，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拥有，有些人只是在青年时期能够坚持，有些人坚持了一辈子。那种思想事关……信仰和那种信仰的光辉，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青春最好的一面。

——《无法言明的个人炼金术》

Inexplicable Personal Alchemy，1969

1915 年，兰德接触到毕生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Olga Nabokov）。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就能引起无限的联想。没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家族——《洛丽塔》[1] 的家族，俄罗斯“英国贵族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亚战败 [2] 后的改革岁月，奥尔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3] 的司法大臣。他在这个号称最为专制的帝国引进了陪审制，而且确实站住了脚跟。恐怖分子刺杀沙皇，引起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1894 年在位）及其保守派大臣的反动。后者参考休谟和托克维尔 [4] 都提到过的历史借鉴，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结论：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坚持专制绝不动摇，反而获得万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实施不彻底的改革，反而身首异处。[5] 由此可见，防范革命的秘诀不是改革，而是拒绝改革的坚定性。于是，纳博科夫家族实现俄罗斯版“格莱斯顿内阁” [6] 的机会就化为乌有了。

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改革，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同样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反动。据说，老纳博科夫在新朝的举措相当于一个水手遭遇风暴时，为了保全贵重的货物，把不那么有价值的货物扔进水里。显然，以 20 世纪的标准看，他保留的货物确实非常贵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审制 [7]。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

谓反动专制统治下[8]，俄罗斯帝国陪审团的博爱精神不下于帝国法典编撰者（老纳博科夫的同僚）。他们极少判杀人犯死刑，不断将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无罪释放，对侵犯财产的惩罚比边沁派法学家[9]更开明。无罪释放的美女刺客凯旋而归，围观群众抛出的鲜花为她铺成一条地毯。俄罗斯公众憧憬这样的场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炽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青少年对电影明星及其粉丝团的羡慕嫉妒恨。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10]

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愤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

无论如何，奥尔加的父亲拒绝承认这个命题。他参

加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大典，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尼古拉二世发动十月政变，解散了杜马。他加入“拒绝解散派”议员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在那里发表了革命性的《维堡宣言》[11]。然而，历史的剧本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俄罗斯国民不准备像伦敦市民保护长期国会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并不影响未来的临时政府国务秘书返回京师、继续出任议员和其他要职。在这个万恶的警察国家，警察能够惩罚名流反对派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作为帝国的局外人，犹太人罗森鲍姆家族从外省迁往京师，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如愿以偿。1904 年，药剂师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吉诺菲[Zinovy]）和牙医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安娜[Anna]）结婚。他们就是安·兰德（阿丽萨）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罗森鲍姆夫妇的药店生意相当兴旺发达。不过，俄罗斯犹太人处理财富的方式不像西欧新教徒。他们一般不考虑扩大投资，建立超越家族可控范围的商业帝国；或是兴办公益事业，争取邻里爱戴，当选国会议员（当然，神圣俄罗斯的法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纳博科夫家族和立宪民主党正在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同等国民待遇）。他们的做法体现了十足的东方式

智慧：首先，投资培养血缘家族网络；其次，收藏财不露白、轻便易携的贵金属首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投资儿女的教育。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物质财富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很容易同时遭到上层和下层的掠夺；迅速将有形资本变现为不可能掠夺的教育资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说，兰德（以及她妹妹娜塔莎［Natasha］和诺拉［Nora］）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作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他们的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

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兰德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

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兰德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举止风度，但兰德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能磨砺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

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

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衡量，新教社区领袖无疑全是土鳖。“里根经济学”这个名词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发挥嘲讽天才的产物，历史却让嘲讽反过来落在他们自己头上。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挖苦这位总统对杰斐逊主义的解释[12]，那也是因为他们更在意社交礼仪而非智力上的诚实。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悦的激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19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出的识见。的确，地

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安·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像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

投资品对投资者负有成功和回馈的道德义务。他们为了在知识界取得成就，经常宣扬逻辑上合理、但自己并不身体力行的理论。在威廉·詹姆斯[13]这样地道的新教理论家看来，这种桑塔亚纳式[14]的投机取巧就是智力上的不诚实。兰德在理论上是美国个人主义者，行为上却经常是侨民知识分子和东方人，有时还是苏联大清洗[15]的下意识模仿者。在冷战最紧张的时代，她和俄美两国的罗森鲍姆家族成员都没有相互忘记。她一有机会，就给各房亲属送礼。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起怨恨，而非感激，仿佛这些都是她的债务，而非礼物。这不是新教徒个人主义者的行

为模式，而是中国和越南海外侨胞对老家亲戚的行为模式。在她主导的团体中，俄罗斯风格的思想灌输、个人崇拜、宫廷纠纷、分裂叛变络绎不绝。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下，兰德作品的读者大体是家族集体主义传统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厌恶者。他们对作品背后的作者不会感到称心如意，但他们早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坚持只吃母鸡下的蛋，很可能落到只有鸡毛掸子可吃的下场。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道德底线的一些正直和诚实的老生常谈，在世界许多地方纯属奢侈品；美国的物质成就反倒不是。这一点在兰德的作品中表现不出来，在兰德的生平中却可以看出来。

在 1917 年的俄罗斯，学究政治突然像流感一样蔓延开来。酒馆里的贩夫走卒都暂时忘记了赌博和女人，为宪法和权利的概念争得你死我活。学堂平时就是争论的焦点，现在当然更不会例外。霍布斯鲍姆[16]把这种现象称为“1848 年（以及 1988 年）综合症”：一时间，“公共空间”的理论虚拟仿佛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这只是社会剧变的暂时现象。一旦新的游戏规则（即使是民主的规则）稳定下来，贩夫走卒又会变成只关心电影明星和赛马赌注的俗人。俄罗斯流亡者日后来到美国，对苏联的专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讶，却为美国民众的冷漠伤透了心。他们只有不断争论“谁的错误使我们丢掉了俄罗斯”，才能召回

风云时代的若干存在感。

从纳博科夫家族的角度看，斯托尤宁学校就是英国绅士“大旅行”的替代品。经验重于书本，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接触穿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育。可敬的纳博科夫议员和奥尔加小姐乐于向兰德论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这对他们只是热身活动。立宪民主党的圈子一向不高兴听别人说英国人的坏话；为英国人的政治制度辩护，能给他们造成一种愉快的幻觉。奥尔加后来说，兰德的辩论风格是激烈的，有点挑衅的味道。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充满激情的论证能给双方带来乐趣。显然，从纳博科夫式经验教育的角度看，正确与否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收获在于学会怎样理解不同观点。不过，小理论家兰德的想法大概不是这样。论证充满激情，本身就说明发言人把自己的正确性看得极重。奥尔加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说，在他的家庭教师当中，平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论点最热情、最执着，对观念播种抱有最大的期望。原因不难理解：知识和观念就是游士唯一的资本。只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占有者。

从兰德（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

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兰德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路线。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

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

安·兰德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三个前提：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根据自身特征而证明的，外在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优秀的制度有自我展示、最终胜利的内在趋势，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优秀的制度可以通过斩断社会习俗、庸人愚昧、先在环境的手段，由少数天才付诸实施。这些前提浸透了1917年的精神（她在革命的第二年决心背教，以后一直是无神论者）。从这个角度讲，学究政治见习生阿丽萨一直活在安·兰德心中。革命天真时代的理想早已在拿破仑和富歇[17]这些大革命的继承人心中熄灭，却仍然活在华兹华斯和骚塞[18]这些革命反对者的思想下意识当中。安·兰德和所有自由意志派人士一样，对人类理性抱有绝对的信任，不能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早年的感情体验仍然是她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不断在她以后的生活中露出马脚。谚语说："抓破一个俄国人，露出一个鞑靼人。"我们也可以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

注释:

1.《洛丽塔》(*Lolita*)最初被列为禁书，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恋爱故事。

2. 英国帕麦斯顿(Palmerston)内阁和法国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支持土耳其，要求俄罗斯海军从黑海撤退。英法联军攻陷了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塞，迫使俄罗斯让步。这次战败给俄国社会的心理刺激，类似甲午战争对清朝的刺激，直接导致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西化改革。

3. 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Aleksandr II Nikolayevich, 1818—1881)，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任期间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下诏废除农奴制，主持多项政治改革，制定了把俄罗斯君主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计划。然而他的遇刺却打断了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进程，此后俄罗斯帝国基本上丧失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

4.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835)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

5. 休谟《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第5卷主张：跟辉格党人的说法相反，斯图亚特王朝(Stuart)的君主的武断程度远不如都铎王朝(Tudor)的君主。英国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亨利八

世（Henry VIII, 1491—1547）的统治建立在国会软弱的基础上，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的失败其实是国会扩张权力的结果。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法兰西波旁王朝（Bourbon）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时代是法国君主制最开明、最繁荣的时代，反而引发了革命。而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涸泽而渔的政策使法国百业凋蔽，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专制统治。亚历山大三世重申：俄罗斯专制主义、东正教和人民是一体，局部地引进议会制度只会动摇这个体制，招致危险的后果。太傅波别特诺斯采夫（Pobedonostev）认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应该对恐怖主义的猖獗负责，只有坚定维护俄罗斯体制的理论自信才能拯救沙皇。他的理论变成了亚历山大三世一朝的官方政策。

6.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是英国自由党领袖，四次组阁。德、俄两国的保皇自由派（包括纳博科夫家族）希望用和平方式引进英国式立宪君主制，是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和波别特诺斯采夫的主要体制内政敌。后者不断警告皇室不要接受“格莱斯顿内阁”，因为这将是君主制毁灭的第一步。

7. 老纳博科夫成功地建立和保护了陪审制，一直维持到十月革命后。从本地居民中抽选的陪审团经常根据舆论、而非成文法，判处政治犯无罪释放。在这段时间内，甚至刑事犯罪分子的死刑判决也非常少见。

8. 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子尼古拉二世拒绝自由主义改革，坚持沙皇专制、东正教和人民的三位一体；但他们没有完全废除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成果，例如废除农奴制和司法陪审制，而且即使传统的君主专制也远不如20世纪的新型极权主义无孔不入。

9.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是19世纪末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派法学家主张用理性审视过去的法律，实现法典化、统一化、开明化。他们成功地推动了英国的法律改革，减轻了以前过于严酷的刑罚；但正统的普通法学家和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对理性和成文法的过度信任是危险的。

10. 参见曼德尔施塔姆的《第四散文》。

11. 尼古拉二世解散国家杜马后，大批议员逃到（不受俄罗斯法律管辖的）芬兰首都维堡，效法英格兰下议院对付查理一世的手段，号召国民抵抗政变、拒绝缴税、服兵役。

12. 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坚持说自己才是杰斐逊主义的真正继承人，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明显是小政府的支持者。参见《里根自传》（*An American Life: The Autobiography*）。里根完全忽视了杰斐逊思想的激进主义一面，这一点在历史学家当中不过是基本常识而已。

13.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的创始人。

14.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西班牙裔的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实在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宗教的价值不在真伪，而在神话美学功能。

15. 大清洗也称苏联肃反运动。20世纪30年代，苏联爆发了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是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1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世

界知名英国左派历史学家。

17. 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1759—1820），法兰西第一帝国警务大臣，法国警察组织的建立者。

18.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流派湖畔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向往法国大革命，后转向保守立场。

第三章

“价值阶梯”的倒塌

当我被问到自己的情况，我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下面这句其实是解释洛克说过的话：“不要问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朋友或我的情感，要问就问我思考的东西。”

——《致〈源泉〉的读者》

To the Readers of *The Fountainhead*，1945

犹太人天然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兰德对“价值阶梯”的认识早得惊人，她发明这个词的时候才 11 岁。这时，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她的认同指向英国，而非俄国。一个孩子持有这种自居局外人

的立场，不大可能跟家庭环境无关。俄罗斯反犹分子指责犹太人：他们只把俄罗斯当作发财致富的临时狩猎场，而不是热土难离的家园。在犹太人——天然国际主义者的价值阶梯中，欧洲高于俄罗斯，英语世界高于欧洲。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携带从俄罗斯人身上赚取的财富，一走了之。只有俄罗斯人才会用鲜血保卫俄罗斯，永远不弃不离。这种指责迅速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排犹运动越是猖獗，犹太人越是别无选择，只能依据上述考虑和步骤逃之夭夭。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时期，跟罗森鲍姆家族处境相似的另一家犹太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那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1]的家庭。

战争对反犹主义极其有利。公众发现，尽管帝国法律对犹太人的教育权施加了赤裸裸的歧视和压缩，这个极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仍然远远高于俄罗斯人和所有其他民族。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俄罗斯农民只能当列兵上前线,后方的知识型工作却少不了犹太人。即使在军队中，只要稍微尊重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司书的职位就充斥着犹太人。大本营不得不专门下令限制他们的人数，以防俄罗斯士兵军心动摇。

战争对社会主义更加有利。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公众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视为落魄文人的幻想，没

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社会主义者普遍具有反国家主义[2]倾向；他们设想了各种版本的松散共同体，总是极端敌视官僚管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爱国主义的狂热情绪驱使下，军队、军需工业、劳工组织、原料供应部门迅速组织起来。这个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半官方组织对国民经济行使武断权力，可以任意决定原料和军需的价格、设计和研发的程序。前线部队的命运和后方半数以上劳动人口的工作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的管理人员比战前政府的官员人数还要多，各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违背他们的意志实施任何政策了。即使战争结束，社会经济结构也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战时计划经济扼杀了19世纪自由主义，铸造了战后社会主义的新轨迹。

在俄罗斯，战时计划当局的主力是古奇科夫[3]的十月党和各种专家治国论者。十月党是自由派的右翼，比较接近所谓的“新权威主义”。他们愿意接受尼古拉二世解散杜马的十月政变，在威权主义[4]的维稳体制下发展经济。他们跟后来苏联计划当局的开创和继承关系，颇为类似拉特瑙[5]和第三帝国计划当局的关系。计划当局把军工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一倍，政府没有拒绝的可能。如果军需工厂的工会决定占领工厂、停止生产，计划当局同样没有反抗的可能。后者实际上已经处在可以操纵计划当局，

然后通过计划当局操纵政府的地位。如果工会当真这样做，唯有军事镇压能阻止他们。如果军队和工会掌握在同一种势力手中，他们无疑可以对大多数农民发号施令，任意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业原料的价格。这个集团已经掌握了半数以上的生产、消费和就业；分散的农民很难找到其他的出售渠道，完全不可能找到其他的购买渠道。这时，工会仍然掌握在孟什维克[6]甚至工团主义者[7]手中。因此，暂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麻烦出在计划当局没有考虑到的地方。经过斯托雷平的改革，俄罗斯已经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在所有交战国当中，只有俄罗斯完全不用操心粮食。何况战争一开始，一切粮食出口都已经停止。粮食进口国德国受到英国海军的全面封锁，在黑面包中掺稻草，实行配给制，一直坚持到 1918 年。然而，1917 年的小范围面包脱销就断送了沙皇及其政府。革命爆发时，俄罗斯并不缺粮（缺粮是内战后期才有的事情）。面包涨价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供给困难是交通系统紊乱和负担过重的结果。而且，工会工人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待遇，他们远不是最困难的群体。非生产性单位的文职人员无法威胁雇主增加待遇，军需原料的生产者（大部分是农民）无法按照通货膨胀的比例提高价格，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工会工人尤其是兵工厂工人的积极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弱势，而是他们占据了有利的战略地位；这种地位非常类似波兰团结工会在1980年和1989年的地位[8]。革命的发动者一般不会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否则他们就没有能力发动革命了。当然,革命的发动跟革命的成功没有多少关系，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当时政府的合法性和当时社会对宪制改变的期待值。如果合法性严重削弱而期待值又极度上升，只需要极小的冲突就足够引发革命。

第一届临时政府由三方面人士组成：最后一届国家杜马的领袖议员、半官方计划当局的首脑和工会会议（苏维埃）代表。最后这一批人是当时最激进的人士，他们的领袖是克伦斯基[9]。他刚刚从势力较小的工党投入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党，同时兼任两大要职——首届苏维埃主席和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临时政府颁布的众多法令当中，有一项跟罗森鲍姆家族关系密切：给予犹太人国民待遇。另一项法令出自克伦斯基的手笔：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所有警察组织。后来临时政府不堪一击，跟这项法律关系甚大。以后的新政府因此充分吸取了教训，绝不给其他人同样的机会。

安·兰德后来回忆说，这时她毕生唯一一次感到跟历史合拍。如前所述，兰德当时的政见更接近于克伦斯

基，而非纳博科夫和米留科夫（请注意，当时人人都有政见）。她的父母却另有看法。罗森鲍姆夫妇发现，临时政府废除沙皇统治的法令都能付诸实施，建立自己统治的法令都无法实施。经济形势一片混乱，所有正常生意都做不下去。一家人开始吃老本，这样的损失不是纸上的平等权利能够弥补的。如果京师的工人对沙皇时代的面包供应不满，他们现在更没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铁路工人兄弟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不断以中断补给威胁京师。纳博科夫对克伦斯基更加不满。在他眼中，克伦斯基是个华而不实的表演艺术家，一心利用煽动群众的有利地位攫取权力。我们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指出，古奇科夫对米留科夫也有非常类似的看法，而纳博科夫对后者是佩服备至的。如果斯托雷平还在人世，很可能会把他们全体看成华而不实的煽动家。

无论是否华而不实，克伦斯基当时是群众的宠儿。更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安抚难缠的工会，保持重要物资的生产和运输。于是，他掌握最高权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日益明显，而心怀恶意的人因此指控他幕后煽动工人闹事，从而证明自己的必不可少性。克伦斯基兼任俄军总司令以后，这种指控更是绘影绘声，将他描绘成深谋远虑的克伦威尔与拿破仑合体的阴谋家。他后半生一

直像祥林嫂一样四处反驳这些指控，但听众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安·兰德后来在纽约见到流亡的克伦斯基，发现他已经变成《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10]，永远定格在断送毕生期望的致命一刻，很快就失去了兴趣。

起初，临时政府的革命家大都以法国大革命的传人自居，因此只害怕拿破仑。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眼中没有多大分量，至多充当反革命势力的借口而已。策列铁里和唐恩（孟什维克领袖）在社会党人联席会议上说：要警惕布尔什维克，以免他们的胡闹给反革命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这时万万想不到，布尔什维克可以身兼革命和反动的双重角色。这些革命家忌惮的“反动势力”有不止一个嫌疑人，其中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Kornilov）。里加陷落后，这位元戎大肆抨击临时政府缺乏责任心。他还说，临时政府破坏军纪的措施（尤其是士兵代表会议对军官的牵制）给德国人帮了大忙，只有赶紧“拧紧螺丝”才能挽救败局。克伦斯基在这位跋扈将军身上发现了不止一个拿破仑，决定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除掉他。

克伦斯基动员苏维埃和京师工人除掉科尔尼洛夫以后，没有任命其他军官担任总司令，而是把三方面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时，人们不再怀疑：总理自己就有

当拿破仑的野心。尤其是,他似乎更喜欢被人称为总司令,甚至“我们命运的主人”,而不是“总理”。他消灭科尔尼洛夫的时候,并不介意重用布尔什维克,把京师工会和卫戍部队的要职让给他们。然后,他又向唐恩抱怨孟什维克不肯诚心帮助他抵抗布尔什维克威胁。唐恩本来很不喜欢布尔什维克,这时都忍不住怀疑克伦斯基是不是表演过度。当年克伦威尔进军伦敦前,就是这样向下议院痛哭流涕,自称因为忠于国会而面临军队报复的危险。克伦斯基有没有类似的打算,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是那种酷爱出风头的角色,喜欢把吸引群众欢呼的竞争对手(例如唐恩、切尔诺夫[Chernov]这样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视为主要危险,低估那些鄙视群众、在地道里积蓄力量的阴谋家。虚荣的人很少能准确估计实力对比。他很可能打算利用这些笨笨的(他瞧不起不善辞令的人)、招人讨厌的(他没想到讨厌和可怕有密切联系)布尔什维克镇住其他派系的社会主义者,迫使他们自愿交出一切权力,然后再利用军队把布尔什维克搞定。他若真能具备克伦威尔的刚毅、坚韧和狠毒,并非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计划。

这时,列宁面对克伦斯基的位置恰好相当于几个月前克伦斯基面对李沃夫总理的位置[11]。他同样兵不血刃地赶走了克伦斯基,没有引起多大的纠纷。在公众(包括

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已，他们全是空谈家。在野的空谈家尚未暴露自己，在朝的空谈家已经暴露了自己。因此，前者当然比后者占便宜。切尔诺夫（最大党派社会革命党最大派系的首脑）表示，几个月后，列宁的名誉也不会比克伦斯基强，反正谁也不会干得更好。这话代表了表演型革命家的普遍意见，他们觉得，让别人担负无法避免的恶名，对自己有利。这些人习惯于跟同类打交道，居然没有想到：如果有人横竖都要担恶名，他为什么不索性把事情做绝？几个月后，切尔诺夫才发现，没有必要操列宁和部长公文包的心，倒是应该多为自己的脑袋操操心。最后，这些革命家全都逃往国外，用后半生精力撰写相互矛盾的回忆录，试图证明自己早有先见之明，问题主要在于别人不肯听。

布尔什维克迅速关闭了其他党派的报馆，企图吞并其他派系的工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发出了微弱的抗议声，“社会党反革命分子”却报之以武斗、罢工和封锁物资。京师的经济生活全面瘫痪，只有在这时才开始出现全面的面包短缺。列宁并没有解散立宪会议的预谋，他的国会策略和革命策略都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如果他能赢，就愿意把整个机构盘下来为自己服务。然而，他

发现，布尔什维克即使掌握了政权，仍然会在选举中惨败。这时，能起作用的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赤裸暴力”（这是后来为阶级专政下的定义）。自此，内战全面爆发。两京补给断绝，陷于饥饿。1918 年夏末，罗森鲍姆一家登上驶向克里米亚（Crimea）的列车。这时，纳博科夫一家也向同一个目的地前进。不久，奥尔加的父亲将在克里米亚政府中再度入阁。罗森鲍姆一家隐居叶夫帕托利亚（Yevpatoria），纳博科夫一家避居雅尔塔（Yalta）。两地相距不过一百英里，他们却从未相遇。

注释：

1.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1920—1992），出生于俄罗斯的美籍犹太人作家与生物化学教授，门萨学会会员，他创作力丰沛，产量惊人，作品以科幻小说和科普丛书最为人称道，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2. 国家主义（Statism）是由宪政主义兴起过程中，学术思考带来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政权地位、国家间关系、结盟缔约与国家安全原则等方面组合建立起来的政治学说，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在于研究国家对政权方方面面的影响、政权内外关系职能、职责和政府治理责任的政治学理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国家的正义原则和正当意义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衡量政权作

出决策的根本所在，从而缔造国家主义信念，指引大众爱国主义立场，迎接国家间的挑战，为国家的独立地位而努力。

3. 亚历山大・古奇科夫（Alexander Guchkov, 1862—1936）是俄国实业家、“十月十七日联盟”的领袖。他们的政见跟立宪民主党差别不大，但不像后者那样讲原则，主张承认尼古拉二世的政变，在有限的让步中发展经济，徐图进取。战争期间，他是军事计划当局的灵魂人物。二月革命后，古奇科夫出任首任海陆军部长。克伦斯基掌权后，把他和其他自由派都赶走了。

4.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称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是指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一种非民主、非极权的政体形式，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一般指依靠各种行政手段、法令、军警以控制国民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之政府。

5.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长。曾任德国民主党领袖、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经理、董事。1922 年为打破当时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局面，同苏俄签订《拉巴洛条约》，6 月回国后被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6. 孟什维克（Menshevist）俄文音译，意为少数派，指早期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1903 年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人在制定党章时发生尖锐分歧。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时，拥护列宁的人得多数票，称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为多数派），马尔托夫等得少数票，称孟什维克。

7. 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一种以劳工运动为主导的社会主

义，旨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使企业由资本家主导变成由工人主导。

8. 波兰团结工会的会员人数波动很大，得势时几乎包括全民，失势时只剩下少数骨干；但这些骨干才是他们真正的力量所在。他们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和高技术工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在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2014）的军事管制年代，消灭他们也就意味着毁灭国有工业体系。20 世纪 80 年代，当局已无勇气承担斯大林式镇压的经济成本，以此斩草不能除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成功后，工会骨干的势力反而衰退了。柏林墙倒塌前，天主教、右派等势力都附和团结工会，使之实际上成为波兰全民族的反苏社会运动。政治自由实现后，各党派纷纷自立山头，不再借用工会的旗号。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工会骨干丧失了原有的垄断地位。

9.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1881—1970），俄罗斯政治家、革命家，是被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理。他 1912 年当选国家杜马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俄罗斯参战，参加了 1917 年二月革命，加入社会革命党，后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政策。由于其温和政策遭到列宁、托洛茨基的反对，致使十月革命爆发，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后他变装逃出红军控制下的俄国，先流亡到巴黎，1940 年移民到美国，从事反对苏联政府的活动。1970 年在纽约逝世。

10. 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郝薇香小姐（Ms. Havisham）在结婚当天被未婚夫抛弃，从此永远生活在那一天。她发黄的婚纱和过时几十年的陈设把男孩皮普（Pip）吓了一跳。

11. 克伦斯基能推翻李沃夫，因为他同时兼任司法部长和苏维埃主席。他能利用工人反对政府，同时阻止政府自卫。克伦斯基驱逐科尔尼洛夫的代价是：将首都工会和军队的要职交给了帮助他抵抗军人干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于是后者完全可以照抄他对付李沃夫的办法。

第四章

现在和未来的先知

我的个人生活就是我的小说的后记。它包含了这样一句话："我是认真的。"我一直遵循着自己在书中表达的哲学来生活——它对我塑造的人物和我自己都同样适用。具体的细节自有差异，但概括起来还是一样的。

——《关于作者》(About the Author)

引自《阿特拉斯耸耸肩》

(*Atlas Shrugged*)，1957

“现在就要和平”是列宁打击米留科夫、争取军队的武器。1917 年的俄军跟 1940 年的法军一样，完全丧失了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士兵枪杀强迫他们作战的军官，抛弃阵地、武装逃亡。除了布尔什维克，所有政党都把这种做法视为必须惩罚的逃兵罪。只有列宁高瞻远瞩，认识到对德战争已经必败无疑，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争取内战的胜利。只有布尔什维克把逃兵定义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英雄；军队如果害怕德国人，就只有列宁能让他们不受惩罚地返乡。列宁知道，只要德国人不介入，这支败军仍然是俄罗斯境内最强的力量。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说：“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1]

列宁在水兵和拉脱维亚军团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立刻颁布了《和平法令》，批准军队单方面复员。罗森鲍姆的老家在布列斯特和乌克兰，这些地方和克里米亚一起落入德军手中。后来，兰德、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2]、丘吉尔[3]提到这段时间，都把德国占领军称为唯一能维持和

平和秩序的力量。然而好景不长，协约国很快在西线打败了德国，命令他们吐出《布列斯特和约》的所有战利品。德国人一走，南俄立刻沦为红军、白军、乌克兰人、波兰人、库班哥萨克[4]、顿河哥萨克[5]来回洗荡的战场。这几支军队只有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才会立场一致，后来巴别尔（他也是秘密的犹太人）的《红色骑兵军》[6]把这段惨史描绘得淋漓尽致。到1921年初，红军胜局已定。纳博科夫一家早已通过君士坦丁堡逃往西方。兰德的母亲安娜力主逃走，但父亲吉诺菲固执地拒绝相信布尔什维克能长久。或许，他仍然难以割舍留在圣彼得堡（后来由彼得格勒改称列宁格勒）的家业和亲戚。

1921年夏天，罗森鲍姆一家返回涅夫斯基街的公寓。1921年的旧京并非不像布尔加科夫讽刺小说描绘的莫斯科：配给饿死人，黑市满天飞，霍乱四处肆虐，酒精比黄金更贵重，普遍压缩和均分住房面积弄得小市民鸡飞狗跳。当然，如果你有战略家的天才，及时从老家召来三姑六婆的大军，把简易折叠床和大包小包行李一直堆到走廊里；新派来的住宅管理委员会干部也会拿你没辙。如果你缺乏这种苏维埃时代的深谋远虑（罗森鲍姆一家就是这样），就会很快落到跟陌生人分享卫生间和厨房的境地。正如索尔仁尼琴后来所说，共享私密空间造成了无数邻里纠纷。

解决纠纷、提高生活质量的妙计之一就是向政治保卫部门写匿名信，许多小市民因此享受了以往专为政治家和领导干部保留的待遇。不过罗森鲍姆一家并没有落入政治保卫部门手中，说明他们处理人际关系还是比较圆滑的。甚至兰德著名的傲慢都没有得罪人，说明他们邻居的忠厚程度不会低于苏联平均水准。

然而，做一个苏维埃新人仍然困难重重。新经济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临时性宽容没有维持多久。在重新强化的计划经济秩序中，吉诺菲这样的私人企业家没有容身之地。新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捷径是：没收教会和有产者的财产（包括吉诺菲过去经营的药房和现在打工的联营药店），依靠镇压藏匿粮食的农民（图哈切夫斯基[7]因此得以飞黄腾达），大规模印发无法兑现的纸币（1924年的50亿卢布只相当于1914年的1卢布）。于是，短短几年内，一切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落入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手中；或者不如说，落入“干部”这个当时还很拗口的特殊群体手中。“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新时代开始了。除了红军复员军人和其他党组织安排的人员，任何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很难获得配给口粮。这些口粮来之不易，必须依靠下乡干部和军人的力量才能到手。从此，斯托雷平时代的欧洲最大粮食出口国不复存在，以后几代人从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圆面包。著名的罗宋汤也象俄罗斯人民一样一分为二：一种是老移民带到西方的牛肉蔬菜杂烩汤，另一种是苏联移民带去的白菜土豆汤。兰德一家对后一种汤是不会嫌弃的，因为他们过节时才吃得上土豆片、萝卜缨、橡子和咖啡渣做成的蛋糕。切尔诺夫（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主席）曾经威胁列宁：如果支持他的大多数农民不给苏维埃政权提供粮食，列宁很快就会声誉扫地。然而，红军和《真理报》[8]无情地嘲笑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

新政权并不欢迎兰德父亲这样的人，吉诺菲也同样厌恶他们。兰德后来说，她的父亲“将无所事事。首先，作为一个前店主，他不会被任何苏联的行业接受。其次，他也不想干……他在大罢工。”在少女兰德眼里，这是一种叛逆英雄式的举动。日后，她的作品不断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特立独行，蔑视庸俗、怯懦的大众和横暴、愚蠢的当局。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坚信理论可以审判世界。他们在逻辑理论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性格气质上却是十二月党人的苗裔，在价值偏好上甚至有尼采[9]的味道。尼采的著作也是兰德中学时代的重要读物；俄罗斯和苏联知识分子始终对他颇为重视（虽然往往谴责，但谴责本身就是反面的重视），而英语世界始终把他当作一个古怪的文学边缘

人。兰德回忆说：她从17岁起就跟尼采产生了共鸣。尼采的超人—庸人二分法[10]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界影响极大。他号召抛弃旧的价值观，鄙视基督教及其利他主义道德（同时赞赏犹太人），宣扬少数天才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超人唯一的义务就是完善和发挥自己的天才。兰德小说的男性主人公可以说是尼采价值观和萨文科夫行动力的综合，体现了少女兰德炽烈的想象世界。

英雄的姿态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有弹性（或者说，更机会主义或不讲原则）。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女青年的出路是带着嫁妆做贤妻良母。高等教育是装饰性或兴趣性的假日。安娜的牙医学课程除了帮助她认识药剂师丈夫以外，没有派上其他用场。她的大学生活其实无异于文学青年的业余活动。现在，她依靠文艺青年的首选兼职——家教和翻译——养家。吉诺菲并不赞同妻子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觉得这样无异于向僭主政权屈服。兰德的妹妹诺拉有一次管母亲叫"左倾分子"。兰德自己也跟父亲一样骄傲地坚持个人主义原则，尽管他们父女都没有什么办法应付共产主义的实际生活。我们不要忘记：当初是安娜主张移民，吉诺菲不肯。她现在承担了丈夫错误决策的后果，而始作俑者却利用无须负责的英雄姿态，赢得了家庭政治的胜利。

青春期的特点是：崇拜零成本的空谈表演者，轻视庸俗的现实负责者。这种价值取向与其说更接近右派，不如说更接近左派。以左派的挑战姿态维护右派的抽象原则，一直是兰德作品的鲜明特点。这种左右颠倒的特点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1921年，兰德进入圣彼得堡大学社会科学院，主修历史，副修哲学。犹太人偏爱教育投资（也就是无法暴力掠夺的知识资本和符号资本）的传统仍然在起作用，公立大学是唯一没有引起罗森鲍姆一家原则性反感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如果有人想要打败这种投资策略，经济上的国有化和政治上的一党制是不够的，必须辅以出身论、思想改造和肉体消灭。事实上，德国和苏联最后都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浅薄的批评家嘲笑他们的政策愚不可及，其实恰好说明自己缺乏政治现实感。若非如此，革命就是白忙一场；或迟或早，稀缺资源又会回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手中（至少是犹太人和资产阶级文化模式携带者手中）。兰德正好赶上了社会改造即将完成的末班车。1924年她毕业时，大学就要对资产阶级子弟关门，不宜改造（也就是最著名和最出色）的教授已经遭到驱逐。托洛茨基荒谬而英明地提出，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爱护知识分子，以免他们在国内的进一步改造中受到伤害。这时，红军之父还没

有料到自己的下场。

兰德的大学课程有：古代史、中世纪史、西方史、俄国史、逻辑学、心理学的前身精神哲学、法语、生物学、必修课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史。这份课程表是准欧洲大陆式正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速成教育的妥协。黑格尔[11]和马克思的著作主要起到一种政治神学的作用，论证此岸世界的历史必然性。她对这种观点格外反感，专门创造了自由意志哲学予以反驳。不过，她后来把自由意志定义为在任何特定条件下思考或避免思考的自由。这种范畴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气息。俄罗斯神学一直没有产生天主教理性主义的体系，使得俄罗斯知识界特别容易感染德国先验主义的哲学[12]。19世纪俄罗斯思想界大体是笛卡尔系理性主义[13]和德国先验主义的徒子徒孙平分秋色。苏格兰启蒙学派[14]和英国经验主义[15]在俄罗斯没有产生任何重量级人物，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从哲学系谱讲，“客观主义”（Objectivism）哲学[16]是欧陆思想的余绪；尽管从政治上讲，自由意志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蛮族名将”。更不用说，她的无神论只有在理性无限的前提下才能完成论证。在思想史地图上，绝对理性论是天主教思想的下游，无神论是绝对理性子弑其父的自我终结。在绝对理性的背景预设内，兰德式无神论自由

意志论对其他无神论决定论有杀伤力。在经验主义的达尔文世界上，先验论证无异于醉汉在路灯下寻找钥匙——钥匙在水沟里，但路灯照不到水沟；而路灯能够照到的地方，本来就没有钥匙。兰德的最初专业是历史，历史是最经验主义的学科，但她所有的著作都把背景设定和路径依赖视为无足轻重，英雄人物的选择才是至关紧要。这种路径的末流将会产生某种右翼版的萨特[17]学说：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决定路径；而非相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兰德生平轨迹很容易引出跟这种理论截然相反的判断。

克里米亚避难和内战的经历造就了兰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1936）。她把故事背景放在1922年，把自己（基拉［Kira］）、父亲（瓦西里［Vasili］叔叔）和青年时代的恋人列夫·贝克尔曼（Lev Bekkerman，即故事里的利奥·科瓦楼斯基［Leo Kovalensky］）都放进了小说。不过最重要的是，她由此确定了思想小说的原型，以后再也没有背离这种原型。她的人物就是昆德拉厌恶的那种图解式思想观念的化身[18]。后来，兰德不无道理地说：观念的载体总是不断变化。客观主义哲学的小说载体并不比柏拉图的对话载体、尼采的诗歌载体更差。在弥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气息的俄罗斯大地上，武装的先知正在通过思想的此岸性证明自己。他们不

知道，一位没有武装的先知以狄多女王[19]自居，正在用他们的武器训练自己，决心从自己的血肉中生出复仇的子嗣。

注释：

1. 列宁1919年12月发表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莫斯科，1977年）第30卷，第274页。

2.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Mikhail Afanasievich Bulgakov, 1891—1940）苏联小说家、剧作家。

3.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英国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和作家，曾于1940年至1945年出任英国首相，任期内领导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美国等国家对抗德国，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并自1951年至1955年再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对英国乃至于世界均影响深远。

4. 库班哥萨克的驻地在北高加索、黑海东北海岸。沙皇准许他们自治，以兵役代替纳税。二月革命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独立势力。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地方性的，没有全国性的眼光和远见，只想在老家一带闭关自守。因此，十月革命后，他们庇护了逃难的志愿军军官。志愿军占领南俄大部分土地时，向他们征粮征兵；他们又跟布尔什维克结盟，夹击志愿军的后方，导致了白军的失败。布尔什维克统一全国后，将他们逐出家园、强制消灭。

5. 大顿河军驻地在今天的乌克兰。他们在沙皇时代的法律地

位类似库班哥萨克，但实力和地位更重要。在俄罗斯、波兰和瑞典的争霸战争中，大顿河军的立场举足轻重。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中，他们的地位同样重要。这时，他们的做法类似库班人，总是攻击跟他们争夺乌克兰的政治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失势，其他敌对的力量开始争夺乌克兰，他们又会化敌为友，向新的敌人开战。白军、红军、波兰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都曾经跟大顿河军结盟和开战。最后，他们的下场和库班哥萨克相同。

6. 苏联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 1894—1940）的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Red Cavalry*）记录了他在布琼尼（Budenny）部队担任随军记者的所见所闻。布琼尼责备他不该暴露家丑，高尔基则为他辩护。

7.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 1893—1937）是苏联名将，在进攻华沙的战役中被波兰打败，1937 年死于大清洗。

8.《真理报》最早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托洛茨基于 1908 年 10 月 3 日创建于奥地利维也纳，针对俄国工人发行。早期的《真理报》为避免沙皇政府的新闻管制，全部在国外刊印，再偷运入俄。此报于 1918 年至 1991 年间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91 年被关闭，但多份同名的报纸不久就开始发行。原《真理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以其政治色彩而著名。

9. 弗雷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其著作对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对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尼采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

10. 尼采主张，道德（特别是基督教）是庸人约束超人的诡计。

超人应该鄙视这种道德，建立强者的道德。

11.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其思想代表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 从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开始的德国思想家喜欢用先验填补"理性不及"的难题。如果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靠的，那么认识论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英国哲学传统依靠经验主义，德国哲学传统依靠先验主义。大卫·休谟和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就是这两种答案的体现。俄罗斯19世纪的哲学传统是从德国引进的，弗兰克、别尔嘉耶夫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例外。

13. 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其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Rationalism）哲学。笛卡儿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而思想是不可怀疑的。

14.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门徒。

15.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开创的哲学流派，强调理性的有限性和正义规则的感性基础。

16. 客观主义（Objectivism）是安·兰德提出的哲学系统。客观主义认为：实在是独立于主观意识而存在；每个人借由感觉跟此实在直接相连；人可通过概念形成和逻辑上的归纳与演绎，从感觉

来获取客观知识；人生的道德意义在于追求个人幸福或理性私利；与此道德观相适应的唯一社会体系是全面尊重个人权利，并体现为纯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艺术的角色是将人的形而上学观点，以选择性重现现实方式，转化为他能理解并能做出情绪化反应的物理形式，即艺术品。“客观主义”之名来自该哲学的一项原则：人类知识和价值是客观的，不是由人的思想凭空创造的，而是取决于实在的本质、只不过是被人的思想所发现。兰德选用了此词是因为她原本想用的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已经被其他哲学家用了。

17.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萨特的哲学是一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这种理论和决定论相对，认为人类有绝对的自由，也要为所有自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

18. 当代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表示，以小说人物为某种观念的化身，会损害人物塑造，使小说变得单薄、苍白。他认为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是这种反面教材。

19. 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迦太基（Carthage）女王狄多（Dido）接待流亡的特洛伊人埃涅阿斯（Aeneas）又遭到抛弃。她发誓，后裔必有复仇者。埃涅阿斯离开迦太基后，前往意大利。他的后裔建立了罗马。

第五章

异乡异客

如果大家愿意，那么我们携手共进。如果渴望独处，我们就独自上路。因为在精神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颂歌》(*Anthem*)，1938

兰德的姨妹尼娜·古萨奇科（Nina Guzarchik）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团体的领袖，他们有时在古萨奇科家公寓内聚会。在一次聚会中，兰德结识了列夫·贝克尔曼（Lev Bekkerman）。列夫也是犹太人，比兰德大4岁，当时在圣彼得堡技术学院工程系读书。兰德55岁时回忆说："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被他的英俊吓了一跳。我非常喜欢他的长相。"她心目中的男性美标准体现于《源泉》（*The Fountainhead*）的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她的美国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也符合这个标准。列夫和兰德的政治观点非常相近，他甚至敢于把秘密警察追捕的学生藏在自己的公寓里。在沙皇时代，这是一种低成本赢得社会声誉的方式；在苏联时代，却无疑是真正不求回报的勇敢。兰德觉得列夫有些傲慢，却因此更喜欢他。在尼采哲学中，傲慢是精英应有的特征。谦卑是基督教的奴隶道德。《源泉》的霍华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约翰·高尔特（John Galt）都以不可一世的骄傲著称。她没有想到，这很可能是列夫不愿意被女性倒追的表现。兰德从小是优等生，在犹太人崇拜优等生的文化小环境中长大；虽然大环境往往非常不利，但她凌驾一切的自信从未改变。即使在感情生活中，她也习惯于采取主动；毕生如此，似乎觉得理应如此。

在1920年代，苏联的娱乐生活是极其贫乏的，即使在两京也不例外。有几次，兰德和列夫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听轻歌剧。她后来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我们活着的人》，称她的初恋为“疯狂的、不顾一切的”。兰德晚年在美国回忆往事时说，如果她第一个爱人愿意投桃报李，她大概就会留在俄国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难断定：客观主义哲学就不会存在了。这一对准知识分子幸存的原因，不外乎苏联巩固政权的步骤还没有完成“抓大鱼”阶段。大鱼一旦捉完（用不了10年），小虾就不会有漏网的机会。命运之神对兰德非常眷顾，因为列夫受不了这样主动、强势的女生。几个星期后，他就不再跟兰德约会。两人在派对中见面时，列夫故意对她不理不睬。于是，他们的生活路线图渐渐分开。

不久，郊外的廉价电影院开始放映D. W. 格里菲斯、弗里兹·朗格、恩斯特·刘别谦、塞西尔·B. 德米尔的无声电影[1]。短短几年时间，她就看了一百多部西方电影，有些影片还不止看一遍。对她而言，美国电影中的纽约地平线象征着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创造力。在她的白日梦中，勇敢、粗暴、果断的个人主义者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杀伐决断、快意恩仇。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相形之下，一天到晚争取配给的苏联小市民无异于鼠辈。

30 年代，移民美国的兰德和留在国内的列夫都结了婚。他们虽然没有再见面，但犹太人那种东方式家族关系网始终在发挥新闻传播功能。1937 年，列夫因“阴谋破坏列宁格勒坦克工厂”的罪名送命。这时，大清洗正处于高潮期。工程技术人员的罪名一般就是“阴谋破坏”，正如党政军人员的罪名通常是“通敌叛乱”。这些罪名绝大部分都是捏造的，但具体的案情或许永远不会真相大白了。1960 年代，兰德仍然为列夫而惋惜：“（列夫的）整个问题……在我的头脑中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我（对他选择伴侣）的唯一解释……将会是我在《我们活着的人》中写利奥的那些文字。那是蓄意的自我毁灭，是故意将他自己交付给平庸……（在俄国的压制下，无论他拥有）多高的价值，都不会有出路。”70 年代，妹妹诺拉（Nora）给兰德带来了更大的刺激。她发现，苏联的生活能使最心高气傲的人消磨殆尽，改造成满心嫉妒和小算盘的畸人。热爱西方的少女诺拉在精神上已经死亡。如果列夫熬过了大清洗，恐怕也不再是那个她曾经爱过的人。

1923 年，罗森鲍姆一家找到了一个可以单住的公寓。熟读 20 年代俄苏文学的读者都会明白：在两京享有单独的公寓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只有当局专门照顾的人和特别会走门路的人才能享受。罗森鲍姆家不可能属于前

者，因此我们只能断定，他们始终特别善于做人。单独的公寓不仅是物质的待遇，而且是安全的保证。在那个告密横行的年代里，合住无异于永无止境的猜忌和伪装。不过，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吉诺菲只能依靠出售革命前留下的首饰，勉强维持家用。安娜只能把战前留下的西装裁剪成女儿的晚礼服。一家人用破旧的英国普里默斯煤油炉做饭，靠煤油灯读书。小米粥是日常的主食，豌豆和土豆是难得的牙祭。

这一年，兰德遭遇了一生最大的危险。前一年（1922年），苏联用“哲人船”流放了220名知识分子。[2] 她的母校斯托尤宁学校同时关闭。随后，清洗的浪潮转向学生。她的大学决定开除三分之一的学生，阿丽莎也在其中。她像《我们活着的人》女主角基拉一样，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反苏言论”不可能长期逃过当局和积极分子的注意。不过，她的运气总是好得出奇。就在这时，一个西方学生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听到消息，向当局提出抗议。这时，苏联对外宾还稍有忌惮。再过十年，这种抗议就只能适得其反。无论如何，兰德再次搭上末班车。1924年10月，她获得毕业证书。然后，她在新成立的国立银幕艺术中等技术学校（State Technicum for Screen Arts）找到了工作。不过，她已经决心移民美国，投身电

影业（她在大学期间看过的电影没有白费）。和上次在克里米亚一样，母亲安娜支持她出走，父亲吉诺菲仍然反对，但这一次不再有人听他。

东方犹太人的大家族为兰德提供了移民渠道。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安娜的姑妈伊娃·卡普兰（Eva Kaplan）全家移民美国芝加哥。伊娃的哥哥(也就是兰德的外祖父）伯克·卡普兰（Berko Kaplan）为他们提供了路费。根据大家族伦理，他们家理应回馈（即使从未见面的）老家亲戚。兰德自己在美国站稳脚跟后，也没有忘记老家的亲戚。这种行为模式清楚地表明，她的个人主义标榜主要出于仇恨集体主义，而非爱慕盎格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战和革命期间，罗森鲍姆一家和美国亲戚的通信中断了。这时，他们刚刚恢复联系。兰德请求母亲，要伊娃的女儿明娜·古德伯格（Minna Goldberg)、安娜·斯托恩（Anna Stone）和莎拉·利普顿（Sarah Lipton）邀请去美国。她们欣然同意，寄来了必要的资助宣誓书。不仅如此，莎拉·利普顿在芝加哥还拥有并经营了一家电影院，她许诺，如果兰德愿意的话，可以到她那里工作。1925 年春天，兰德申请了一个苏联护照。她声明自己只打算到美国访问半年，然后会返回苏联制作宣传电影。当时，苏联人出国的机会之窗尚未完全关闭。只要再等两年，这样的

申请肯定就会遭到否决。兰德如果留在国内，下场不会比列夫更好。然而，幸运之神总是特别关照她。

1925 年秋天，宝贵的护照终于发下来了。兰德预订了次年 1 月的船票。伊娃已经去世，但她丈夫哈里·波特努瓦（Harry Portnoy）和女儿安娜·斯托恩为她付了票钱。在此之前，兰德还必须到里加的美国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安娜卖掉了最后一点首饰，筹足了女儿投奔“世界上最自由国度”的路费（大约 300 美元）。兰德把寥寥几件衣服和打字机放进外婆的箱子，穿上母亲的旧夹克，1926 年 1 月 17 日（她 21 岁生日前六天），她登上驶向里加的火车。父亲、母亲、外公、妹妹、姨妈、表姐妹和列夫·贝克尔曼在火车站送行。这时，列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她的手。火车出站时，她叫道：“我成名了就回来。”当然，她一去不复返。老家的许多亲戚逃得过希特勒，也逃不过斯大林。后来，吉诺菲对妻子说：“走着瞧吧！她会扬名立万的。”

美国驻里加领事馆的任务之一，就是防范探亲的东欧移民赖在美国不走；但兰德的运气一如既往地好。她成功地拿到签证，穿过柏林、巴黎，来到勒阿弗尔（Le Havre），登上横渡大西洋的“德·格拉斯”（De Grasse）号。在柏林换车时，她度过了自己的 21 岁生日。这时，表妹

维拉·古萨奇科（Vera Guzarchik）也已经来到柏林留学。她们一起看电影庆祝。2月19日，“德·格拉斯”号驶入纽约港。兰德向移民局官员保证:她的未婚夫还留在苏联，她不可能在美国久留。这话当然是在撒谎。兰德后来把自己塑造成个人主义道德的宣传家，赞颂正直诚实的新教徒美德。私下里，她却对朋友说：如果他人的不义使诚实危及自身，诚实的义务就会自动终止。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正直诚实的美德如果不是属于统治者，至少也是属于公民。被征服者的正直诚实对他们没有好处。东方犹太人如果对外族严守不得发假誓的律法，大概早已灭种。在这方面，东方各国的顺民跟他们同病相怜。19世纪的英国军官总是认为东方人怯懦而诡诈，东欧各国主体民族对本国犹太人的看法也是这样；这种相似性大概不是偶然巧合。一方面，美国的特点只有在异质文化对比之下才格外明显；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他们笔下的美国格外具有心理投射的性质。异乡异客的忠诚不是面包与葡萄酒，而是胡椒与龙舌兰酒。

注释：

1. 格里菲斯（D. W. Griffith, 1875—1948）、弗里兹·朗格（Fritz Lang, 1890—1976）、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 1892—1947）、塞西尔·B. 德米尔（Cecil B. DeMille, 1881—1959）都是20世纪初的著名电影导演。

2. 1922年8月，列宁为清剿可能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知识分子，驱逐了当时苏联知识界的精英。后者被迫乘坐两艘德国船只离开。

第六章

创造安·兰德

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大厦蔓延直至纽约的天际，人类的意志力是如此明显。

——《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

安娜・斯托恩（伊娃的女儿）通过她丈夫曼德尔（Mandel Stone），安排曼德尔的亲戚罗森接待兰德。罗森一家在纽约东河附近的萨顿有一套富丽堂皇的宅邸。在兰德心目中，他们和帝国大厦都是资本主义繁荣的象征。不过，她能在美国立足仍然要依靠家族集体主义精神。当时，她身上只剩下几十美元，只会说十几个英语单词。而且，照她后来的说法，这些单词“全都发音不正”。苏联学校的外语课一般是德语和法语。

1926年，“柯立芝繁荣”[1]正在巅峰。霓虹灯、T型汽车的喧嚣、百老汇的流光溢彩在苏联的宣传材料中构成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在无数青少年心中种下了憧憬西方禁果的苗头。兰德立刻陶醉其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里。难以置信的欢乐与不羁，跟苏联真是大相径庭！”爵士时代的拜金热情和20年代的路易斯・布鲁克斯发型[2]给她留下了终生的印刻。她的作品在字面上绝对信任逻辑和理性，但那种“土鳖移民见世面”的天真热忱始终呼之欲出。只有厌倦的贵族才会发现穷山恶水的浪漫；胸怀大志的乡下少年进城，要的就是灯红酒绿。兰德作品挥之不去的场景总是这些菲茨杰拉德[3]式的意象，她的文学吸引力主要在于绚丽的意象和炽烈的渴望，而非图解式推理。当然，她不会忘记自己的最爱。她在纽约逗留四天，就看了

四部无声电影。其中一部是法庭情节剧《不愿工作的女孩》。兰德在30年代成名，主要就是依靠撰写这种剧本。

在纽约开往芝加哥的列车上，兰德（当时还叫阿丽萨·罗森鲍姆）为自己设计了"安·兰德"（Ayn Rand）这个新名字。这时，她已经下定决心投奔好莱坞。梦工厂的灯红酒绿之于满腔幻想的苏联大学生，犹如金銮宝殿的雍容华贵之于茅屋中的范进。一朝得偿所愿，简直无异登仙。兰德的后半生精确地显示出她青少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渴望。有趣的是，她的认知图景跟苏联宣传中的资本主义大本营高度一致，跟盎格鲁新教徒心目中的山巅之城却相去甚远。在她的后半生，好莱坞（以及美国）始终意味着自由与冒险、投资与回报、蔑视清规戒律的不羁生活。她对另一个好莱坞不屑一顾。后者是基要基督徒[4]的重镇，《圣经》价值观影片的票房相当于其他影片的四倍。数千名男女演员是虔诚的教徒。法律授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他们却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自律规则。著名的反色情《海斯法典》[5]就是这些自律规则之一，它的废除绝不意味着行业自律的结束。

这不是文化产业独有的现象，美国大多数新教社区和重要行业都有远比国家法律更苛刻的自我约束。一位医生或律师早在有机会面对陪审团之前，就会遭到同业的集

体歧视，再也没有办法把生意做下去。美国自由派（左派）后来反对的目标就是这些社区和行业自治规则，而非原本莫须有的国家限制。在50年代的所谓“麦卡锡白色恐怖”[6]中，真正有幸引起这位参议员或其他议员注意的左派人士少之又少。大部分“迫害“实际上就是各社区和各行业对他们的集体歧视和保持距离。许多人难以忍受这种千夫所指的难堪感觉，不得不逃往欧洲。在欧洲（尤其是拉丁国家），国家管制更严厉；但在国家触角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几乎认为“凡是成文法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在美国，只有新移民和知识分子可以多少豁免新教徒的自治规范。值得注意，兰德终生没有脱离这两个圈子融入主流社会。她在政治上的门徒罗恩·保罗（Ron Paul）父子遭到保守派主流的侧目而视[7]，正如她的客观主义哲学遭到哲学界主流的类似待遇。在知识分子圈内，兰德是文学家的成功典范；从移民社会学角度看，她却是失败的典范。在某种意义上，“创造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除根（切断乡土和社会联系）过程。知识分子的私人生活大多不幸，美国（至少人文）知识分子往往由外国移民或难民（及学生）组成，原因就在于此。

19世纪以来，社区自律和国家管制的斗争构成英语世界保守与进步斗争的核心内容。知识分子大体上站在进

步一边。他们对新教规范的严苛有切身之痛，希望借助强大的国家干预创造更加宽容的社会。而且，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天高皇帝远的国家管制肯定比近在咫尺的社区集体监督更有空子可钻。然而，保守派认为，以国家管制取代社区自治，肯定会将英语世界变成另一种版本的法兰西或意大利；武断统治和社会放纵的结合并不令人羡慕。自古以来，美国人歧视腐败的欧洲，英国人歧视腐败的大陆，西方人歧视腐败的东方，原因都在于此。在前者眼中，后者是暴虐政府和堕落国民罪有应得的组合。一旦政府武断为治，国民就遭到虐待；一旦政府放松管制，国民的放纵就会造成非专制不能止乱的格局。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不太值得同情。这条鄙视链造成了许多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斗争路线图与此大同小异。兰德那种蔑视宗教和社区的激进知识分子乌托邦不受前者欢迎，坚决敌视大政府的立场又不受后者待见。她亲睐的自由意志派不成气候，但她并不怎么介意。她真正的关注在于：一面利用美国资本主义的机会，一面全心全意反对苏联集权主义。她的态度为她赢得了某种超党派的尊重，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不受欢迎的无神论和尼采主义。这种形势绝妙地展现了兰德的蛮族名将身分。瓦伦斯皇帝[8]和李林甫宰相[9]

都发现：蛮族将领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介入帝国的党派斗争，因此比本国将领更安全；远比本国人更了解蛮族敌人的特点和弱点，因此比本国将领更善战。

兰德改名换姓当然主要是为了规避美国移民局的管制；但她为什么选择安·兰德这个名字，却是一个不解之谜。兰德本人提出了几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明显不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实话实说。读者猜测了几十年，没有得出什么可信的结论。流行的几种解释是：借用一位芬兰男作家的名字，借用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10]牌打字机的名字，俄国原名的缩写或变形，希伯莱语昵称的变形。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她绝少对人泄露真名实姓，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都不愿意让人知道犹太人的出身。罗森鲍姆家族在美国的分支全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显然，犹太家庭对安全的焦虑已经融化在血液里。兰德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肆无忌惮的冒险者，具备“自己人”才有的身分自信。她自己可不是这样。

安娜·斯托恩的曾孙女说，曾祖母和其他亲戚告诉她：兰德认为她不能用犹太人的名字出书，因为人们不会听犹太人的话。这种说法比兰德对公众的说辞更可信，因为根据东方人的习惯，家族才是真正的祖国，真心话只能对血亲说。“抬起你的头，有话直说。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

这种习俗只能适用于得天独厚的盎格鲁人，在东方人的生活环境中万万行不通，即使移民美国，也要经过两三代人才能摆脱隐秘诡诈的习惯。当然，这种现象造成至少加强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偏见。“犹太人的话听不得”只是偏见的一小部分而已。甚至到60年代，兰德已经是著名的公众人物，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左派和右派的要人，却仍然对自己种族身分讳莫如深。兰德在荣耀中去世时，身边的朋友和崇拜者居然无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新诞生的兰德在美国买下了她第一部英语著作：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1]。她在斯托尤宁学校时，早已熟悉这位意志论的鼻祖。此后，她的自由意志论和精英反传统论还要大大借重尼采的洞见。对许多作家而言，创作时期就是学习时期的结束。兰德就是他们的一员。美国是她安全创作的庇护所，却不是她的思想源泉。从文学意义上讲，她从来没有离开萨文科夫和布尔加科夫的世界；从思想意义上讲，她从来没有离开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

注释：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恰巧在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872—1933）任期之内（1923—1929），所以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

2. 路易斯·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 1906—1985）是“爵士时代”的著名性感明星。她的头型就是所谓的“波波头”。

3.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小说家，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4. 坚持《圣经》原旨的基督徒，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选民库。

5. 原名为《制片法典》（*Production Code*），是禁止女演员脱衣露点的电影行业规范，由后来的共和党总统威廉·海斯（William Hays）制定，习称“海斯法典”（*Code Hays*）。

6. 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掀起的全国性反共运动。他任职参议员期间，宣称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许多著名人士成为怀疑对象而被调查。

7. 罗恩·保罗（Ron Paul, 1935—），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医师、众议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1997年起一直担任德州第14国会选区的众议员，2007年宣布投入2008年总统选举，组成竞选考察小组。兰德·保罗（Rand Paul, 1963—）是罗恩·保罗之子，美国政治家，

茶党人士，原为一名眼科医生，2010年赢得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资格。保罗父子在共和党内非常孤立，在反恐战争中跟民主党结成了极不自然的联盟，始终无法在自己的选区外建立全国性政治联盟。

8. 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Flavivs Ivlivs Valens, 328—378），罗马帝国东部皇帝（364年至378年在位）。

9. 李林甫（683—752），唐玄宗李隆基时的著名宰相。

10. 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1927—1986），美国早期的一家电脑制造商。

1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尼采假托古波斯祆教创始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于1885年写作完成的书，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被誉为超人的圣经。

第七章

好莱坞的召唤

人只有为自己而活，他才能成就那些成为整个人类荣光的事业，这就是成就的本质。没有人能为了别人而活。他不能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身体一样。

——《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

列车将未来的先知带到芝加哥亲戚的门口。热情好客的表姊妹在拉萨尔街火车站迎接她。家族集体主义是东方人真正的大宪章。美国俄裔犹太人生而有义务为老家亲戚提供中转站；正如俄罗斯犹太人有义务争取移民、光宗耀祖，为以后的亲戚提供中转站。兰德在斯托恩家里住下，尽情享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洗多久热水浴就洗多久”的乐趣。这无疑是她生活中第一个真正的假日，因为她忍不住用俄国口音高唱“我坐在世界之巅”，使明娜表姐难以忍受。经过这样切身的对比，她对苏联的看法再也不会改变了。后来的苏联和东欧（当然还有古巴）外交官都知道：如果想争取美国的同情，只能指望搞东方贸易的资本家。没有特殊利益的美国劳动阶级不信任他们，但最痛恨他们的势力莫过于本国的移民。

斯托恩一家在芝加哥做服装生意，习惯于为“进城土鳖”指点方向；但兰德胸有成竹，显然不需要他们的指点。她下车第一天，就去看当时的大片《宾虚》（*Ben-Hur*）。该片讲述罗马的传奇，在抗战时期的中国也曾红极一时。她不肯提俄罗斯老家的情况，一开口就是她将来打算做什么。她用自由意志论解释说：一个人碰巧出生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他作出的自由选择才有意义。这种理论与其说符合真实情况，不如说符合她励志

向前看的心理需要。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她不断给老家写信，给妹妹寄乐谱、电影介绍和衣服，给妈妈寄美国小说（供翻译挣外快），还试图把全家弄到美国。在当时的苏联，一个家庭有没有侨汇收入（即使有政府官员中途打劫）往往就能意味着生死存亡的差别。罗森鲍姆的家族伦理其实是小圈子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忘记老家亲戚”是一个相当负面的评价。

兰德一开始就没有把芝加哥当作归宿，好莱坞才是她的目的地。她在亲戚家里逗留了半年，主要是学英语，看电影，写剧本。她一连看了128部电影，自己写了4部剧本，自觉进步很大。这些电影当中包括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的《伏尔加船夫》、《通向昨天之路》。她给列夫·贝克尔曼写信说：希望他到美国来。她承诺，“即使你等到1947才来，即使那时我已经成了好莱坞大明星”，她也会亲自到车站接他。列夫有没有收到这封信，无从考证，但这并不影响结局。幸运之神已经将兰德送上了末班车。她一走，苏联就改变了移民政策。没有500美元外币或黄金，没有人能够离开苏联。当然，没有任何依靠合法收入生活的苏联人能够拥有这么多钱。生离就是死别。兰德后来说，这条法规就是“第22条军规”[1]，因为苏联公民私藏外币、黄金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苏联当局的想法是拿本国国民做人质，指望他们的海外亲戚朋友替他们出钱赎身。

兰德的表姊妹为她弄到了半年的签证延期，一封写给著名导演塞西尔·B. 德米尔的介绍信和100美元，送她登上西行的火车。不知为什么，她们和兰德的父母一样坚信她肯定会成名。或许，发现和保护优等生也是犹太人家庭生而有之、超越个人好恶的本能吧。鲤鱼跳龙门的兰德故态复萌，亲戚都觉得她目空一切，不体谅人，却仍然为她尽心尽力。明娜后来说，兰德从来没有归还奋斗时期借的钱。照她的说法，兰德当时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会送你一辆劳斯莱斯和一件貂皮大衣。"结果，"我连5美分都没有拿到。"兰德发迹变泰后，芝加哥亲戚觉得她待丈夫弗兰克·奥康纳一家比待娘家好。她们还抱怨她隐瞒列宁格勒老家的窘困，不过，这种指责不大公平。如前所述，兰德没有忘记她从小长大的家。各房都觉得她待别家更好，给自己送少了。既然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就无须介意她到底偏爱娘家还是夫家，或是偏爱娘家的哪一房了。如果她当真奉行美国式个人主义，这些纠纷根本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她的亲戚都奉行这种主义，她也来不了美国。她初来乍到时的沉默不难理解：如果你正在"社会阶梯"上奋力攀登（兰

德对苏联的痛恨跟她对“上进”的爱是一回事），你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向下看。如果兰德心里觉得芝加哥亲戚是“社会阶梯”的中间部分，她的目的地好莱坞是“社会阶梯”的顶部，她自然不乐意暴露自己原先所在的列宁格勒家庭情况，因为后者已经随着苏联落入“社会阶梯”底部。

兰德怎样遇见她生命中的贵人，跟她为什么取名一样，构成了文学史上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相互矛盾的说法有好几种，兰德自己的叙述一点都不可靠。有人说：德米尔请兰德搭车兜风，兰德上了车才想起来问他是谁。有人说：兰德在俄国的电影杂志上见过德米尔的照片，一开始就认出了他。她的亲戚推测：兰德从不错过成功的机会，主动跟踪德米尔才是她的作风。或许，这些亲戚对她的成功（以及贵人多忘事的派头）多少有几分嫉妒或不满。最传奇也最不可信的说法酷似兰德本人的电影剧本。她带着介绍信上门，却没有遇见导演本人。电影厂完全不理她的自荐。她顶着加利福尼亚八月的烈日，走到停车场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突然（每个电影迷都能料到下面的场景），一辆豪华的敞篷车停在她身边。下车的人正是德米尔本人！命运女神的使者（因为兰德是无神论者）好奇心发作，邀请神秘女郎搭车兜风（又一个标

准的好莱坞电影场景）。他们边开边聊，来到德米尔拍摄《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的斑鸠电影城。兰德下车时，已经在这个拍摄现场找到了工作。

无论哪一种说法更可靠，故事结局都完全相同。兰德从摄影城领到了服装和薪水，在好莱坞电影厂俱乐部找到了一个房间。德米尔后来说，房间是他帮兰德安排的，因为他太太就是俱乐部董事会的成员。但兰德否认这种说法。既然她承认德米尔在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帮过忙，似乎没有什么理由隐瞒他在这样的次要问题上出过力。无论如何，兰德自己的说法是：芝加哥亲戚事先就建议她找本地基督教女青年会，是青年会值班员介绍她去电影厂俱乐部的。如果这个故事是她编出来的，最合理的动机大概就是想夸大自己的个人奋斗精神。如果德米尔的故事是他编出来的，最合理的动机大概就是想夸大自己培养人才的功劳（兰德的芝加哥亲戚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动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兰德的新居比她在苏联的条件好多了。俱乐部的房间干净宽敞，有图书馆、健身房、排练剧场，每周二在庭院的绿荫下举行舞会。兰德在那里住了两年半，每周付 10 美元，包括早晚餐在内。当时，她的工资是每天 7 美元。

兰德后来说她的好莱坞岁月非常糟糕，这里的人太

野蛮。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每走一步都遭到那个世界的嘲笑和拒绝”。然而，她说这话的时间是1936年。那时，兰德已经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她对过去的看法自然会受到现在处境的影响，甚至把当年高攀不上的贵人德米尔看成一味追逐票房的小人。一切迹象都表明，1926年的兰德非但没有不满，反而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她刚刚在俱乐部安顿下来，就给家里写信，把她争取德米尔的成功视为一大胜利。德米尔教她电影制作的基础知识，让她把一部感伤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8个月后，德米尔把她的工资涨到每周25美元。对于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手，即将遭到驱逐的移民，这种待遇相当慷慨。好莱坞是东欧移民和知识分子（二者往往是一回事）云集的城市，兰德的俄国口音在这里不会引起大惊小怪。1927年夏天，她升任审稿编辑。这个职务的实质是：审核大批似乎有潜质的稿件，选出少数值得进一步改编的剧本。审稿编辑是好莱坞流水作业线上的齿轮，根据商业需要和创作技巧评判作品。编辑本人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偏好基本不起作用。不过，兰德的笔记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她完成了尼采式英雄颠覆庸人习俗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将会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她写道：“情节主线：克服障碍，争取胜利。”电影技巧对她的小说并非没有帮助，男主人

公力挫凡夫俗子的易卜生式戏剧性姿态[2]就来自她当时改编的标准电影尾声。在此期间，她自己还为德米尔写了6个剧本，但最终没有一个能拍成电影。

斑鸠电影城给兰德带来的主要收获是弗兰克·奥康纳。弗兰克出身于爱尔兰天主教工人家庭，却由于博览群书而主动脱离了信仰和阶级。《万王之王》是他投身演艺圈的第一次尝试。兰德第一次见他打扮成罗马士兵的模样，就果断地决定倒追他。她直到垂暮之年，仍然对弗兰克的英俊外形赞赏备至。两人才说过两次话，弗兰克就消失了。1927年5月，他们在好莱坞公共图书馆偶然相遇。兰德这时才发现，弗兰克以前根本听不懂她的俄式英语。此后，他们在晚上和周末约会。两人都是鄙视神秘主义信仰的无神论者，鄙视学院派的自学成才者，鄙视伪善的个人奋斗者。1929年4月15日，兰德和奥康纳结婚。这时，她的签证刚刚到期。1929年6月，她作为美国公民的妻子获得永久性签证。兰德开玩笑说："在山姆大叔的机关枪威胁下，我别无选择。"我们不难判断，以美国社会对移民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和兰德惊人的决心和活动能力，她无论如何都会找到某种留在美国的办法。这次婚姻其实只决定了一件事：她在法律上归属美国的同时，走上了一条通向社会边缘的道路。无论她在文

学上多么成功（甚至正因为这种成功），游士无神论者的道路永远不会跟新教徒主流社会的道路交叉。

注释：

1.《第22条军规》（*Catch-22*）是一部黑色幽默长篇小说，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23—1999）的代表作。名词"Catch-22"已被列入英语词典，象征身处一种荒谬的两难之中。

2.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易卜生用不留情的眼光来看生活的实际，提出了新的道德问题，由此创立了现代话剧。

第八章

步入光荣之路

克己不是我的前提。如果我看到善对人而言是可能的，但它却突然消失了，那么我不会把“这是世界的一种趋势”当做充分的解释。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什么让它消失的？

——《浪漫宣言》引言

（Introduction to *The Romantic Manifesto*），1969

《万王之王》的拍摄一结束，弗兰克·奥康纳就离开了斑鸠电影城。1928年8月，塞西尔·B. 德米尔决定加入得天独厚的米高梅公司[1]，关闭自己的电影厂。于是，兰德脚下的“社会阶梯”又倒塌了。在这段不受欢迎的闲暇时间内，她重温小说创作技巧。这些作品模仿的痕迹颇重。例如，《小街》（*Little Street*, 1928）的创意明显源于刘易斯·辛克莱的《大街》[2]。兰德在斯托尤宁学校时就非常喜欢这位讽刺作家。他们同样憎恨习俗和庸人对天才的压制，但有一项重大区别。《大街》根本没有法律和政治压制的影子，医生丈夫、大学生妻子—开明进步分子和愚昧群众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书弥漫着一片风俗画和轻喜剧的气息，使读者几乎不会留意费边主义的陈词滥调。《小街》的英雄威廉·希克曼（William Hickman）不再是费边社家长式慈善科学家，而是尼采式反社会超人。他不满足于讽刺志得意满的小布尔乔亚，直接向法律和陪审团挑衅。他掐死了一个8岁的女孩，然后“带着轻蔑的表情”，横眉冷对愚蠢、肥胖的陪审员（刘易斯的巴比特式人物）。“他不理解其他人的必要性、意义和重要性，因为，谢天谢地，他缺乏理解的官能。其他人并不是为他存在的，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应该存在。”兰德评论说，“群众的目标不外乎摧毁个人与个性……—

个强人最终会将社会踩在他的脚下。那个小伙子(希克曼)还不够强大。”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弃基督，信仰尼采，《罪与罚》[3]的宗旨大概就会变成这样。

辛克莱和门肯对他们嘲弄的美国乡民有感性的理解，兰德的群众却纯粹是抽象思维的符号。她塑造的人物兼有尼采主义者对群众的蔑视、犹太人对暴民的恐惧、个人奋斗者对因循小市民的反感，以及敏锐优等生对迟钝庸人的优越感，唯独缺乏陈词滥调所谓的“有血有肉”。他们没有一丁点巴比特的美国味儿，正如《1984》里的奥博莱恩[4]完全不像英国人,《我们》里的O[5]完全不像俄国人。他们没有乡土，没有嗜好，总是一丝不苟地执行逻辑推理的结论,像电子游戏里的角色一样图解化、程序化。如果说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是貌似哲学的文学创作，那么兰德的小说就是貌似文学的哲学对话。即使如此，她还是忍不住从人物背后跳出来现身说法:“你就是你的意志，此外别无他物……意志能征服一切。余者皆属微末。”

1929年7月，这对新婚夫妇搬进好莱坞北高尔街的一座公寓里。兰德在雷华电公司(RKO)女性服装部找到一份抄写员工作。她在这里干了三年，最后当上了部门负责人，工资从每周20美元涨到40美元。她开始给父母寄钱，安娜和吉诺菲用来购买食物和必需品。在新经济政

策结束后的惨淡时光[6]，哪怕一点点外汇都无异于一笔财富。1929年10月开始的大萧条没有影响兰德的工作。她在固定收入的保证下，可以从容创作。她说："我到美国来是搞创作的，我没有忘记那一点。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放弃的东西。"在此期间，她完成了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剧本、一部舞台剧本。这些作品为她奠定了成名的基础。

电影剧本《红色人质》（*Red Pawn*）以革命的苏联为背景，地点在西伯利亚海岸附近的岛屿监狱。革命前，这里曾经是东正教的修道院。事实上，整个布局酷似真实历史中的索洛维茨群岛。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7]中描绘了这里的悲惨故事。剧本一开始，美国女郎琼（Joan）来到岛上应聘。苏联司令官卡达耶夫（Kareyev）以为她上当了，因为他以招聘为借口，其实只想给自己找个情妇。在这个远离尘寰的人间地狱里，他就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他不知道，琼也觉得他上当了，因为她其实是一位囚徒的妻子，想要借机救出丈夫。她丈夫是工程师，因为能力过人遭到当局的猜忌和清洗。在当时，这样的案件非常普遍。美国女人用西方的时髦服装和个人主义思想引诱粗鲁的布尔什维克军官。这种诱惑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却变成了苏联宣传人员的噩梦。他们总是把西方描绘成邪恶而难以抗拒的诱惑者，警告青少年不

可一失足成千古恨，结果多半是提高了禁果的魅力。兰德第一个将这种构想引进好莱坞，然后葛丽泰·嘉宝[8]用在电影《尼诺奇卡》（*Ninotchka*）当中，伊恩·弗莱明[9]用在小说《俄罗斯来客》当中。在这三个故事中，缺乏人性的苏联主角都抵挡不住西方自由思想的威力，弃暗投明。兰德为了增加悬念，直到最后才让观众知道她到底喜欢哪一个男人。她此后还会一再娴熟地运用这种技巧，证明自己在好莱坞没有虚度时光。

兰德给一位制片人写信，说她在这个剧本中发明了"层级构建"的新方法，也就是说：低档次的观众可以满足于欣赏惊险悬疑和三角恋爱，不会妨碍高档次观众体会其中蕴含的思想冲突。其实，切斯特顿[10]的《布朗神父探案》（*Father Brown*）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后来，埃科[11]写《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兰德表现的思想冲突不仅限于西方个人自由观念和东方专制极权观念之间。在她看来，古老的东正教[12]清规戒律似乎在新兴的集体主义荒谬教条中复活了。这种性质的反思在1968年的捷克盛极一时[13]，骨子里是无神论理性主义的产物，正宗的盎格鲁新教徒大概不会赞同。后者对东正教及其痉挛式表现并不佩服，但肯定不会承认宗教约束可以跟武断政治混为一谈。兰德不介

意二者在哲学层面上的差异，更在意二者在大众政治层面上的一致。这本身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层级构建”。

新兴的苏联是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媒体众说纷纭。大萧条给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苏联计划经济社会制度增加了不少说服力，但这种说服力只能打动从来没有见过苏联的人。不出所料，兰德一点也不想被说服。“俄国热”增加了俄国题材剧本的销路，对她相当有利。1932 年 9 月，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s）以 700 美元买下《红色人质》。他们还付给兰德 800 美元，让她改编电影脚本。兰德有了这笔钱，才毅然走上全职作家的道路。她就此辞去雷华电公司服装部的职务，搬进了利兰·布莱恩特（Leland Bryant，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全盛时代在 1920 年代）设计的特里亚农豪华公寓。《红色人质》虽然最终未能上演，仍然是兰德文学荣誉的真正起点。她第一次接受报纸采访，就是因为这个剧本。这篇报道名叫《俄国女孩嘲笑大萧条的怨言》。兰德比较苏联劳动者的恶劣处境和美国失业者的所谓困难，轻蔑地说：“美国劳工养尊处优，俄国人面临的代价却是处决。”其实，大萧条对兰德夫妇反而有利。当时百业凋蔽；唯有好莱坞受益于闲暇时间的增加，梦工厂的黄金时代跟大萧条重合并非偶然。水涨才能船高。随着有声电影的繁荣，奥康纳的演员事

业也渐有起色。两人有钱装修新公寓,还买了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二手纳什牌汽车，兰德始终没有学会开。看来，塞西尔·德米尔对她驾驶技术的赞美只是一种恭维。

《我们活着的人》也在这段时间完稿。这部小说跟《红色人质》一样，以苏联革命为背景，以三角恋爱为卖点（仍然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暗藏思想斗争的主题。女主人公基拉周旋于高傲的世家子弟和布尔什维克军官之间，利用后者的资源为前者出力，最后在逃往西方的路上被哨兵打死。兰德称之为“关于俄罗斯的真正宏大作品”。不过,她同时创作的舞台剧《一月十六日夜》(*Night of January 16th*)赢得了更大的成功。剧本的情节大致如下：瑞典金融家比约恩·福克纳（Bjorn Faulkner）从豪宅阳台上坠楼身亡。人们最初都以为是自杀，但陪审团发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证据。福克纳的秘书凯琳·安德烈(Karen Andre）是他的秘密情妇。福克纳最近结婚，凯琳有充分的谋杀动机和机会。福克纳企图通过婚姻骗取岳家的财产，很可能想偕凯琳私奔。他的岳父同样有充分的谋杀动机和机会。兰德预先发明了类似互动剧的构思：剧本采用开放式结尾，从观众当中选出陪审团。他们的裁决就是戏剧的结论。

兰德表示，如果观众是浪漫主义者，就会相信凯琳

充满激情的自白；如果观众是现实主义者，就会相信那些自命道德的小市民证人，相信凯琳是淫妇，福克纳的岳父是体面人。她还补充说，如果观众选择后者，就说明他们的“生命意志”是怯懦的。尼采门徒有这样的创作动机，极其自然。尼采的另外两位门徒易卜生和萧伯纳[14]同样蔑视“坚实的多数派”和“庸人的民主”，崇拜挑衅习俗的强力意志。他们的自由不是免于武断统治的自由，而是免于习俗专制的自由。然而，庄严同盟[15]和长期国会[16]的徒子徒孙完全清楚：这两种自由背道而驰，不可兼得。社区自律比法律更严苛，外在的约束才可能解除。习俗的权威一旦瓦解，你就只能在政府管制与社会解体之间选择其一。法国吉伦特党[17]和以后的东方革命家都曾把美国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却惨遭冷落和鄙视，因为他们当时还不明白：社会保守是政治自由的亲兄弟，正如社会激进是政治专制的亲姐妹。假如兰德并非出身犹太家庭（因此只有在美国和以色列才能呼吸通畅），并未亲身体验苏联的生活，有机会在欧洲大陆的知识界发展，十拿九稳，她会成为另一个邓南遮[18]或汉姆森[19]。那样，缺乏哲学素养的公众就不会把自由意志论误认为美国个人主义的分支，而会望文生义，却又歪打正着地看出自由意志、生命意志和强力意志的血亲关系。

注释：

1. 米高梅公司（Metro-Goldwyn-Mayer [MGM]），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1922年创办。

2.《大街》（*Main Street*）写于1920年，是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为背景，描写一位城市女知识分子嫁到小镇上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太太后的故事。起初她满怀热情，企图“改造”这个受传统保守势力束缚的小镇，但遇到巨大的阻力，以至被迫离开小镇工作，但最终仍不得不回来，继续面对无法改变的传统势力。“大街”一词也因此被赋予特别的含义而收入词典。

3.《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是一部卓越的心理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故事以刑事犯罪为题材，讲述相信罪恶理论的主人公大学生为生计所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及其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凶杀案。虽然有机会能够完全逃脱法网，但他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最终在基督徒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决心忏悔、赎罪，以获精神上的新生。小说包含了作者对诸如生死、善恶、信仰等人类永恒主题的思考，是举世公认震撼灵魂的名著。

4.《1984》（*Nineteen Eighty-Four*）创作于1948年，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创作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描绘了一个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奥伯莱恩（O'Brien）是书中一个人物。

5.《我们》（*We*）创作于1920年，是俄苏作家叶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iatin, 1884—1937）创作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此作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篇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书里人物没有姓名，只有编号，O即是其中一个人物。《我们》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等反乌托邦作品。

6. 新经济政策是俄共（布）于1921年颁布实施的一项政策法令。旨在以实物税的形式代替先前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政策，此项政策亦在工业领域进行了延伸。经济政策成功地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革命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1928年，该政策被斯大林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引进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经济政策通常被认为是过渡性政策，并且不为布尔什维克政党中的激进分子所热衷——他们视之为与资本主义的妥协甚至是对共产主义信条的一种背叛。列宁曾就新经济政策说过："我们退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前进两步。"这也印证了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对列宁遗愿的完成。

7.《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是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最有力和最有影响的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古拉格比喻苏联的集中营。作者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上面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亲自在集中营中生活过，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他们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这本书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1973年在西方出版。在苏联，此书一直作为

地下读物流传，直到 1989 年才公开出版。

8. 葛丽泰 · 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电影女演员，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逝于美国纽约，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明星之一，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99 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 5 名。

9.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 1908—1964），英国作家和记者，其中以小说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系列及儿童故事《万能飞天车》（*Chitty Chitty Bang Bang*）为主要作品。

10. 吉尔伯特 · 基思 ·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者及神学家。热爱推理小说，不但致力于推广，更亲自撰写，所创造最著名的角色是“布朗神父”，首开以犯罪心理学方式推理案情之先河，与福尔摩斯注重物证推理的派别分庭抗礼。

11. 安伯托 · 埃科（Umberto Eco, 1932—）是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

12. 东正教（Easten Orthodox）是基督教三大派之一。基督教出现后不久，就逐渐分化成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教会。1054 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派教会自称“正教”，意为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因为地处东方，故又称“东正教”；因为宗教仪式使用希腊语，故又称“希腊正教”。

13. 当时党内开明派和知识分子的流行看法是：党之所以犯了错误，因为它把自己变成了类似教会的东西。早在 1948 年，哈罗德 · 拉斯基（Harold Laski, 1893—1590）对东欧共产党人就有类似批评。这种批评属于左派，保守派只会批评党的无神论性质。

14.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费边社成员，为该社编小册子及演说，以社会改革为己任，其作品常常突出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自我奋斗的精神以及对习俗的反叛。萧伯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其思想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和马克思的影响。

15. 詹姆斯和查理国王力图在苏格兰建立拥护国王的主教制，取代新教徒的长老会。苏格兰新教贵族和牧师组织“庄严同盟”对抗查理，引起了1640年内战。此后，苏格兰庄严同盟和英格兰国会结盟，对抗查理一世。

16. 1640年内战期间的英格兰王国国会。他们推翻了查理一世，自己又被克伦威尔推翻。

17. 吉伦特派（Girondins），有时称“布里索派”（Brissotins）或“长棍面包派”（Baguettes），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立法大会和国民公会中的一个政治派别，主要代表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吉伦特派的名字来源于以上最后三人的家乡吉伦特省。

18.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著名作家，鼓吹解放习俗的生命意志。

19. 克努特·汉姆森（Knut Hamsun, 1859—1952），挪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尼采式“神秘意志”的文学诠释者。

第九章

浪人知识分子在纽约

和别人保持一致是一种美德，这是人们接受的教育。但是，创造者是不和别人保持一致的那个人。团结一致是一种美德，这也是人们接受的教育。但是，创造者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源泉》，1943

《一月十六日夜》演出的成功很快就超出了西海岸的范围。纽约戏剧界的大佬伍兹（A. H. Woods）向兰德提出非常优惠的条件，希望在百老汇上演该剧。从“社会阶梯”的角度看，兰德不可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唯一的问题是奥康纳，兰德的光荣之路可能会永远改变他在家庭政治中的地位。兰德后来宣称：丈夫同样乐于离开好莱坞，因为他对电影圈已经幻灭。这种修饰明显不符合事实。奥康纳当时的事业同样正在逐步上升，只是没有兰德的发迹那么戏剧性。他没有理由幻灭，而且肯定没有发表过不满的言论。更大的可能是：兰德运用她超强的“生命意志”，说服或影响了奥康纳。在他们的婚姻中，丈夫扮演了牺牲自己事业、成全更优秀一方的角色。这种为人作嫁的任务通常是由妻子承担的。正如奥康纳的外甥女咪咪·萨顿（Mimi Sutton）所说：“他让步，是因为尊重她。”兰德娘家人抱怨她偏袒夫家，显然不对。事实是：兰德的夫家、娘家和周围人士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她铺路，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吸引力支配。同样的模式出现在瓦格纳（Wagner）[1]、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2]，或许一切成功人士的传记中，似乎吸收、淹没他人的强势意志力就是这种人成功的必要条件。即使教会圣徒和利他主义[3]哲学的创始人都不例外，何况兰德本来就是奋

斗和成功的信徒。

短短几天时间，奥康纳夫妇就收拾好行李，告别亲友，驱车驶向纽约。“大苹果”（纽约市的别称）是移民的据点、文化界的中心、知识分子的舞台，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城市。知识分子只有在这里，才能稍微找回一点欧洲同侪的VIP感觉。1934年12月初，他们抵达纽约。伍兹立刻要她润色台词，修饰布景，准备次年1月上旬公演。他当时告诉兰德，好莱坞电影人跟他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12月中旬，兰德刚把剧本改定，伍兹却告诉她：资金出了问题，一切都泡汤了。兰德只得回到雷华电公司当审稿人。不过，幸运之神并没有抛弃她。她在文学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名望，可望引起知识精英的注意。文学经纪人简·维克（Jean Wick）正在向纽约主要出版社推荐《我们活着的人》。

兰德第一次感到美国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也是因为这部小说。她在好莱坞的崇拜者古夫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对《我们活着的人》赞不绝口，称之为“《汤姆叔叔的小屋》[4]苏俄版”。这话的寓意一目了然：苏联正在建设现代奴隶制，我们应该唤起公众的良知。他把小说的片段拿给著名评论家门肯。门肯同样赞赏小说的文学质量，却暗示说：出版社可能因为此书的政治

倾向性而拒绝接受，因为他们不欢迎公开批评苏联政府。在此之后，兰德才开始认真对待粉红色势力在美国文化界的渗透。

兰德在1932年第一次参加投票时，支持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5]。这说明她当时还没有理解美国两党斗争的实质性意义。早在好莱坞时代，一位俄国流亡者就告诉她:《红色人质》可能会得罪电影界的共产主义者。兰德当时表示难以置信。她断定：美国顶多只有极少的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能是个人主义。她现在对门肯的警告比较重视，但仍然觉得问题出在美国公众对苏联缺乏了解。他们如果知道苏联当局正在做什么，一定会惊诧莫名。她甚至觉得，揭露真相就是她的使命。她这个判断并不全错。“红色的30年代”几乎纯属知识分子现象，劳动阶级（包括弗兰克·奥康纳的父母）远比他们更坚守传统价值观。

兰德在好莱坞接触的知识分子相对较少，而纽约却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她在纽约闯荡了一两年后，才看清左翼知识分子的偏见。在这个圈子里，为斯大林[6]和托洛茨基辩护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他们不愿意面对苏联的残暴和低效，宁愿称之为社会实验不可避免的代价。他们甚至鼓吹：在美国推行苏联模式，就能解决大萧条带来

的种种问题。厄普顿·辛克莱[7]居然赢得了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参加1934年的州长竞选；不过选举结果还是证明了民众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落差。兰德越来越觉得，她有义务唤醒自欺欺人的左派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十二月党人式的使命感，相信观念播种可以改变世界。无怪乎古夫尼尔·莫里斯会把兰德比作斯托夫人[8]。她给莫里斯的回信说：她要毕生为个人主义的事业而奋斗，跟集体主义的吹鼓手作斗争。这时，她心目中的集体主义者无疑就是苏联所谓"同路人作家"群体。不过，即使在这时，她心目中的个人主义者仍然是尼采的叛逆精英，而非诺克斯的社区长老[9]。

兰德没有发现两种个人主义的重大差异（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在第一份自治宪章中就已经再三强调了），原因可能在于犹太式书面学习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培育产生的优等生本能地认为，书本知识高于其他一切知识，任何疑难的最后仲裁不外乎"以书为证"。他们太习惯学校意义上的胜利，因而应对任何困难都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久经考验的成功之路上去。兰德维护美国的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但她的武器始终是读书和写作，争取和攻击的对象始终是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个圈子里，她才能如鱼得水，充分感到自己的强大。

1935年初，好几家出版社对《我们活着的人》表示出兴趣。与此同时，兰德在知识界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盟友。其中包括诗人、记者和版权代理人梅尔维尔·凯恩(Melville Cane),还有凯恩的合伙人平克斯·巴纳(Pincus Berner）夫妇。事实证明，他们四人的友谊禁得住时间的考验。作家埃塞尔·布瓦洛（Ethel Boileau）女士同样以个人主义的使徒自居，写信给兰德说："阻止集体主义，现在是否为时已晚？"兰德回信说："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有赖于人杰和庸众的斗争。"她扮演"资本主义政委"的角色,成就斐然。年轻的剧作家阿尔伯特·曼海默(Albert Mannheimer）曾经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惜中断学业到莫斯科朝圣。兰德跟他打赌，不到一年时间就会让他皈依个人主义。她果然说到做到，两人从此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一起为资本主义辩护。

伍兹直到1935年夏天才筹齐必要的资金，准备上演兰德的剧本。然而，纠纷立刻开始了。伍兹摆出戏剧界老资格的架子,宣称观众优先关注娱乐,哲学成分纯属多余。兰德已经见过世面，不再任人摆布。她之所以创作这部剧本，本来就是为了展现"生命意志"理论。她早已不是短期移民，为了免遭驱逐愿意做任何事情。据说，她在争吵中宣称：只要电梯工人有理有据，她也愿意听；即使

文学天才信口雌黄，她也不会听。撇开《一月十六日夜》的优劣不谈，兰德文学的特点的确是只讲逻辑，不讲经验。她将笛卡尔式推理塞进了所有重要人物的脑海中，因此确有理由把这些作品归入贝克莱对话录[10]一类。

伍兹一不做二不休，绕开不好伺候的兰德，另外雇用了两位作家来修改剧本，用兰德的版税和票房收入支付他们的待遇。兰德通过梅尔维尔·凯恩，得到文森特·阿斯特夫人（Mrs. Vincent Astor）的支持与斡旋，成功地夺回了版税，但无法阻止他修改剧本。伍兹心目中的理想观众只需要情节剧，不能为了迁就有宗旨的作家而违反商业常识。兰德几年后仍然忿忿不平，极力劝说别人不要读这个仅仅在名义上属于她的剧本。她大概不知道：伍兹这时已经破产，亟需《一月十六日夜》的商业成功挽回损失。票房以外的一切都不在他考虑范围中。

在兰德热爱的资本主义文学市场中，尊重作家的宗旨并不是常见的美德。文学经纪人简·维克和伍兹一样，不欣赏她将文学变成观念播种的工具。兰德觉得简·维克的推销工作不大得力，为她写了一份详尽的说明，主要是解释反对集体主义和专制政治的重大意义。她写道："《我们活着的人》不仅是苏俄1925年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关于独裁的故事；无论这种独裁来自苏俄、纳粹德国，

还是社会主义的美国。”（这部小说可能有助于防止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简·维克的反应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纪人的职业习惯。她怀疑读者有没有耐心接受无论哪种倾向的政治哲学教育，建议兰德多加些爱情描写和好莱坞技巧。如果兰德推销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她得到的建议大概也会是这样。这样的场景放到苏联教科书编撰人手中，就会变成万恶资本主义迫害进步思想家的铁证（兰德的门徒依据非常类似的推理方式，把她遭到的冷遇和反对一概归咎于“庸众联盟”对天才的敌视）。理论家往往不乐意实践自己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先知也并不总是赞赏庸俗的商业考量。兰德实在不能接受“智力高深”居然会成为负面因素的前景（这只能解释为优等生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解雇了简·维克，委托安·沃特金斯（Ann Watkins）代她推销小说。沃特金斯成功地说服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在1936年4月出版该书，还预付给作者250美元。兰德兴高采烈，写信告诉古夫尼尔·莫里斯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所有作家的处女作不都是这样吗？）

1935年9月16日，《一月十六日夜》在纽约大使馆剧院首次公演。看来，伍兹自诩的商业经验并非信口雌黄。演出大获成功，纽约名流挤满了剧场。最后，观众陪审

团选出拳击手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为主席。他们判决凯琳无罪。如果剧本仍然保持兰德的原貌，这个结果大概就体现了她喜欢的浪漫主义倾向；但经过伍兹改编后，恐怕只有比邓普西等人敏锐得多的观众才能领会作者的尼采式寓意了。因此，他们的投票可能更多归功于女主角比较有吸引力。《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11]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次演出，称之为机智、有趣的娱乐，大大增加了该剧的票房收入。此后，兰德就要跻身于她曾经仰望的风流名士之列。

注释：

1.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同时，由于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2.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和音乐评论家，是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其小说特点被人们归纳为“用音乐写小说”。

3. 利他主义（Altruism）是伦理学的一种学说，一般泛指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生活态度和行

为的原则。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孔德（Comte）首先把这个概念引进道德理论，并以它作为他的伦理学体系的基础。以后又为英国的斯宾塞（Spencer）等所采用。

4.《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美国作家斯托夫人（Mrs. Stowe）于 1852 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畅销小说，小说中关于非裔美国人与美国奴隶制度的观点曾产生过意义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刺激 19 世纪 50 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

5.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美国第 32 任总统，在 20 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6.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苏联最高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对 20 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实施大规模工业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同时斯大林也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党、政、军领导人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实施大清洗，对少数族裔进行压迫流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和盟军共同击败了轴心国，苏联领土也有了很大的扩张。战后他扶植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执政超过 30 年。

7.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美国著名左翼作家，曾创作超过 90 本著作，获得过普利兹奖的肯定，代表作有《屠场》(*The Jungle*）等。

8. 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即斯托夫人，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

9.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苏格兰新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的领袖。长老会的意义是：由教区信徒选出长老监督会，由长老监督会主持教务。

10. 大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代表之一，其哲学作品通常用两人一问一答的形式阐述观点。

11.《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创办于1889年，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日报，侧重金融、商业领域报导。

第十章

终极问题

普通人缺乏不惜一切代价做正确事情的力量，缺乏与所有人对抗的力量。只有天才能做到这一点。天才为普通人扫清了道路。

——安·兰德日记

（Journals of Ayn Rand），1946

兰德当时还不知道，左右之争已经蔓延到麦克米伦公司内部,直接影响到她的前途。诗人斯坦利·杨（Stanley Young）是公司的编辑,从文学质量角度为《我们活着的人》辩护。批评家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担任公司审稿人，从政治角度反对她。希克斯当时刚刚加入共产党,不愿意看到苏联的负面描写。日后,他也是反对《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最力的人士。所幸他这次没有成功。1936 年 4 月 7 日,《我们活着的人》出版。兰德像所有第一次出书的作者一样得意，将新书分赠芝加哥亲戚、好莱坞朋友。4 月下旬，她接受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 的采访，自豪地宣布：她第一部小说、第一部舞台剧本和第一部电影剧本都找到了买家。《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法眼无差，把这些作品视为“维护个人权利的大声疾呼”。《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2] 赞美她的文笔，拟之于薄伽丘的《十日谈》[3]。不过，这样旗帜鲜明的政治小说不可能没有敌人。粉红色的《纽约时报》责备她宣传压倒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国民》（*Nation*）杂志嘲笑她“用大头棒戳穿气泡”。兰德后来说，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指望过文学界的公平（她写信给古夫尼尔·莫里斯说：纽约满街都是把身体和灵魂出卖给布尔什维克的人）。读者

对她的支持比评论家更多。虽然麦克米伦公司没有为她搞促销活动，小说还是卖掉了2000本。鉴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4]几乎同时发行，这个成绩相当不俗。《飘》的热潮过去以后，《我们活着的人》仍然行销不绝。英国出版商卡斯尔公司（Cassell & Company）准备推出该书的英国版。导演杰罗姆·梅耶（Jerome Mayer）也开始策划将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

《一月十六日夜》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敌人。那时，她每周从中获得200到1200美元的版税（当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1500美元）。到1936年4月4日，该剧的演出权已经出售给伦敦、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华沙、瑞士等地的戏剧经纪人，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剧院也准备上演该剧。沃特金斯甚至说服罗斯福政府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全国各地演出该剧，每场付给作者10美元版税。私人巡回演出公司喜欢该剧布景简易、情节鲜明，直到兰德去世仍然不断上演，给她带来一批散碎收入。兰德觉得，这说明她的剧作家声誉已经确立。她委托沃特金斯联系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希望跟它们签订创作合同。她惊讶地发现，后者居然无动于衷。沃特金斯告诉她，好莱坞不高兴她老是揭苏联的短。于是兰德确信：渗入美国文化界的左派分子已经将她视为眼中钉。照她的个性，

迎头痛击才是最自然的选择。

《我们活着的人》确定了兰德的政治地位，使她有机会四处举办反苏的讲座，继续在美国左派吹起的气泡上戳洞。她在纽约市政厅俱乐部发表《被粉饰的俄罗斯》（Whitewashed Russia）讲座，向听众指出：俄国的新统治者既非选举产生，也不能被选民罢免。他们掌握一切媒体，统一分配所有的食物、住房和工作。他们从不容忍任何批评，不经审判地羁押和屠杀政敌。他们根本否定个人权利的存在，声称一切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兰德质问听众：难道美国人民愿意遵从左派人士的伟大蓝图，接受"200万纯洁无瑕的天使"统治吗？她多次接受报纸和电台的采访，揭发苏联当局对国民的苛政。她表示，只要苏联开放边境，移民的洪流就会席卷而来。这似乎是柏林墙倒塌[5]的最佳预言。据说（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兰德自己放出去的），她离开苏联前，一位亲戚在告别派对上恳求她向世界揭露真相。"俄罗斯是一座坟场，我们正在死去。"现在，她履行了诺言。

兰德这些活动虽然出了一口恶气，却没有顾及她留在苏联的家人。苏联当局惯于以人质战术要挟西方，他们的情报机构不可能不知道兰德的真实身分和积极活动。她结婚后就开始要求美国国务院为父母和妹妹办理移民，

当时的问题是赡养能力不足。现在她的经济实力已经不成问题，苏联的阻碍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兰德的芝加哥亲戚暗示：如果她没有刻意把自己塑造成焦点人物，事情本来不至于毫无希望。他们的经济实力足以帮助苏联亲戚，都怪兰德没有把事情讲清楚。无论原因是什么，父亲吉诺菲和母亲安娜于1937年5月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无法获得许可。"不久，美国政府提出警告：他们无论以何种方式跟苏联的熟人联系，都会危及这些人的生命。大清洗正在接近高潮，苏联不久就切断了海外通讯的渠道。

兰德一旦实现经济自由，就搬进更大的公寓，全心创作她构想已久的思想小说。这部书应该解决她冥思苦想的终极问题：道德的个人如何在不道德的社会中生存。当然，她所说的道德就是个人权利和意志至高无上的原则。一如既往，这种理想要体现在尼采式主人公霍华德·洛克的身上。洛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建筑师，他设计的摩天大厦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因循守旧的庸人和心怀恶意的敌人想要毁掉洛克，就像纽约和好莱坞的生意人和赤色分子对待兰德一样；但"最高贵的灵魂"无视威逼利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小说的结尾，洛克豪情万丈地登上他设计的大厦。托马斯·马因·里德[6]的西部小说经常出现英雄骑士眺望夕阳，扬鞭远飏的结局，

最后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滥熟套路。兰德在好莱坞时肯定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更早，因为里德小说在俄国非常受欢迎。此书当时命名为《二手生活》，就是后来的《源泉》。

《源泉》界定了兰德终生的大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照兰德的解释，集体主义就是个人（唯一真实的存在）企图在自我之外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些庸人离不开全知全能的神、利他主义的事业或目标确定的独裁者。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思想而生活，摒弃这些二手货。她断定：赤化分子、东正教徒和普通美国人都不具备真正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大可借用托克维尔的语言说：兰德的“个人主义者”和列宁的“新人”都是政治哲学的抽象创造物，在这两位思想家诞生前的地球上并不存在。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为他们的新人建立乌托邦，兰德也会为她的个人主义者建立乌托邦。她明显不觉得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利奥在《我们活着的人》当中失败，霍华德却在《源泉》当中成功。她自己为什么有必要费尽心血，从苏联移民美国。她的个人主义属于无神论者尼采的系谱，而非新教徒爱德华兹[7]的传统，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政治上依赖后者的保护。她的集体主义囊括了美国的社区主义（美国保守主义的根基）[8]、美国的国家主义[9]（美国自

由主义的实质[10]）和苏联的集体主义，这也没有妨碍她塑造“美国价值观代言人”的公众形象。

霍华德·洛克一开始在小说中露面时，年仅19岁。他不肯遵守斯坦顿学院的课程表，因而遭到开除。洛克对学校的规章制度嗤之以鼻，全心全意地设计双门风格小教堂和文艺复兴风格别墅。他有不可一世的自信心，认为自己画出的图纸前无古人。这个英俊的大男孩接到开除通知书，放声大笑，跳进湖里游泳。他轻蔑的笑声在岩壁之间回荡：“岩壁为我而生，等待钻孔机、黄色炸药和我的声音，等待粉身碎骨，重获新生，等待我的双手把形象赋予他们。”院长警告他，如果拿不到毕业证，谁也不会让他设计建筑。洛克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谁能阻止我？”他毅然抛弃乡气的斯坦顿，闯荡纽约大码头。不出院长所料，纽约人给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不过，洛克像查拉图斯特拉[11]一样，欢迎一切困难，因为考验就是一条渡船，载着他从庸人贫乏的此岸驶向天才创造的彼岸。即使他需要踩着尸体才能踏上成功之路，他也不会有丝毫犹豫。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不在乎成败利钝。

洛克是一个被凡夫俗子包围的天才，拥有他们永远不会具备的完整个性和独立性。兰德必定是对着镜子描绘主人公肖像的，因为她的自我形象就是这样。她之所

以这样看待自己，恐怕还是因为她自幼习惯的家庭生态。在这个小社会当中，她的家人从不忘记提醒她：她是天生的优等生，不能跟别人比。她刚到美国，通信尚未中断那几年内，安娜仍然用优等生理论鼓励她蔑视眼前的困难，妹妹仍然深信她天生就是做名士的料。兰德自己从登上驶离列宁格勒的列车那一刻开始，就怀有名扬四海的自信。这种骄傲帮助她战胜了无数的困难，也使她跟美国保守主义的基础隔离。后者对海外的看法往往是误会的产物，对身边的宗教和社区价值却是毫不含糊的。

洛克来到纽约，身无分文。他确信，只有建筑界的天才和奇人卡梅伦（Cameron）才有资格做他的老师。卡梅伦设计了纽约最早的几座摩天大楼，后来却因为性格乖僻，酗酒骂人而门可罗雀。这时，洛克的同学彼得·基廷（Peter Keating）也来到纽约。此人在各方面都是洛克的对立面，体现了庸人对天才的嫉妒和迫害。基廷自知洛克才高过己，依靠洛克的帮助才完成了学校的设计任务。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因此妒恨洛克。他在学院里循规蹈矩，拿第一名毕业；向群众夸夸其谈，却没有真正的自信心，一味迎合眼球。无疑，许多历史人物都有这样的性格，克伦斯基和拿破仑三世[12]都是这种人。他们即使在掌权以后，仍然无法改变煽动家的习惯。他们为了博取群众

反复无常的欢呼，不惜采取后患无穷的政策，最终因此自取灭亡，反而遭到群众的鄙视。兰德青少年时代就非常熟悉这种人。基廷在纽约投靠财大气粗的弗兰肯 - 海尔公司，依靠圆滑和欺骗青云直上。与此同时，卡梅伦和洛克却在曼哈顿地下室里艰苦奋斗。

基廷是“一个永远成不了英雄而且不知英雄为何物”的庸人。他面临真正的创造性工作，就只能回头求助于“超人先生”洛克。如果洛克愿意替他设计曼哈顿的摩天大厦，他就有望成为公司合伙人。洛克替他做到了。基廷在相机和欢呼声中享受成功，穷困潦倒的洛克却不得不去采石场打工。在采石场，洛克结识了弗兰肯 - 海尔公司老板的女儿多米尼克。两人发展出一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多米尼克（Dominique）和《纽约旗帜报》建筑评论家埃尔斯沃斯·图黑（Ellsworth Toohey，酷似英国社会主义者拉斯基[13]）联合起来诋毁洛克。前者出于变态的爱情和嫉妒，不愿意粗俗的群众分享她的英雄；后者出于集体主义的恶意。他是“一个永远成不了英雄却知道什么是英雄”的庸人，代表庸人向英雄复仇。洛克只在乎创造，不在乎成功。他不仅愿意无偿地帮助自己瞧不起的同学基廷，甚至愿意免费为政府设计经济适用房，只要能不受干扰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理念就行。官僚丝毫不能理解

高贵的追求，恣意修改洛克的设计。洛克做出了萨文科夫曾经在俄罗斯做过的事情，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炸成了碎片。在法庭上，他向陪审团痛陈个人创造的伟大价值。整部小说都像是这份哲学宣言的准备。洛克胜利了，多米尼克和全世界都在他的脚下。摩天大楼突然刺破了地球的“泥土、钢铁和花岗岩”，将地球之火带向地面，“向自由射去”。多米尼克登上升降机，与楼顶的新丈夫会合。

注释：

1.《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份纽约出版的报纸，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1851 年 9 月 18 日创刊。

2.《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1877 年创刊，是美国华盛顿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1970 年代初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尼克松总统退职，《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国际威望。

3.《十日谈》(*The Decameron*)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诗人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所著的一部故事集，是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写于 1384 年，成书于 1353 年。小说文笔精炼，语言生动，在形式上大有创新，对后来欧洲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4. 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 1900—1949），美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创作了一部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史诗性爱情小说

《飘》（*Gone with the Wind*），风靡全球。

5. 柏林墙（Berlin Wall）是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1961 年在己方领土上建立的围墙，目的是隔离东德（含东德的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从而阻隔东西柏林之间市民的往来。柏林墙的建立，是二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 年拆除，两德重归统一。

6. 托马斯·马因·里德（Thomas Mayne Reid, 1818—1883），美国西部小说家，著有小说《无头骑士》（*The Headless Horseman*），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中国上映过。他的作品在革命前的俄国非常流行，从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就可以看出。

7.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是北美殖民地的加尔文派神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第 3 任校长，他的理论对美国宪法的制定颇有影响。

8. 社区主义指社区自行处理地方事务，以新英格兰的新教社区为典型。托克维尔将其视为美国政体的根基。

9. 这里的国家主义指强大国家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任务。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国家主义有非常不同的涵义：前者出自天主教和绝对君主制的传统，代表保守；后者出自新政和左派福利社会的传统，代表激进。

10. 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原始意义在于尽可能降低政府的干预，但 1930 以后的美国自由主义实际上支持扩大干预的温和左派，为了吸引支持者袭用了自由主义的名义。

11. 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是传说的贤哲，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借他的名义阐述

自己的反传统观念。

12.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1808—1873），受洗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是拿破仑一世之侄。

13.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政治学家，费边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第十一章

蛮族名将为罗马而战

我不承认任何人对我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钟拥有权利，不承认任何人对我的任何成就拥有权利，无论提出这种权利要求的是谁，无论他们有多少人，无论他们是多么需要。除了一点，我不承认我对人们负有义务，而这一点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

——《源泉》，1943

《源泉》直到1942年才完稿。在此期间，兰德周围的环境已经剧变。兰德的成功改变了家庭政治的权力平衡。弗兰克·奥康纳完全靠边站了，他甚至开玩笑地自称“安·兰德先生”。他的外甥女咪咪·萨顿后来说，如果这种情况晚发生几十年，或者不至于那么有损自尊。他们两人一度相互争吵。但奥康纳个性温顺，没有独当一面的魄力。他很快就默认了新形势，满足于长期料理家政，偶尔打打零工。兰德不愿意在家庭琐事方面多费时间，她高度敏感的头脑已经转向更紧要的问题。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竞选中还坚持财政保守主义和宪法捍卫者的宗旨，上台后却迅速向左转，推行大政府实验。他巧妙地说服人民，那些自私的批评者不过是华尔街富翁的说客而已。兰德厌恶的左派分子纷纷向他发出欢呼，同时自称自由主义者（Liberals）。从此以后，美国自由主义就代表了相当于欧洲国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派系[1]。19世纪通称的自由主义宗旨反而属于保守主义。兰德感到，她负有力挽狂澜的义务。

1937年7月，兰德为了构思《源泉》而焦躁不安。她说，为了在故事高潮中理顺人物关系，“我快要疯了”。她想给自己调剂一下，就另外写了一部日记体小说《颂歌》（*Anthem*，中译本《一个人》）。在这个乌托邦中，“我”已

经从语言中消失了。“我们自己”（非常像列宁的“一代新人”）不断像唱诗班一样吟诵各种模仿的口号，自我催眠。（这些政治口号很可能是兰德厌恶宗教的原因，这类国家的移民往往如此。）例如，“我们什么都不是，全人类什么都是”（大概是孔德[2]文章的拙劣改编）；“国治，国有，国享”（显然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讲》[3]的翻版）。“平等 7-2521”爱上“自由 5-3000”，就像《1984》当中温斯顿爱上朱丽叶。他的好奇心由此发作，开始秘密探索“万恶的旧社会”，其中包括“我”这个词的涵义。这个神圣的词语在小说中的地位犹如《圣经》中的“要有光”。一旦有了光，“平等 7-2521”和“自由 5-3000”就决心逃之夭夭。两人改名为“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盗火者）和“盖亚”（Gaea，大地之母），日记在尼采最欣赏的狄俄索尼斯狂欢[4]中结束。这篇小说的结构和风格酷似叶甫根尼·扎米亚金的反乌托邦经典《我们》（*We*）。后者的主人公名叫 D-503，同样在日记中抒发对“我们”新社会的忠诚。1920 年代，《我们》的地下手抄本在列宁格勒大学生当中流传甚广。兰德几乎肯定读过这部小说，但《颂歌》当中古典多神教的奔放气氛就不能归功于扎米亚金了。书中的措辞明显模仿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诗句。兰德写这部小说只用了三个星期，打算把它卖给《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然而，该报拒绝了。她的代理人沃特金斯试图向麦克米伦出版社和另外两家出版社推销此书，同样惨遭失败。8 年后,《源泉》大获成功。她的政治盟友才借势发行该书。

1938 年，奥康纳和兰德搬到曼哈顿上东城，这意味着她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改善。雷华电公司付 10000 美元购买《一月十六日夜》的电影拍摄权。同年 6 月 27 日，兰德和阿尔弗雷德·诺夫公司（Alfred Knopf, Inc.）签订了《源泉》的出版合同。她当时承诺在一年时间内完成该书，结果却等了四年。这时，她志同道合的笔友布瓦洛女士访问美国，推销她的新小说《G 小调叙事曲》，发表右派的政治演说，跟罗斯福夫妇会晤，参观联邦调查局。在兰德看来，她把战争的焦虑带给了刚刚走出萧条的美国。集体主义和可憎的群众领袖正在席卷欧洲。最糟糕的是：罗斯福政府和苏联结盟，左翼媒体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热爱民主的友邦。大敌当前，攻击苏联几乎成了不忠的表现，甚至流亡纽约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都表示支持斯大林，兰德因此永远不能原谅他。

战争初期，兰德在反对集体主义的斗争中感到非常孤立，一再跟原先的朋友反目。她越来越觉得《源泉》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而是一场斗争的一部分。在这场斗争当中，她自己珍爱的一切都面临丧失的危险。她塑造霍华

德·洛克的同时，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武器。洛克是个双面人。一方面，他有美国新教徒自古以来崇尚的美德：独立、奋斗、勤劳；另一方面，他又是兰德本人灵魂的投影，具有新教徒最憎恶的特征：蔑视宗教信仰、憎恶社区责任、强烈的表演欲望、异教世界的纵欲糜烂。他像希腊英雄和尼采超人一样，不能容忍可鄙的小人继承世界；却不能像罗马没落时的基督徒一样，在逆境中保存文明的火种，保持等待洪水之后的信心。他爱个人的胜利，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团体；如果不能胜利，就会追求十二月党人式的壮丽毁灭。

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之一是禁止私人拥有黄金，这唤醒了兰德少年时代的记忆。她当然清楚：苏联的经济管制和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从同样的措施开始的。纳粹目前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为战争做准备。甚至罗斯福支援英国也不能让她回心转意，因为她宁愿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毁灭。1940 年，罗斯福破坏了一百多年的宪法习惯，第三次竞选总统。兰德和许多右派人士都担心，这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选举。罗斯福左手拿着经济管制的武器，右手拿着战争动员的武器；再通过“炉边谈话”[5]之类民粹手段，越过民意代表机构直接煽动群众。这难道不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条从民心独裁者到凯撒主义[6]的现成道路

吗？差不多与此同时，以赛亚·柏林[7]也在伦敦说：罗斯福有成为独裁者的一切性格、手段、能力。幸好他在我们一边，否则大事就不妙了。兰德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她觉得新政已经是大事不妙了。

这时，欧洲人民大多数已经拥抱了某种温和的社会主义。罗斯福明显打算在美国造成同样的局面。共和党人在他们的乡村俱乐部传播恶毒的流言：埃莉诺·罗斯福[8]从黑人那里染上梅毒，传染给总统。兰德毅然投笔从政，为温德尔·威尔基[9]的竞选团队奔走，试图阻止“那个怪物”重新当选。这是她第一次从政，但不是最后一次。缺乏社区基础是兰德的致命弱点，她一开始筹款就失望而归。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地方性政治，共和党尤其是社区价值的化身。在那些虔信宗教的农场主和小业主眼中，兰德只能是一个格格不入“外国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仅仅因为理论的美妙（如果他们能听懂的话）而捐款支持从来没有做过社区服务的人。兰德发表演讲时，有个听众向她喊道：“你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谈美国？”她用刺耳的俄国口音回敬道：“我是自己选择做美国人，你不过碰巧生在美国！”如果这是大学辩论会，她就赢定了，但选举就是另一回事了。知识分子众多的民主党倒是很有可能重用高明的理论家，但兰德的理论又跟他们背道

而驰。其实，兰德在美国的发展路径早已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里根或施瓦辛格式的人物[10]。

兰德如果认真挑剔威尔基的纲领，就会发现这位候选人并不符合她的英雄标准。罗斯福自信地宣称，信赖个人自由已经过时。威尔基只是犹豫不决地要求寻找个人权利和社会需要的平衡点。不过，当时她没有更好的选择。威尔基一旦失败，她就肆无忌惮地发泄忿怒。她说："威尔基祸害美国，罪孽最为深重。相形之下，罗斯福不过受到时代的影响而已。"她和"坚定右派"组成了"前威尔基工作人员反威尔基协会"。他们给报刊写信，嘲笑原先的领袖，责备他帮了共产党的忙。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政治斗争习惯：宁愿要公开的敌人，不愿要暧昧的盟友。兰德本来打算建立一个更加彻底的右派团体，完成威尔基的未竟之业，但她停工搞政治的后果已经表现出来。1940 年底，她只剩下不到 900 美元。她的筹款能力一如既往的糟糕。有趣的是：她坚持自己从政没有任何奉献的意思，纯粹是自私的产物，因为维护思想表达自由跟她利害攸关。显然，她更在意维护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取得现实的胜利。这种人非常适合做知识分子，非常不适合从政。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就相当地"非美"[1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败选给她带来了一批右派

朋友。钱宁·波洛克（Channing Pollock）是剧作家和评论家。伊莎贝尔·帕特森（Isabel Paterson）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评论家，对兰德有提携之功。萨姆·威尔斯（Sam Welles）是《时代》(*Time*)杂志的作家。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是《财富》(*Fortune*）杂志的作家。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是门肯的朋友，他的精英主义理论对兰德颇有启发。弗兰克·乔多罗夫（Frank Chodorov）是一位编辑，极力主张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是俄国移民的后代，舆论界的知名人士。约翰·高尔（John Gall）是全美制造商协会首席律师，后来为大钢铁公司服务。露丝·亚历山大（Ruth Alexander）是经济学家，称兰德为"美国的圣女贞德"。

在这些新朋友的影响下，兰德才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当时的流行读物《资本主义创造者：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12]（碰巧也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是她的启蒙书。作者卡尔·斯奈德（Carl Snyder）本人是自学成才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把大萧条归咎于联邦政府未能稳定货币和物价。这是技术专家的经验性认知，而不是自由市场的正宗理论，但兰德在经济学的学力还不足以厘清系谱。60年代以后，经济学日益依赖抽象数学模型，她就更没有可

能理解了。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她以前接受的欧洲式教育不包括近代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她虽然号称资本主义辩护士，但她的著作总是仅限于哲学和政治哲学。通过二三手材料了解兰德的读者错误地赞扬她维护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但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几近于零。许多企业家喜欢她的政治哲学，或是从她的意志论获得鼓舞；但没有人能从她这里收获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知识，因为她自己既不懂经济学理论，也没有商业经验。她的小说涉及经济学的时候，主要依靠帕特森的专栏科普文章。

帕特森是兰德友人中第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这意味着基督教保守派和无神论个人主义势必经历一番较量。兰德早已不相信苦难的救赎价值，帕特森极力反对。她们通过《塞缪尔·约翰逊传》的难题[13]界定了双方的立场。帕特森问：如果你困在城堡高塔上，抱着一个婴儿，两人中只有一个能逃生，你会怎么办？兰德断然回答说："当然救自己啦，"她愉快地补充说，"如果这就是邪恶，那自己确实是邪恶的。"这场争论始终没有结果。帕特森一再试图说服兰德，都没有成功。1945 年，兰德写信给她说：基督教"最有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幼儿园"。1948 年，兰德用雨果抵制拿破仑三世的语气说[14]：即使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了基督徒、社会主义者或任何其他类型的集体主义"利他

主义者”，她这个形单影只的理性主义者也要坚持维护人的伟大。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坚持己见，她们的友谊却没有受到影响。兰德说，帕特森特别擅长从抽象联系中察觉哲学意义。帕特森则说，兰德是个天才。帕特森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穆利尔·威尔斯·霍尔（Muriel Welles Hall）说，她绝少用这个词形容任何人。兰德自从跟奥尔加·纳博科夫分手以后，还从来没有交过这么贴心的朋友。

兰德虽然搞不成现实政治，仍然无意放弃文学政治。1941年初，她给所有无所作为的右派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体天真的第五纵队》（To All Innocent Fifth Columnists）。她在信中说：如果不奋起阻止节节进逼的极权主义浪潮，“你们的国家就会落入希特勒和斯大林手中”。罗斯福宣传社会主义，扩张行政权力。威尔基首鼠两端，坐观成败。如果他们学威尔基的坏榜样，就理应跟他一起承担误国之罪。同年4月，她模仿《共产党宣言》，起草了《个人主义者宣言》（*Individualist Manifesto*）。《宣言》前半部分重申了洛克（John Locke）[15]的政府论，后半部分强调自私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全文共33页，充满了酣畅淋漓的解放感；但作为哲学研究就跟别的宣言一样不合格。有哲学素养的读者恐怕早已注意到，兰德的思想实验有赖于一个默示的前提：个人的理性预期能力没有边界。在真实世界

中，这个前提连近似的满足都做不到。

以兰德和帕特森的辩论为例，塔中人实际上不可能知道获救是否完全绝望。朴茨茅斯清教徒社区多次面临类似的绝境，蛮荒时代的人类不断陷入类似的绝境。在清教徒社区和无神论理性主义者社区的竞争中，只要苦难救赎，奇迹永在，灵魂不灭，最后审判的观念能使前者在绝境中比后者多坚持万分之一的时间，细微优势就会在重复博弈中放大为压倒优势，足以使朴茨茅斯社区吞噬兰德社区。在大多数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竞争和商业竞争中，成败之别通常取决于能否多坚持五分钟；而结果通常是赢家通吃，51% 优势跟 100% 没有区别。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苦难淘汰对人类存续的影响远远大于繁荣奖赏。这就可以解释美国个人主义为什么是新教的个人主义，而非无神论的个人主义。

兰德投身政治，拖延交稿，使她失去了原来的出版商。在威尔基时乖命舛的竞选期间，沃特金斯忙于为《源泉》寻找下家。她把小说前几章拿给八大出版公司，包括西蒙–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多德（Dodd）、米德（Mead）和双日公司（Doubleday），结果一再碰壁。兰德非常失望，沃特金斯则越来越不耐烦。她像以前的简·维克一样，不能理解兰德为什么不能对读

者多照顾一点。她如果多加些故事，少加些观念，难道不是对大家都好吗？比如说，霍华德·洛克就不能多一点人情味吗？她不明白，兰德的初衷就是要人物充当观念的载体，而不是以塑造丰满的人物为目的；这样的角色当然只能是福斯特所谓的“平面型人物”[16]。在兰德看来，感情波动是思维缺陷的产物。理性主人公洛克就是超人价值观的化身，应该保持逻辑上的一贯性。好的资本主义者应该尊重读者，超过尊重自己；好的哲学家应该尊重观念的内在逻辑，无视普通读者的感受。不幸，兰德同时是这两类人。因此，她的著作就成了昆德拉最憎恶的奥威尔式图解小说。兰德拒绝接受沃特金斯的修改建议，甚至怀疑她想把自己办事不力的责任推卸到作者身上。最后，她们决裂了。更重要的是：摆脱沃特金斯以后，《源泉》仍然卖不出去。

《个人主义者宣言》的命运更坏。兰德发现，她的右派朋友对此并不欢迎。她运用逆向激进主义的修辞术，将“集体主义”定义为“个人对团体的屈服”。这样一来，她就把美国佬巴比特、坎特伯雷大主教[17]、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全都划到自己的对立面了。从理论上讲，截断众流的创举无疑令人愉快；从现实政治上讲，自我孤立的策略不会受人欢迎。兰德觉得，思想糊涂的右派人士需要她的启蒙。这种想法本身就说明了她在政治上的幼稚，幸而她很快就

厌倦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回到更加得心应手的文学领域中。

根据穆里尔·霍尔（Muriel Hall）的说法，是帕特森为《源泉》打开了出路。1941 年初，鲍勃斯 – 梅利尔公司（Bobbs-Merrill Company）出版了《红色十年：斯大林主义渗透美国》（*Red Decade*：*The Stalinist Penetration of America*）。左翼知识圈怒不可遏，给兰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特森在鲍勃斯 – 梅利尔公司有熟人，说服他们派总编阿奇博尔德·奥格登（Archibald Ogden）跟兰德接洽。兰德自己则说，是她主动接触奥格登的。无论最初由谁主动，奥格登一读到《源泉》，就大为震动。他在电话中告诉兰德，此书无疑会跻身于“真正伟大的文学传统”。他列举了自己最欣赏的地方：恢弘的主题、经典的人物、英雄的气概和炽烈的心灵。兰德第一次有知己之感，毕生都没有忘记这些赞美。鲍勃斯 – 梅利尔公司董事长钱伯斯（D. L. Chambers）最初无意出版《源泉》，奥格登扬言不出版就辞职。钱伯斯为他的热忱所动，撤销了原意。1941 年 12 月 10 日，他们签订了出版合同。鲍勃斯 – 梅利尔公司预付了 1000 美元，兰德再次承诺在 1943 年 1 月 1 日以前截稿。兰德后来说，虽然战争爆发了，当时仍然是她毕生最快乐的时光。这一次，她决心如期交稿，不给出版商撕毁合同

的理由。她“像写作机器一样”工作，有时一连在打字机前度过 30 多个小时，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中断。她终于如愿以偿。

一开始,文学评论界对《源泉》并不友好。《纽约时报》的文学批评家奥威尔·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指责小说充满兽性、淫欲和变态的阴谋，很适合萨德侯爵[18]和希特勒。《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没有看出兰德的寓意,只把《源泉》当作又一部建筑题材小说。阿尔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后来的斯坦福大学教授）不喜欢主人公洛克的尼采气息。在战争时期，尼采主义尤其容易引起不祥的联想。《国民》的评论家狄安娜·崔林(Diana Trilling)大肆谴责小说的多神教献祭精神。不过，知音早晚会出现。1943 年 5 月 16 日，史密斯学院的前任教授洛林·普鲁厄特（Lorine Pruette）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她写道:“兰德已经采取了反对集体主义、‘二道贩子的统治和古老的怪兽’的立场，写出了一曲赞美个人的颂歌。”她引用洛克在法庭上的演讲，把个人主义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兰德后来说，普鲁厄特的评论真是及时雨，她一直期待有人拈出个人主义的关键词。只有这样，作者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读者。她觉得，小说的政治寓意已经再明白不

过了。评论家之所以视而不见，完全是为了顾及美苏两国的战时盟友关系。拥护罗斯福总统的媒体锣鼓齐鸣，极力把苏联塑造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兰德在这时提倡个人主义，不识时务、孤军奋战的勇气简直可歌可泣。她暗示：多亏了她和帕特森的努力，自由世界才得以幸存。她后来解释说，小说首先从情感上打动人，然后从思想上打动人，因此具备最强大的宣传功能。她亲眼目睹19世纪小说改造俄国，促成革命方面的巨大力量。她相信，美国的赤色分子也明白这一点。在兰德的词汇表里，“宣传家”是个褒义词。

注释：

1.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派系是由第二国际开创的温和社会主义派系，主要包括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主张在尊重宪法秩序和民主选举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公正和福利国家。

2.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3.《葛底斯堡演讲》（Gettysburg Address）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最著名的演说，也是美国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政治性演说。1863年11月19日，林肯葛底斯堡国家公墓（Gettysburg National Cemetery）揭幕式上发表演讲，哀悼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演讲修辞细腻周密，后成为美

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4. 狄俄索尼斯（Dionysus），古希腊的酒神，人们在酒神祭活动中狂欢作乐。

5. “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创的广播发言形式。罗斯福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会利用新闻媒介的政治家之一，他不想把讲话搞得太严肃，希望亲切一些，于是“炉边谈话”就成为他发表广播演说的正式名称。进行初次炉边谈话正值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利用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用“谈话”而非“讲话”的形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带进千家万户，拉近总统与民众的感情。炉边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广播史上的一个传奇。此后罗斯福将这种形式延续下来，一直到他去世。

6.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将凯撒主义定义为：深得民心的群众煽动家实施独裁统治。

7.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哲学家及观念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对以后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8.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 1884—1962），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二战后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9.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 1892—1944），美国政治人物、律师、共和党人。曾代表共和党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与民主党的罗斯福竞争美国总统，最后失败。

10.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美国右翼政

治家，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第40任美国总统。踏入政坛前，他曾担任过运动广播员、救生员、报社专栏作家、电影演员和励志讲师，其演说风格高明而极具说服力，被媒体誉为“伟大的沟通者”。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 1947—），生于奥地利的美国健身运动员、演员、政治家，是一位天主教徒，2003年11月至2011年1月任美国加州州长。

11. “知识分子”意味着某些具有特殊道德勇气的人批评社会和政治，有浓厚的精英气息。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这种特殊人物是不大需要的。韦伯指出，美国社会对学术人缺乏尊重；只有在欧洲，教授才像重要人物。

12.《资本主义创造者：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原书名为 *Capitalism the Creator: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13. 苏格兰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在《塞缪尔·约翰逊传》（*Life of Samuel Johnson*）里说，约翰逊博士反驳主观唯心论的方法是：用脚踢石头，证明它确实存在。此后“约翰逊式难题”就指土包子式思想实验。

14.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在流亡中作诗明志：即使所有人都归顺拿破仑三世，他也要坚持到最后一人。

15.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认识论上，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Empiricism）代表人物之一，并对社会契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他发展出了一套与霍布斯（Hobbes）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公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

当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视为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也大大影响了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

16. 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在1927年出版的演讲集《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中将文学人物分为“平面型”（Flat）和“圆型”（Round）两类。

17. 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又称为坎特伯里圣座（the holy See of Canterbury），继承了圣奥古斯丁的使徒统系，为全英格兰主教长（The Primate of All England）。他是英格兰圣公会的领袖，坎特伯里教省的都主教，也是坎特伯里教区的教区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and Canterbury Diocese），普世圣公宗中的精神领袖（Spiritual leader of the worldwide Anglican Communion）。他主持自1867年起的每10年一次的普世圣公宗主教会议，虽然在会中没有绝对的决定权，但作为普世圣公宗中的首领，负责协调普世圣公宗的所有成员教会，并对涉及整个普世圣公宗或同时涉及多个成员教会的事务具有最终裁定权。

18. 萨德侯爵，全名为唐纳蒂安·阿尔丰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Sade,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是一位法国贵族和一系列色情与哲学书籍的作者，他尤以描写色情幻想及其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以他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是性虐待的另一个称呼。

第十二章

重返加利福尼亚

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固有的才能，而其余的人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的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源泉》25周年纪念版序言，1963

1943年秋天,《源泉》的销路直线上升。鲍勃斯－梅利尔公司不失时机，连续重版了两次，总销量达到1.8万册。在纸张配给的战时，这个纪录相当不俗。兰德并不知足，她的预期是10万册。这样的奢望连伊莎贝尔·帕特森都不敢置信，但她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吝啬的钱伯斯愿意发动一场广告战。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s）出价2万美元购买拍摄权,但兰德拒绝了。她坚信《源泉》的行情还会越来越好。十天后，华纳公司接受了兰德的5万美元要价。他们还愿意替奥康纳夫妇出旅费，聘用兰德改编剧本。如果改编时间超过一个月，公司每周额外支付500美元。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只有兰德自己例外。她用拜伦的语气说[1]：我在一夜中变成了资本家。

1943年10月，奥康纳夫妇重返好莱坞。华纳兄弟公司为他们提供了VIP待遇：在纽约乘坐豪华的20世纪有限公司列车出发,在芝加哥换乘同样著名的“圣菲大酋长”客车。兰德在伯班克摄影城享有一间办公室和两位秘书，外面的电话都要经过筛选才能打进来。她喜欢胜利的感觉，但并不在意享受，一直深居简出，埋头创作。访客通常会遇见挡驾的秘书，没有多少机会跟作者见面。次年4月，剧本完成了。她有意返回纽约，但《源泉》的制片人亨利·布兰克（Henry Blanke）劝她留下来。兰德

提出：如果公司允许她半年工作，半年停薪留职写作，她就留下来。华纳公司不肯同意。获奖制片人哈尔·沃利斯（Hal Wallis）刚刚跟杰克·华纳（Jack Warner）闹翻了，决定另立门户。他愿意接受兰德的条件，聘请她做新公司的第一位职员。第二位职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莉莲·赫尔曼——《守卫莱茵河》的作者、兰德口诛笔伐的赤色分子[2]。赫尔曼对兰德也毫不留情。兰德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周薪750美元，随后增加到1500美元。

兰德亟欲创作下一部小说，就是后来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好莱坞的职位可以为她提供安全保证和声望，伊莎贝尔·帕特森为她提供了灵感。两人在电话中争论。帕特森表示，兰德有责任启蒙读者。兰德宣称她没有，而且全世界有头脑的人都可能罢工的。这个念头一下子抓住了她，新书的题材应该是“脑力劳动者的罢工”。她快乐地设想：如果所有的艺术家、发明家、商人都拒绝发挥聪明才智，愚蠢的世界会落到什么下场。跟《个人主义者宣言》一样，这部新书也是针对集体主义的精神胜利。

奥康纳夫妇现在是有钱人了，在费尔南多谷地查茨沃斯镇买下了一座农场。弗兰克·奥康纳说，通货膨胀会蚀尽他们的存款，只有房地产才能保值。他还预见到，

战争结束后，汽油配给制就会结束。人们驾车出游的距离一增加，山谷的土地就会升值。事实证明，他的投资策略完全正确。他们的新居是维也纳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3]的杰作，有花园、书房、屋顶游泳池和环绕宅邸的护城河，价值2.4万美元。诺伊特拉是弗兰克·劳埃德·莱特[4]的弟子。弗兰克·奥康纳的哥哥尼克把他们留在纽约的家具托运到加州。弗兰克照料农场，饲养家禽、兔子、孔雀，实验种植剑兰和苜蓿。户外生活对他很有好处，他比纽约时期快乐多了。兰德也感到欣慰，但她仍然怀念纽约文人圈的思想交锋。她从小就是书虫，不爱运动。

《源泉》的销路扶摇直上。读者从四面八方发来热情洋溢的信件。许多人分不清她的性别，她觉得有趣。大多数人仍然分不清故事和观念，她感到遗憾。毕竟，她为了确保小说的“观念播种”性质，作了许多努力。虽然华纳兄弟公司决定推迟改编影片的拍摄，演员们仍然为争取洛克和多米尼克的角色而竞争。“本色演员”琼·克劳福德（Joan Crawford）为兰德举行晚宴，打扮成多米尼克的样子。维罗妮卡·雷克（Veronica Lake）四处宣扬，她的头发跟多米尼克颜色一样，这个角色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布兰克通过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游说兰德，希望饰演洛克。斯坦威克曾经说

服华纳公司购买《源泉》，为兰德出力不少。兰德自己眼睛向上，希望葛丽泰·嘉宝演多米尼克、加里·古柏[5]演洛克。她从报上看到，米高梅公司（MGM）出价42.5万美元,试图向华纳公司购买《源泉》的改编权。塞西尔·德米尔劝她离开哈尔·沃利斯，重回他手下。当然，他没有成功。甚至隐居圣莫尼卡的著名建筑师莱特也邀请她共进晚餐。这就是好莱坞的规律：赢家通吃，成功属于已经成功的人。莱特收到兰德的赠书，回信说："你有真正伟大的主题，个人是一切社会价值的真正源泉。"兰德和亨利·布兰克都希望莱特出山，为电影设计布景。然而，莱特要求的薪水达到了影片预算的10%。他还要求事先核准服装、背景和脚本，因此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在此期间，兰德为哈尔·沃利斯写了三部通俗情节剧一类的电影剧本。沃利斯似乎采取了"以通俗剧本养活严肃剧本"的策略，正如兰德采取了"以通俗作品养活思想性作品"的策略。他们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经常打情骂俏。1945年6月，兰德开始为鲍勃斯－梅里尔公司撰写《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Moral Basis of Individualism*）（她签订的合同规定：上半年为沃利斯工作，下半年自由写作）。兰德如果算得上哲学家，主要就是因为本书。她在创造霍华德·洛克的过程中，就开始整理

思路。本书堪称理性主义[6]公设的逻辑总结。她遵循笛卡尔的推理传统，首先寻找初始逻辑基点。这个原点就是不证自明的生命权。兰德写道："理性自觉"的能力是人理解和支配周围"真实世界"的唯一方法。伦理学是认识论的产物。理性的道德观不是划分善恶，而是划分积极与消极。前者是创造者、生产者、个人主义者，后者是寄生者、模仿者、集体主义者。

传统哲学可以用三种方式回应兰德主义。经验主义者[7]会指出：否定笛卡尔式纯粹演绎的论证全都适用于兰德的逻辑，他们的理性都是无界的绝对理性；兰德的认识论禁不起休谟（Hume）的破坏性分析[8]，道德哲学失去认识论的支持就无法立足。康德主义者[9]会指出：兰德的"真实世界"和"理性自觉"都是主观和经验的产物，康德的驳论完全可以涵盖二者。基督教神学家会指出：人的理性和人本身一样，如果不是堕落的，至少始终存在堕落的倾向。如果否定信仰和恩典，纯任逻辑的理性将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走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最终毁灭认识的可能性。不过，兰德在哲学界是典型的"自学成才者"。她从来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传统，大概不知道这些驳论早已存在了。她的基本目的其实是政治论战，因而强于解构，弱于建构。

她能毁灭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这就足够了。至于奠定理性主义的大厦，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她当然也做不到。

帕特森始终坚持基督教，认为兰德对演绎和逻辑的信任已经超出了边界。兰德却不相信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坚信基督教的道德将会为更好的道德取代。她无疑认为：自己就是这种新道德的先知。她写信给帕特森，嘲笑全知全能的上帝完全符合极权主义独裁者的所有条件。她对理性主义的执着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坚持说，头脑不能理解的实体和范畴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偶然现象。在她看来，“启示的法则”不是理性法则的原点，而是更低级、更不完善的替代品。基督教赞美苦难和兄弟互助之情，引起了她感情上的反感；因为她太熟悉、太厌恶苏联的“团结友爱”宣传了。跟有些人的想象相反，兰德对个人慈善活动并不吝啬，但她就是忍受不了利他主义的劝善说教。1945 年感恩节，一位牧师不请自来。奥康纳一面欢迎他，一面指责兰德对穷人的看法过于刻薄。两人几乎吵起来。兰德在加州这几年时间里，对帕特森的感情日渐疏远。私下里，兰德觉得帕特森顽固不化，咄咄逼人。她为了应付写作的紧张压力，服用安非他命。帕特森用保姆式的态度对待她，叫她不要相信医生的胡话，以为这药当真不会造成损害；甚至在信中开玩笑地警告：“如

果你再吃安非他命，我就要把你打成一个气泡。”这种劝说没有起作用，兰德此后30年一直服用安非他命。不过即使如此，兰德对这位老朋友仍然怀有敬畏之心。帕特森是她第一个“灵魂的知音”，任何其他人对她都没有这样重要。

1948年夏末，奥康纳夫妇返回纽约，跟兰德的文学代理人和出版社协调。在此期间，《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尤金·列昂（Eugen Leon）邀请她参加派对。兰德在派对上遇见了少年时代的偶像——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她惊愕地发现，克伦斯基居然是一个滥情的自恋狂。他对自己的失败毫无反省之意，一味夸夸其谈当年多么深得民心。他甚至像斯拉夫主义者一样，谈论神秘的俄罗斯灵魂解救人民。在兰德的眼中，他不过是又一个毫无理性分析能力的俄国庸人而已。泡沫早晚会破裂，俄罗斯的阿丽萨·罗森鲍姆已经消失在安·兰德的阴影下。不过，阿丽萨在挂念俄国亲友的时候仍然活着。兰德继续为苏联难民提供庇护所，就像当年芝加哥亲戚对待她自己一样。难民包括她母亲的密友玛丽·冯·斯特拉乔（Marie von Strachow），兰德用了两年时间才为她争取到移民资格。兰德1925年逃离苏联时，斯特拉乔也帮过忙。二战结束时，

斯特拉乔住在奥地利，通过国际难民委员会美国代表团告诉兰德：她的双亲都去世了。1939年，父亲吉诺菲死于心脏病。1941年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母亲安娜死于癌症。后来，兰德通过其他途径获悉：妹妹娜塔莎（Natasha）和表妹尼娜·古萨奇科（Nina Guzarchik）都死于德军的轰炸，妹妹诺拉（Nora）下落不明。维拉·古萨奇科（Vera Guzarchik）从柏林迁往巴黎，一度在巴斯德研究所做事，婚后迁往里昂。兰德给维拉寄去了食物和包裹。

40年代以后的兰德声名显赫，妙语连珠，在东西海岸的知识圈内大受欢迎。年轻的粉丝团开始在她身边聚集起来。1945年春天，21岁的撒迪厄斯·阿什比（Thaddeus Ashby）来到她的农场。阿什比原先在麦凯恩－埃里克森公司（McCann Erickson）工作，相信兰德是当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写信给兰德暗示：他比华纳兄弟公司更理解霍华德·洛克的性格，更有资格当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兰德没有回信，但阿什比还是不屈不挠地赶到好莱坞。兰德被他的执着感动，在派拉蒙（Paramount）摄影城请他吃饭。阿什比当场背诵《源泉》的几个片断，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我引用《源泉》，就像基督教原教旨信徒引用《圣经》。"

当天晚上，兰德请他去费尔南多谷的农场做客。她

发现阿什比没有坚持写作必需的钱，就留他在农场住了好几个月。兰德说服的前共产主义者阿尔伯特·曼海姆也在好莱坞编剧。他周末经常到农场造访，兰德称他为“我的精神继承人”。1945 年，剧作家沃尔特·埃伯特（Walter Abbott）来到农场，加入了阿什比和曼海姆的周末粉丝团。兰德说服哈尔·沃利斯，给他找了一个周薪 150 美元的初级电影编剧工作。沃利斯的个人助理杰克·邦奇（Jack Bungay）有时也会加入粉丝三人组，整夜谈论哲学问题。兰德像宗师一样居高临下，时不时放下《阿特拉斯耸耸肩》，插进来指导他们。1946 年，阿什比离开加州，前往哈佛大学。后来，他为几家杂志工作，又变成了海因莱因[10]和致幻菌[11]的信徒。兰德似乎更擅长培养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而非实践者；毕竟，她自己也是前者，而非后者。

注释：

1. 19 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发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后说：我发现自己一夜成名了。

2.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美国著名

左翼作家和剧作家。她的反纳粹舞台剧本《守望莱茵河》（*Watch on the Rhine*）于1941年上演，被纽约剧评家协会评为年度的最佳剧本。

3. 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 1892—1970），美国著名建筑师。诺伊特拉的作品主要是小住宅，因其特别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要求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特点，而在美国独树一帜。生前曾获得多种荣誉奖和荣誉博士学位。1977年，美国建筑师协会还追授他金奖。

4. 弗兰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美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作家、教育家，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莱特相信建筑的设计应该达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并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有机建筑”的哲学。美国建筑师学会称莱特为“最伟大的美国建筑师”。

5. 加里·古柏（Gary Cooper, 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和一次金球奖最佳男主角，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99年，他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第11名。

6. 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且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一般认为随着笛卡儿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同时代相对的另一种哲学方法被称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它认为人类的知识可能除了数学之外，主要来源于经验。

7. 经验主义（Empiricism）是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理论应建立于对于事物的

观察，而不是直觉或迷信，即通过实验研究而后进行理论归纳优于单纯的逻辑推理。与经验主义相对的是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笛卡尔）。经验主义首先在17世纪由洛克（John Locke）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8. 休谟认为理性是有限的，无法区别因果关系和习惯性相关性。

9. 康德主义（Kantianism）是由康德创立的哲学体系，以及研究康德著作所衍生的哲学。康德主义包含了研究康德所关心的人类知识的性质和界限，以期把哲学提升至科学层次的各种哲学。康德主义的每个支派都倾向于着重自己对康德众多哲学思想的选择和解读。

10. 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 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他的《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其实是右翼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文学诠释。

11. 印第安人食用的野生蘑菇或菌类，可以产生高峰体验，在60年代的嬉皮士中非常流行。

第十三章

个人主义与麦卡锡主义

不能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源泉》25周年纪念版序言，1963

1945年底，《源泉》重返畅销榜。摘要版、插图版、连环画版相继发行。兰德不太策略地向伊莎贝尔·帕特森吹嘘：她早就说过小说销量能超过10万，现在都要到15万了。她这位伯乐的作品却乏人问津。两人的地位似乎颠倒过来了，关系颇为尴尬。不过，我们必须公正地说，《源泉》的销量非常依赖那些喜欢火辣爱情故事（而非思想内涵）的读者。在读者俱乐部的晚宴上，一位女读者问兰德：她是怎么想象出多米尼克那些热辣的性爱场面的？是不是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兰德从容答道："如果是这样就好啦。"听众哄堂大笑。据阿什利说（他在农场跟奥康纳夫妇相处甚密），弗兰克·奥康纳外表非常英俊，足以令任何女性想入非非；性格却温顺被动，兰德经常希望他更大胆、更狂野一些。

鲍勃斯－梅里尔公司觉得机不可失，委托兰德写一部自传。此书就是《致〈源泉〉的读者》（To the Readers of *The Fountainhead*），构成兰德神话的主要基础。兰德刻意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纯粹精神的人，为创造的愉悦而写作。读者如果仅仅从这部书理解兰德，就会以为犹太人的背景和俄国革命的经历对她的思想没有什么影响。他们还会认为，兰德的个人主义是纯粹理性演绎的必然结果，正如兰德几乎说服自己相信的那样。本书的关键

卖点在于：兰德骄傲地渲染她惨遭十二家出版社拒绝，长期干杂活维生的故事（在宏大叙事的意义上，她说得没错；虽然在数目字考据的意义上，她有所夸张）。这种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终成大业的励志故事早就是美国文化的关键元素了。公众多半不能区别兰德的理性主义和其他几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差异，却肯定会欣赏又一个成功的美国梦，正如他们以后追捧《李·艾柯卡自传》（*Iacocca: An Autobiography*）[1]一样。

哲学界不大尊重兰德的野路子，宗教界从来不喜欢她的无神论；兰德对他们也没有多少敬意。她的志向就是做宣传家，象牙塔只会招来她的鄙视。她说："只有哲学原则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时候，我才对哲学感兴趣。只有人们反映了哲学原则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兴趣。抽象理论跟现实无关，连废话都不如。如果有人宣称理论和实际互不相干，他就是理论界的傻瓜、生活中的恶棍。"1945年12月，兰德告诉亨利·布兰克："不要小看《源泉》的欣赏者，他们就是某种信徒。"这些门徒在60年代形成了真正的亚文化团体，实现了她的预言。兰德的敌人不无理由地称他们为"邪教"（cult）。

这一年，杜鲁门[2]接替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结束了战争。配给制结束，战后繁

荣开始了。原子弹科学家开始进入美国大众文化的想象世界，预示着“奇爱博士”[3]后来的诞生。1946年1月初，沃利斯趁热打铁，委托兰德拍一部关于原子弹发展史的纪录片。兰德写了一份备忘录，称原子弹为美国生活方式的胜利。她说，原子弹代表人类的伟大和拯救，只能产生于自由社会；纳粹制造原子弹的企图失败了，因为最可怕的暴君也无法强迫创造者违心地工作。她希望这部电影能告诉观众，在自由和专制的公平竞争中，前者永远胜券在握，“本片的主要宗旨是宣传这个道理，解释原子弹的奥秘还在其次。”

兰德对沃利斯开玩笑说：如果有上帝，可能已经决定将原子弹作为美国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据。当然，严肃的科学史作家会认为，这部电影是宣传家为宏大叙事而牺牲真实性的绝好例证。原子弹的产生主要应该归功于20世纪初叶德国理论科学的突飞猛进，美国在这些方面仍然略逊一筹。德国的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希特勒为渊驱鱼的迫害政策，以及优先发展火箭的错误决策。如果一个社会不自由、不民主，但懂得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提供特殊优待，完全有可能以牺牲社会大多数成员为代价，集中一切力量，成功地发展核武器。苏联后来就是这么做的。

兰德把这部电影命名为《最高机密》(*Top Secret*)。她首先采访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高级指挥官莱斯利·格罗沃斯（Leslie Groves），然后两次拜访奥本海默[4]。奥本海默似乎没有给她留下好印象,因为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将他塑造成既虚荣又软弱的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Dr. Robert Stadler）。她的剧本才写到三分之一，沃利斯就把拍摄权卖给了米高梅公司。米高梅自己也在拍摄原子弹影片，想用这样的方法消除竞争。苏联宣传材料很喜欢引用这一类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邪恶性。兰德勃然大怒，给沃利斯写了一份抗议的备忘录，提前三个月回到农场。在此期间，她完成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第一章。

1946年的好莱坞充满了党争的气氛。战争一结束，潜伏已久的左右之争就浮出了水面。兰德和她的朋友萨姆·伍德（Sam Wood）、约翰·福德（John Ford）、莉拉·罗杰斯（Lela Rogers）、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莫利·里斯金德（Morrie Ryskind）、制片人詹姆斯·麦吉尼斯（James McGuinness）、《源泉》未来的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等人一起建立了“电影联盟”（Motion Picture Alli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merican Ideals [MPA]），公开鼓吹维护美国生活方式，反击渗入电影界

的共产主义势力（左派的电影编剧工会和电影厂工会联合会）。据说，路易斯·梅耶（Louis Mayer）是这个组织的幕后支持者。“电影联盟”每周都在米高梅电影厂开会。米高梅总裁罗伯特·沃格尔（Robert Vogel）后来说，兰德几乎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她也是“保卫美国理想”执行委员会成员，为他们的时事通讯《警戒》撰写短文。这些文章很像兰德主义教义问答手册，其作用类似速成班讲义。“当今世界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反对集体主义。”“政府的正当职能是什么？”“保卫个人权利，不受其他个人或团体侵犯。”这些活动的结果就是“赤色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间的敌意日益增加。在这种紧张气氛中，《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的作者詹姆斯·凯恩（James Cain）突然提议设立“美国作家管理局”（American Authors Authority）。照他的设想，这个组织应该拥有所有作家协会和电影协会的作品版权、执照核准权、征税权。兰德认为这种企图就是赤裸裸的集体主义阴谋，意在掠夺和奴役所有创造者。她和“保卫美国理想”的同事组织了美国作家协会，准备跟一切垄断组织作斗争。

1947年，苏联推翻了捷克和匈牙利的政府。希腊内战如火如荼，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接替英国保卫自由

世界。战时蜜月结束了，美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昙花一现的繁荣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批人的致命弱点在于：即使借壳上市，自称自由主义者或运用统一战线的伪装，他们的势力也没有超出知识分子圈。麦卡锡时代开始了，但是跟参议员麦卡锡个人关系不大。中欧的沦陷唤醒了美国公众对赤色渗透的恐惧，他们将雅尔塔上当受骗的责任[5]放在这些潜伏分子身上。两党政治家、教会、社区和工会竞相以反共相互标榜，力图证明自己才是洞烛先机的清醒者。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6]将目光投向好莱坞，为1947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会准备材料。委员会主席是新泽西州众议员帕内尔·托马斯（Parnell Thomas），副主席是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John Rankin）。“保卫美国理想”协会兴奋起来，开会的频率达到了每周三次。兰德一向下笔勤快，专门撰写了《美国人电影指南》（*Screen Guide for Americans*），向电影公司和制片人推荐免疫赤化的实用技术。她说：言论自由只能保证赤色分子可以自由表达理念，不受法律限制。私人企业并无义务“用自己的钱宣传自己的毁灭”。

1947年10月16日星期四，奥康纳夫妇和一批电影界名流乘车前往华盛顿，为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

听证会在下周一召开，大批记者、摄影师和影迷蜂拥而至，即使接近大楼的位置都非常抢手。听证会召见了 24 位友好证人，19 位非友好证人。前者大部分属于“保卫美国理想”协会的班底，包括兰德、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阿道夫·曼久（Adolphe Menjou）和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后者都是假定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路人，包括著名的“好莱坞十人”（Hollywood Ten）：阿尔瓦·贝西（Alvah Bessie）、赫伯特·比伯曼（Herbert Biberman）、莱斯特·科尔（Lester Cole）、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小瑞恩·拉德纳（Ring Lardner Jr.）、约翰·霍华德·劳森（John Howard Lawson）、阿尔伯特·莫尔茨（Albert Maltz）、塞缪尔·沃内茨（Samuel Ornitz）、阿德里安·斯科特（Adrian Scott）、道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麦卡锡主义的精神体现于国会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三百多年前，英格兰王国下议院曾经以同样无礼的态度质问白金汉公爵有没有秘密忤逆国王、王国和宗教。“好莱坞十人”做出了公爵当时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拒绝回答，甘受蔑视国会的惩罚。他们此后受到主要电影厂的歧视，却在左派的小圈子内赢得

了英雄式的盛名。

兰德在当天下午宣誓作证，涉及的问题是 1944 的战争宣传片《俄罗斯之歌》(*Song of Russia*)。在影片中，美国交响乐团指挥约翰（罗伯特·泰勒饰演）去苏联旅行。在那里，他爱上了苏联女钢琴家娜佳。两人一起参加娜佳故乡的音乐节。那里的农民强壮、富裕、自由、幸福，整天载歌载舞、无忧无虑。德军逼近他们的村庄，村民英勇抵抗，但还是失败了。约翰和娜佳逃到美国，向美国人民宣传苏联人的抗战事迹。其实，米高梅这部影片是罗斯福政府鼓励的战争宣传，试图说服公众相信"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当性。兰德指出，真实的苏联遍布恐惧、饥饿和集中营，影片中的村庄比波将金村庄更不真实。她没有指控影片的编剧保罗·杰里科（Paul Jarrico）和理查德·科林斯（Richard Collins），但这两人后来都承认了共产党员身分。"保卫美国理想"协会主席萨姆·伍德指控了七名共产党潜伏党员，包括"好莱坞十人"中的四人。

米高梅总裁路易斯·梅耶处境比较尴尬。他个人思想保守是毫无疑义的事情，但他一般不会让观念影响自己拉关系，做生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位时，米高梅为亲苏的统战宣传出力不少。《俄罗斯之歌》就是他

在这一时期的产品。战争结束后，他又暗中支持“保卫美国理想”协会的活动。在非美调查委员会的“纯正右派”眼中，他是一个不光彩的投机分子。委员会之所以要求兰德作证，就是为了羞辱梅耶。兰德仍然是美国政治的局外人，丝毫没有看出其中的玄机。她秉着知识分子的自负，只看到国会给了她一个宣扬兰德哲学的讲坛，颇有感激之意。托马斯主席为了让她高兴，承诺举行一场“全新的专门听证会，除了意识形态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方便她“畅所欲言”。兰德说，她作证不是无条件的。托马斯焦虑地问道：“什么条件？”她回答：“当然是哲学条件。”主席如释重负。“噢，我还以为你是说钱呢。”兰德后来说：“这一下，我可看透他的哲学了。”果然，托马斯次年就因为拿回扣而东窗事发，落到那几位“潜伏共谍”同样的下场。确实，生活有时候比小说还精彩。

兰德再次证明自己不适合搞政治。听证会十天就结束了，没有人关心她的哲学。她跟左派结下了不解之仇，后者不吝于应用人身攻击和漫画式歪曲。不过，这种攻击对她的“个人主义宗师”公众形象反而有利。她让路易斯·梅耶出了丑，后者耿耿于怀。杰克·华纳原本打算批评《出使莫斯科》（*Mission to Moscow*）、《我们最好的岁月》，因《俄罗斯之歌》风波而失去了机会，也迁怒于她。

兰德身为“纯正右派”，不为私人恩怨所动。她回到好莱坞，继续本着信念反共。听证会结束两周后，《美国人电影指南》发表在《实话实说》（*Plain Talk*）杂志上。《纽约时报》也为此书发表了专题介绍。各大电影厂纷纷要求“保卫美国理想”协会重版该书，不再聘用左派剧作家和导演，不再宣传社会主义和亲苏主张。1961年，兰德总结说：“我在《美国人电影指南》当中指出的内容消失了。”“你只要看看老电影就能发现。”她一定打破了许多人的饭碗。

注释：

1. 李·艾柯卡（Lee Iacocca, 1924—）原来是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遭到老板排挤后改投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挽救了危亡中的企业。他的自传是20世纪80年代的畅销书。

2. 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 1884—1972），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34任副总统（1945年），随后接替因病逝世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成为了美国总统（1945—1953）。

3.《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是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1964年导演的一部电影。此片是根据彼得·乔治（Peter George）的小说《红色警报》（*Red Alert*）改编的一部关于冷战时期荒谬的国际政局以及全球核战威胁的黑色幽默电影。故事中，“奇爱博士”是美国总统的幕僚之一，他提出怪诞的方法解决“世界末

日”的问题。

4. 尤里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国科学家、原子弹之父，以特立独行著称。

5.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接受了斯大林对波兰问题、东欧和远东战后安排的要求。这意味着放弃苏联当时仍然承认的波兰流亡政府，允许苏联以联合政府的名义逐步控制整个东欧和中国，同时不要求任何补偿。国务院以统一战线为重，拒绝相信苏联只会把联合政府解释为全面赤化的过渡状态。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又不经杜鲁门（Truman）总统同意，承认苏联单方面建立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这种暧昧的态度很快就引起了公众的怀疑：国务院本身已经遭到苏联间谍的渗透。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6. “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38—1969 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机构。

第十四章

旧宗师与新门徒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并不是想拯救世界，不是想为同胞服务，而是为了获得创造自己喜欢、尊敬并欣赏的人事的那种单纯、个人、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幸福。我能够忍受平视地环顾自己的四周，但我不能忍受俯视。我想要仰望。

——《致〈源泉〉的读者》

（To the Readers of *The Fountainhead*），1945

自从在加利福尼亚安家以后，兰德每年都有半年时间留在农场。这几个月是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间，造就了《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雏形。兰德宗派或兰德文化圈就是这部小说和《源泉》的产物。《阿特拉斯耸耸肩》充分体现兰德逆向激进主义的精神，把人民大众的罢工颠倒为精英分子的罢工，把柏拉图、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统统打入新个人主义的哲学地狱。故事背景酷似新政时期的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篡夺了话语权，把资本主义贬低成简单的自私自利和邪恶的剥削。政府和社会一点一滴地滑向集体主义。“劫匪和乞丐”（兰德像一个老练的宣传家一样，知道鲜明的意象才是王道，用这个词代替乏味的“管理当局”一词）借口公共利益和普遍福利，武断干预生产和分配。十二年来，精英不断消失。各行各业的发条都松弛了，煤炭、石油、钢铁、消费品、电力和交通日益陷入匮乏和紊乱当中。国民人心惶惶，官僚和策士却理直气壮地主张：一切混乱都证明社会需要更有力的管制。实际上，他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增加管理，把肥缺集中到自己人手中。

詹姆斯和达格妮·塔格特（James & Dagny Taggart）兄妹出身铁路世家。在19世纪后半叶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他们的祖辈创立了“塔格特横贯大陆铁路公司”。左

派把这个时期称为“强盗男爵”和野蛮资本主义的黑暗时代。基督教会称之为无神论和社会达尔文邪说[1]横行的悲惨时代。知识分子称之为市侩文化第一次征服高雅文化的庸俗时代。游手好闲的詹姆斯担任公司名义总裁，但真正努力为公司奋斗的人是副总裁达格妮。詹姆斯是庸人的化身：一面剥削和依赖创造者，一面仇恨和嫉妒他们。他依靠妹妹的努力维持门面，深感自卑，企图借助社会主义找回自尊，因为社会主义把创造者称为剥削者，把寄生虫称为被剥削者。他背叛公司奋斗创业的传统，走上了一条权力经济学路径：通过官商合作、政策优惠，实施经济上不量力而行的大项目，把成本和亏损转嫁给纳税人。就这样，詹姆斯和首都的经济沙皇决定修建通向社会主义墨西哥的铁路支线。达格妮体现了兰德本人的特征，坚持到底，决不放弃。她推出一条对抗性的支线，穿过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科罗拉多州。她说服另一位创造者汉克·里尔登（Hank Rearden）把他发明的“里尔登合金”卖给她。里尔登同意了。他们合作的“约翰·高尔特铁路”（高尔特是民谣中的传奇人物）大获成功，两人不知不觉堕入爱河。

里尔登和达格妮庆祝胜利，周游全国各地。他们看到的美国酷似革命后的苏联，百业凋蔽，某些城镇和村

庄已经退化到物物交换的地步。他们在途中遇见一家衰败的工厂“20世纪发动机公司”，在废墟中找到一台新型发动机的残余。这台机器可以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能源，掀起新一波产业革命。他们亟欲寻访这位神秘的天才发明家，却被抛锚的火车扔在堪萨斯大草原上。事故的起因是政府颁布武断的法律，禁止铁路员工自由辞职。结果适得其反，全体员工弃职而逃。这个情节的原型在俄罗斯。如前所述，二月革命后，铁路工会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随意支配出入彼得堡的物资，逼得温和的临时政府走投无路。新政府一上台，就取消了随意离职，更不用说罢工的权利，用“革命审判委员会”制裁怠工者。在革命通俗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当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是在镇压怠工分子的工作中快速进步的。达格妮在草原上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他原先就是“20世纪发动机公司”的工人。这家公司曾经繁荣昌盛，是品质保障的代名词，但引进了计划经济原则后，变成了假冒伪劣商品和流氓、懒汉的乐园，有能力的员工纷纷逃之夭夭。流浪汉告诉达格妮，年轻工程师约翰·高尔特就是这台发动机的发明者。在公司老板斯塔恩斯兄弟宣布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会上，高尔特宣称：“我要关闭这个世界的发动机。”然后，他拂袖而去。从此，公

司就江河日下。

达格妮恍然大悟：如果创造者罢工，依赖他们生存的“劫匪和乞丐”就只有死路一条。她租了一架飞机，寻访约翰·高尔特。她的飞机在神秘谷地迫降。达格妮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高尔特的怀抱中。原来，高尔特策划了创造者的罢工。杰出的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悄悄来到高尔特谷，建立了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听任集体主义者自取灭亡。这时，罗伯特·斯塔德勒教授将核武器交给了政府。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末日决战在所难免。狡诈的官僚绑架了高尔特，企图强迫他拯救摇摇欲坠的计划经济体系。达格妮和里尔登为了救他，毫不犹豫地杀害了政府军警。高尔特回到他的山谷，利用强大的无线电设备，向全国发表演讲，痛斥集体主义的邪恶，论证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这篇演说长达 6 页，构成了兰德主义的精华。

在此期间，兰德结识了全国工业协会董事长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和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总经理威廉·马伦多尔（William Mullendore）。三人谈起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意气相投。马伦多尔说他想写一部书，解释集体主义如何妨碍大部分正常的经济活动。兰德告诉他：“我 1937 年写过这样一本书，在英国出版的。”她

指的是尼采体寓言小说《颂歌》。里德听说她的书没有美国版，就建议由他的“小册子作者公司”出版。这家公司刚刚出版了奥地利学派之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3]的著作。这是兰德跟奥地利学派的第一次接触,预示两支“保卫罗马的蛮族军队”注定会有一段缘分。

1948 年 6 月,《源泉》电影剧本终于完成了。兰德仍然念念不忘嘉宝，但电影厂嫌这位影后年纪太大。加里 · 古柏毫无争议地接任男主角，他举荐帕特里夏 · 尼欧（Patricia Neal）演多米尼克。不久，他们的恋爱就弄假成真了。兰德在信中说，导演维多非常尊重她的剧本，“拍摄完全依照剧本，一字不差……在好莱坞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她这话说得太早了。真实情况似乎是：摄影组畏惧她的强势个性，不敢说真话。兰德等到电影首映那天，才发现洛克的关键台词被剪掉了。这句话是：“我想把话说清楚，我不是为别人生活的。”她后来回忆说，销售部门和加里 · 古柏的代理人都游说她淡化剧本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以免得罪（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观众。兰德凭藉性格的力量把他们统统击退了。然而，影评家并不买她的账。《纽约时报》的柏斯利 · 克劳瑟（Bosley Crowther）大肆谴责她的超人哲学。无论是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源泉》的票房非常可怜，跟她的巨大

努力和期望不相称。后来，兰德对布兰克和维多的评价越来越低。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不能接受失败；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世界观毕竟深受善恶决斗论影响。她从来没有像正统的基督徒那样，把恶看成善的堕落或残缺；而是像共产主义者和摩尼教徒[4]那样，把善恶看成对等的力量。她根据这个框架理解世界，解释事件。自然，她会把自己放在绝对正确的一方。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她会修正历史——正如苏联不断根据政策变化修改历史。

兰德和帕特森的关系证实了这种模式，其特征并非不像斯大林和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兰德成名以后，跟帕特森的关系越来越糟。这部分是因为她们不断争论基督教和纯理性个人主义的优劣，谁也不能说服谁；部分是因为兰德地位上升，门徒云集，不再需要旧日的导师和伯乐。帕特森责备兰德侮辱千百万基督徒和他们的苦难救赎，谴责她的色情描写，一言一行仍然把兰德当作后生晚辈。然而，兰德已非吴下阿蒙。她的小说畅销，而帕特森的书《机器的上帝》（*The God of the Machine*）卖不出去。帕特森的事业每况愈下，甚至失去了《先驱论坛报》的职位。1948年5月，帕特森拜访兰德的农场。兰德将她介绍给加州的右派朋友。帕特森对待他们就像

对待兰德一样，居高临下地嘲笑他们根本不懂政治。兰德拉不下脸面，两人终于决裂。奥康纳送客人去机场时，兰德断定：这位老朋友在她心里已经死了。1959 年，帕特森穷困潦倒，到纽约求兰德帮忙出版她最后一部小说。兰德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们谈到《阿特拉斯耸耸肩》。帕特森同样直言不讳，反对人类绝对理性的概念。两人不欢而散，帕特森不久就去世了。兰德把她当年的帮助和友谊从记忆中抹去，坚持说："从来没有人帮助过我，我也从来不觉得有义务帮助谁。"

兰德的门徒越来越多，但她后来说，只有一个人对她有特殊意义，就是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这个名字是他认识兰德以后才改的，用希伯来语"兰德的儿子"字母组合而成。）1949 年，布兰登还叫纳撒·布卢门撒尔（Nathan Blumenthal），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为叔叔的珠宝店打工。布卢门撒尔家跟罗森鲍姆家一样，都是俄裔犹太人。《源泉》是他最心爱的小说。他从 14 岁起开始读，从头到尾读了 40 遍，精彩部分读了上百次。如果说他还不能逐字逐句地复述某些部分，概述所有段落的大意至少没有问题。基要派基督徒或穆斯林对《圣经》或《古兰经》若能如此熟悉，都应该感到自豪。他计划报考加利福尼亚的大学，觐见

仰慕已久的作者。他写信给兰德，向她请教哲学和政治理论，没有收到回信。这年秋天，纳撒如愿以偿，考取了洛杉矶加州大学。他再次给兰德写信。兰德回了一封短信，列举了她出版的三部书。纳撒大为感动，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论证《我们活着的人》前后矛盾。同样的话如果出自长辈帕特森之口，兰德肯定不会服气，但后生晚辈另当别论，她喜欢谆谆教导，而非受人教导。她在回信中耐心地解释了他的问题，还推荐了一批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著作。她忙于撰写《阿特拉斯耸耸肩》，时间紧张，几乎闭门谢客，却主动索取纳撒的电话号码，最后打电话邀请他去农场做客。

兰德的优等生性格终生不改，骄傲而非利益才是她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尽管她在著作中往往说出相反的话）。她跟大多数理论家一样，自以为完全依据逻辑，其实却总是摆脱不了心理结构的影响。她的骄傲使她不可能不鄙视布尔什维克的“强盗和乞丐”；同样使她热爱美国的一切，唯独基督教例外。从她跟帕特森的争论就可以看出，她把全能上帝视为独裁领袖的同侪，怀有尼采式的不服气：“如果有神而我不是神怎么办，所以没有神。”骄傲的人多半行为正直，不屑于卑鄙下流的手段，但这种人的导师和门徒都很难做。她的骄傲不允许她久居人下，她

的才干促使她后来居上。如果旧日的宗师不能顺应形势，就会应验另一位犹太才子亨利希·海涅[5]的高见：孝顺可不是文学界的美德，弑父才是扬名立万的正途。她更喜欢自己做宗师，待弟子远比待导师慷慨厚道；因为这符合她心目中的自我形象。如果门徒渐渐觉得自己羽翼丰满，敢于欺骗宗师；他就会发现，温良恭俭让可不是尼采信徒的美德。纳撒尼尔·布兰登后来的待遇就是这样的。

不过，当时的纳撒尼尔·布兰登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也会飞黄腾达。1950年3月2日，他驱车来到兰德的农场。奥康纳打开大门，门徒第一次看到他崇拜已久的先知。他诚惶诚恐，如对神明，仿佛《源泉》的世界降临尘寰，觉得兰德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巨细无遗。大家寒暄了几句，在一间孔雀蓝色的房间里落座。屋里的东西都是兰德最喜欢的蓝绿色。《源泉》的多米尼克跟她的创造者品味相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里尔登合金也是这种颜色。布兰登注意到，他的偶像比书上的照片更矮更胖，一头深棕色短发，身穿朴素的衬衫和裙子，烟抽得很厉害，一口俄国腔始终改不掉。布兰登受宠若惊地发现，兰德居然在意他的想法。他急忙表示支持理性。兰德并不以此为满足，或者不如说，她很乐意抓住机会阐述读者通常不能全面认识的理论。她解释说，她的小

说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斗争，另一个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斗争。所谓神秘主义就是非理性地屈从于一个神、一个暴君或是一群人。只有资本主义完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维护政治自由和创新精神。她暗示，她的新书将会阐明所有这些问题。两人谈了9个多小时。布兰登驱车离开农场时，已经是凌晨5点半了。

第二年夏天，布兰登和他的同学兼女友芭芭拉·魏德曼（Barbara Weidman）一起加入了兰德的周末粉丝团。布兰登还经常给她打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布兰登佩服兰德精力过人，却不明白她为什么在自己身上花这么多时间。兰德解释说，她能辨别一个人有没有思考能力。布兰登到了她的年龄，肯定会大有作为。她称纳撒尼尔和芭芭拉为《源泉》的孩子，把《阿特拉斯耸耸肩》草稿的大段章节念给他们听，把他们引见给自己的右派朋友。这对年轻人当时还不明白，他们的偶像摆脱不了缺乏知音的孤独感。读者虽多，很少有人完全理解她试图传达的观念。她的政治盟友只欣赏她坚定的反苏反共立场，不关心她最自豪的哲学创新。她的智力明显高于丈夫和周围的朋友，交流起来相当困难。只有帕特森完全理解她，但绝不肯同意她把上帝、暴君、庸众一锅煮

的态度。布兰登既理解她，又赞同她，既聪明，又服从。这样的门徒并不容易找。这时，布兰登还不明白自己对兰德有多宝贵。当然，从政治角度讲，她的孤独反而有利。左派诬蔑兰德是法西斯分子，只会使右派出于误解而更加信任她。如果他们如实颂扬兰德坚持无神论的勇气，大概就能把她变成右派的票房毒药。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后半生事业就会不复存在。世界是荒谬的，政治则是荒谬中的荒谬。敌人可能是你最大的恩人，你自己可能是你自己最大的危险。当代的盛名大部分是误会的产物，后代的赞美大部分是心理投射的产物。哎，人生啊人生！

注释：

1.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被其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理由是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

2.《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 1904—1936）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1935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此小说在之后两年里以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50次。

3. 奥地利经济学派（Austrian School）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了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欧根·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穆瑞尔·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 1926—1995）和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 1949—）等人。奥地利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客观主义（Objectivism）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

4. 摩尼教（Manichaeism）又称牟尼教、明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所创的一个世界性宗教。摩尼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充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并且有严密的教团组

织和宗教制度。

5. 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德国著名抒情诗人，特点是用平常的词汇和普通的语句构造出思想深刻、生动优美的诗篇。

第十五章

兰德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

世界上也许有“灰色”的人,但却不能有“灰色”的道德准则。道德是黑白分明的规范，当人们试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妥协时，哪方必然失败、哪方必然获利是显而易见的。

——《灰色道德崇拜》(The Cult of Moral Grayness)

出自《自私的德性》，1964

1951年6月，芭芭拉考上研究生，前往纽约。纳撒尼尔也想去纽约大学攻读心理学，完成他在兰德启发下产生的“自尊心理学”理论（Psychology of Self -Esteem）。兰德的农场一下子变得寂寞了。这段空闲其实对她有利，使她得以完成《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前21章；但她越来越想念纽约的摩天大楼和智性生活。而且，布兰登在纽约。她对“孩子们”的牵挂超过了她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弗兰克·奥康纳早已觉察到，妻子对待布兰登的态度近乎打情骂俏，但他生性温和被动，又觉得布兰登只是个孩子，因此什么也没有做。9月下旬，兰德发誓说，她再也受不了加利福尼亚，决心重返纽约。西海岸的朋友以为奥康纳夫妇不久就会回到农场，兰德也只想在纽约逗留到《阿特拉斯耸耸肩》完稿为止；但他们除了短期旅行以外，再也没有离开纽约。1962年，奥康纳夫妇卖掉了圣费尔南多谷农场。售价17.5万美元，比买价高7倍。这次成功的投资主要归功于弗兰克·奥康纳。兰德在理论上是资本主义者，在生活中却更习惯做雇佣知识分子。

1951年10月24日，弗兰克和兰德搬进纽约东三十六大街的新公寓。林荫道对面就是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图书馆。当天晚上，纳撒尼尔和芭芭拉就登门拜访，如饥似渴地探索《阿特拉斯耸耸肩》新写

成的几章。随后的半年中，这对年轻人把十几位亲戚朋友介绍给兰德。他们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具备“局外人”的心理基础。布兰登像热忱的传教士一样，向他们推销《源泉》和兰德哲学。他的传道对象包括艾伦·格林斯潘[1]和伦纳德·佩科夫（Leonard Peikoff）。兰德一开始不太喜欢格林斯潘，因为他太忧郁，太沉默寡言。她背地里管他叫“殡仪馆业务员”。其实，格林斯潘的哲学素养比兰德更科班一点。兰德哲学像她的生活一样，太接近政治旋涡，探索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非其所长。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兰德的知识结构偏于陈旧。“客观主义”或“理性个人主义”都是19世纪唯理论的粗糙版本，她几乎没有吸收1920年代以后的任何哲学进展。

艾伦表示，“客观”是无法认知的。无疑，他的意思是要展开康德主义的物自体论证[2]。这种论证会暴露兰德的“理性”和“客观”概念的严重混乱。兰德用约翰逊博士的常识回避这个问题：“殡仪馆业务员怎么啦？他觉得自己存在不存在？”（据说约翰逊博士反驳唯心论的方法是用脚踢石头，证明它的存在。）书呆子学者编撰的哲学史一般不包括约翰逊和兰德的名字，原因就在这里。不过，格林斯潘的经济学知识很快就赢得了她的亲睐。《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性质需要更高的经济学素养。即使在当时，

格林斯潘的水准也比兰德迄今为止依赖的科普专栏作品强得多。兰德目光如炬，断言他一定有出息，把他的外号改为“沉默的巨人”。格林斯潘还有一个布兰登式的优点：他不仅喜欢提问，还能问到点子上。这是优等生相互识别的标记。如前所述，兰德喜欢当老师的感觉。她对待有出息的天才苗子慷慨仁慈，超出利害关系所能解释的程度。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偏爱利润率较低的行业，跟这种癖好关系密切。兰德如果把价值的主观性加入自己的理论中，就能较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不过她一开始就跟米塞斯意见不合。

在兰德的眼中，布兰登的小组就是她的“高尔特谷”（Galt's Gulch）。小组成员像众星捧月一样，在奥康纳夫妇的公寓周围安家。小组讨论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创作同步，内容相互交叉。她一写出新的章节，就读给这些忠诚的粉丝听。2004年，布兰登回忆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纽约、加州，而是生活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世界中。”兰德把小组称为“彗星”，把布兰登称为“彗核”。她对布兰登的感情已经逾越了师友的界限，像大家族的长姊和幼弟一样亲密而暧昧。纳撒尼尔和芭芭拉感情波动时，她深入双方的隐私，施加严厉的安抚和斡旋。纳撒尼尔对她敬畏有加，芭芭拉则既嫉妒又焦虑。1953年1月，纳撒尼

尔和芭芭拉在纽约市郊外的白色平原举行婚礼。奥康纳夫妇为他们充当伴郎和伴娘。布兰登的母亲蒂娜·布卢门撒尔（Dinah Blumenthal）发现儿子“喜欢安·兰德超过喜欢自己”，非常不满。

50年代初，纽约右派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也就是说，传统的基督教保守派人士还没有向兰德主义者的无神论和超人哲学大张挞伐。他们以马修斯（J. B. Matthews）的公寓为据点。马修斯是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调查委员会主任，卓有成效地搜集了潜入政府内部的共谍档案。参议员臭名昭著的指控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值得注意的是：马修斯和另一位右派文人钱伯斯[3]都曾参加过共产党。共产党人变节反共或苏联移民投奔西方，往往比地道的美国人更仇恨苏联和共产党，态度更激烈。马修斯还有另外两位常客，在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一位是小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创始人和《麦卡锡及其敌人》（*McCarthy and His Enemies*）的作者；另一位是罗素·柯克，《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艾略特》和《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作者[4]。

兰德在非美调查中的表现奠定了她在右派圈内的声誉。美国社会的免疫排斥反应正在高潮，右派还无暇为

纯理论分歧而相互斗争。巴克利说：“她是麦卡锡主义者，我也是。我刚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此书大概就是1954年出版的《麦卡锡及其敌人》，直至今日仍然是为这位参议员最有力的辩护。巴克利对兰德的魅力评价甚高，一连几年给她寄拉丁文明信片。麦卡锡去世后，兰德仍然忠诚不渝。她把诋毁参议员的宣传斥为“大谎言”，直言不讳地断言：麦卡锡不但没有错，而且做得不够；如果他更勇敢一些，本来可以扫清政府高层的间谍。从苏联解体后流出的材料看，她这种想法颇有道理。麦卡锡主义虽然不符合许多美国人对“正当程序”的高标准要求，在兰德这位原先的苏联居民眼里却只会显得太文明。如果她的苏联同胞能享有非美调查委员会的程序保护，布尔什维克早就不存在了。兰德和巴克利都喜欢麦卡锡，讨厌艾森豪威尔[5]。在“纯正右派”的眼中，艾森豪威尔显得太软弱，太缺乏原则。1952年和1956年两次大选，兰德都不肯投票给他。当然，她更不肯支持民主党的艾德莱·斯蒂文森[6]，只有根本不参加投票。

战争时期，米塞斯在佛朗哥政权[7]的庇护下逃到美国。兰德是他结识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之一，但他们几乎立刻就在自然权利的问题上吵翻了。从兰德后来对米塞斯著作的评论看，她认为奥地利学派只在乎资本主义的现实依据，

不在乎道德依据。在她看来，理性利己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理性。艾森豪威尔和米塞斯居然都没有看出来，只配受她鄙视。兰德重返纽约后，再次跟米塞斯接触。这一次，两人又当着布兰登的面吵起来了。米塞斯只反对经济方面的管制，仍然支持"守夜人政府"的传统权力，包括征兵。兰德认为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坚决反对征兵。他们的争论变成了右派圈的谈资。巴克利和柯克津津有味地说：米塞斯骂她是个犹太傻女孩，兰德哭了。兰德粉丝团到处辟谣。1962年，布兰登写信给米塞斯，求他书面否认。米塞斯同意了。然而，接待米塞斯和兰德的东道主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的作者）[8] 多次私下承认，确有其事。

米塞斯的美国学生穆瑞尔·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9]，组织了一个青年学生社团"巴斯夏圈"[10]。巴斯夏圈跟兰德粉丝团的成员颇有重合。最后，他们决定召开联席会议。兰德一方的成员包括她本人、奥康纳、佩科夫和格林斯潘（布兰登夫妇当时在加拿大）。罗斯巴德一方的成员包括他本人、乔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和拉尔夫·莱克（Ralph Raico）。他们再度争论"客观主义"和"主观价值"[11] 的是非，谁都没有说服谁。兰德的辩才和个性力量给雷斯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说："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撼动她。"罗

斯巴德却没有参加辩论，因为他早已跟兰德的门徒打过交道，不再抱有说服他们的希望。他们一直争到凌晨5点半。下一周，“巴斯夏圈”倾巢出动，结果仍然一模一样。罗斯巴德写道：如果你做不了彻头彻尾的兰德理性主义者，就只能做敌人——“死亡和毁灭的真正信徒”。兰德的乌托邦“即使人人外表不同，灵魂深处也是完全相同的”。高尔特谷（Galt's Gulch）就是这样的地方，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反向的苏联。于是，兰德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再度分道扬镳。

1954年9月，奥康纳夫妇、布兰登夫妇和布兰登的妹妹伊莱恩（Elayne）去加拿大旅行。1929年，兰德跟弗兰克·奥康纳去墨西哥旅行。此后，她一直来往于纽约和加州之间，没有再出过国。回家路上，她心情轻松，跟布兰登打情骂俏。同行的芭芭拉说，他们彼此凝视，“仿佛深入对方，再也拔不出来。”布兰登向妻子保证，他不会爱上比自己大25岁的兰德。可惜，这个承诺只保持了两天时间。兰德回到纽约不久，就把弗兰克、纳撒尼尔和芭芭拉召到起居室。她平静地宣布：她和纳撒相爱了，“我们不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如果想要奉行自己公开宣扬的价值观，为什么不能相爱呢？”弗兰克和芭芭拉无法抗拒她的逻辑，同意了。芭芭拉后来说：“你一旦接受了她的前提，就无法逃避随后的逻辑链。”两个月后，兰德和布

兰登变成了情人。弗兰克和芭芭拉同意他们一周见面两次。兰德再次安慰他们，这种情况至多持续一两年。她一向克己自持，临老前理应痛快一下。“如果我们境界不够高，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她的意思是:周围的庸人境界不高，适用于另一种道德观。

《阿特拉斯耸耸肩》已接近完成，只剩下约翰·高尔特最后的演讲。兰德为这篇演讲殚精竭虑，从1953年一直写到1955年。她暗下决心，这篇演讲应该无懈可击，总结她的所有哲学：客观主义——现实独立于感官；理性主义——知识来自理性，而非感觉；个人主义——道德源于理性利己主义。这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任务，“犹如滴水穿石”。她曾经一连33天足不出户，依靠安非他命支持。布兰登自愿担任秘书，代她迎接源源不断的新门徒。他正确地预言:《阿特拉斯耸耸肩》一旦出版，崇拜者的大军就会蜂拥而至。1955年10月13日，兰德完成了高尔特的演讲。1956年11月，《阿特拉斯耸耸肩》交付出版商。至此，兰德完成了她的哲学拱心石，“如果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人类的荣耀，我只能拿起《阿特拉斯耸耸肩》，重复霍华德·洛克的话：一切尽在此中。”

兰德早已不是1943年的新人。《阿特拉斯耸耸肩》完稿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十几家出版社上门接洽。兰登

书屋（Random House）的老板瑟夫（Bennett Cerf）在特里亚农饭店宴请兰德。他一听完兰德的介绍，立刻表示，这种哲学无疑违背了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伦理，“我认为，你这种政治哲学令人厌恶。但你如果交给我们出版；我们不会审查，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兰德为他的敏锐和高尚所动，当场拍板选定了他的公司。她后来对芭芭拉·布兰登说：“他们没有假装改变信仰，但他们明白此书的重要性。”瑟夫完全接受了兰德及其经纪人提出的条件：预付 5 万美元，作者版税 15%，首印 7.5 万到 10 万册，广告费 2.5 万美元。兰德志得意满，向粉丝们严肃地宣布：“我要挑战 2500 年来的传统。”格林斯潘相信，兰德为资本主义奠定了道德基础。他在联邦储备银行任内，仍然坚持这种想法。佩科夫指望兰德终将挽狂澜于既倒，重振 19 世纪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1957 年 3 月 20 日，兰德完稿。瑟夫劝她把冗长的演讲删掉，因为读者只喜欢看故事。从简·维克担任文学代理人的时代开始，这种建议已经提出过无数次了。兰德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答复：“你会删节《圣经》吗？”这句名言不胫而走，很快就变成了“兰德传奇”的王冠宝石。在兰登书屋的新书营销会上，有个推销员要求作者概括本书的精要。兰德脱口而出：“哲学是客观主义，认识论是理

性主义，伦理学是个人主义，政治学是资本主义。”全场掌声雷动。兰德欣慰地想到：这一回，读者应该不致误解她的思想了。然而，正因为如此，她将第一次面临来自右面的攻击。

1957年10月10日，《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首印10万册。威廉·巴克利的《国民评论》立刻发表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书评，严辞谴责她的无神论和尼采主义倾向：“她笔下那些戏剧性的商人实际上就是尼采式的超人，因此糜烂的左派就是尼采所谓的‘末人’[12]，而两种人都被扭曲得不成样子，即使挑剔的隐者（尼采）也会觉得恶心。”他嘲讽道，“老大姐在看着你。”兰德再也没有原谅巴克利。此后，她每次参加聚会都要问巴克利来不来。如果他来了，兰德就不来。巴克利似乎无意记仇，依旧给她寄明信片，打电话。兰德既不回信，也不接电话。他解释说：“我打击她的无神论思想，她到死都耿耿于怀；但钱伯斯的书评其实只是偶然而已。”他临终前两年，对记者赞扬兰德的人格：“她是个勇敢的人。”这时，兰德已经去世25年了。老友马伦多尔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拒绝认同书中明目张胆的无神论倾向。兰德现在就像一只撞在窗玻璃上的鸟儿，第一次面对她个人才能和意志无法逾越的无形障碍。

注释:

1.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1926— ），美国犹太人，曾任美联储主席，被媒体业界视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和“巫师”。

2. 康德解决休谟式认识论困境的办法是：提出独立于人类知觉的物自体概念（即存在于人的感觉和认识之外的客观实体）。人类的理性有限，不能认知物自体；但物自体作为先验的存在，是理性存在的前提和框架。不言而喻，这种先在框架不能通过理性或经验证明。从此，德国哲学渐渐走向先验路线。

3. 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1901—1961）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记者，后成为《时代》（*Time*）周刊的高级编辑。在此之前他是共产党间谍。《见证》（*Witness*）是他后来写的一部忏悔录，也是冷战早期历史的重要文件。1948年，钱伯斯在一系列国会听证会和审讯会上指控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希斯是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的顾问，起草联合国章程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秘书长，当时正担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希斯否认这些指控，后来被判伪证罪。

4. 罗素·柯克（Russell Kirk, 1918—1994），美国政治理论家，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之一，1953年所著《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艾略特》（*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保守思想的重要著作。

5. 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和第34任总统(1953—196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负责计划和执行监督1944年至1945年里进攻维希法国和纳粹德国的行动。1951年又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最高司令。

6. 艾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II, 1900—1965)，美国政治家，以其辩论技巧闻名，被誉为当时仅次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天才，曾两次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后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来没有当上总统，却被支持者称为"美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总统"。

7. 佛朗哥时期是指西班牙在1936年至1975年间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实行独裁统治的时期。

8. 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 1894—1993)，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后来又为《纽约时报》撰写经济方面的文章。1946年至1966年，他在《新闻周刊》开设固定专栏，撰写经济学普及文章，引导数百万读者了解经济学基础知识，传播自由经济理念，影响力极为深远。《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是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1946年一出版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至今已被翻译成8种文字，在全球销量早已突破百万。

9. 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的基本原则是主张没有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罗斯巴德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该主张综合了奥地利经济学派里的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和19世纪的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主权至高无上和互不侵犯的原

则，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主权概念上的个人主义哲学，并禁止使用强迫的力量和诈骗的行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认为只有从所有权基准、以及主权个体间自愿签订的无限制的契约权利所衍生的法律才是正当的。基于这个基础，无政府资本主义反对国家进行不正当性的垄断行为和对个体主权的侵犯，并支持反中央集权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之间也有些不同的哲学理论。罗斯巴德将他的哲学建立在自然法（Natural Law）上；而其他一些人；如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 1945—）则采取务实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方式：主张无政府主义应该被采用的理由在于其必然优于其他制度。

10. 巴斯夏圈（Circle Bastiat）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是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法国立法议会的议员。

11. 主观价值论（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是一种经济上的价值理论，认为产品和服务本身并没有经济的价值，而是由于个人对它们的需求才有价值存在。而这些价值是依据购买者肯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如货币）来计算的。由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和情况，因此，所谓“正确”的经济价值或价格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与主观价值论相反的是价值的固有理论，如劳动价值论。一些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18世纪及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都曾提起价值的主观理论，但这个理论要直到奥地利经济学派才被公式化。

12. “末人”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提出的概念，又称“最后之人”。他们除了眼前的感官刺激和物质需要以外，丧失了一切欲望和追求，不再能理解如何超越物质层次的精神境界。

第十六章

营造公共知识分子

人们对我说了很多话，有些是睿智的，有些是错误的，但只有一句话是神圣的，那就是：“我想要它！”

——《颂歌》，1938

兰德功成名就之日，就是她的思想停止发展之时。高尔特演讲奠定了兰德亚文化的“亚大纳西信经”[1]，《阿特拉斯耸耸肩》耗尽了她的文学创造力。此后，她的作品仅限于讲演稿、杂文和诠释性小册子。她的教主地位已经稳如磐石，布兰登是她的使徒。剩下的问题仅仅是传播“福音”和塑造形象。兰登书屋的老板瑟夫和编辑海顿（Hiram Haydn）首先感觉到，兰德越来越自信，开始摆出电影明星的派头。她的狗仔队一面吹捧领袖，一面互相吹捧，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兰德在这些人的包围和洗脑下，相信自己确实是哲学史上不世出的天才。《纽约邮报》[2]的记者问她：“你是不是当今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她说：“我当然是，除非有人能在我的哲学中挑出任何错误。”问题在于：只要她坚持把哲学放在小说里面，就不会有任何学院派乐意回应她。这样一来，她就更相信自己一贯正确了。何况，小说的销量比哲学大得多。米塞斯有生之年，只有一小撮学生追随他。兰德的小说却像《达·芬奇密码》[3]一样，能让读者觉得长了不少学问，又跟其他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最适合奠定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

塑造形象不仅取决于主角，同样有赖于经纪人团队。布兰登夫妇扮演了主要经纪人的角色，为她安排演讲和

采访。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每年都能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1958年，兰德在纽约大学女子学院和纽约城市学院学生团体举行讲座。题目是《信仰与暴力：现代世界的破坏者》（Faith and Force: Destroyers of the Modern World）。她再次将神秘主义和专制暴力（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放在一方，将理性与自由（兰德主义与资本主义）放在另一方。从思想市场的角度考虑，这种策略非常类似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绕开不友好的评论家——中间环节，、直接诉诸读者——听众，在基层培养支持者团体。布兰登的营销走对了路。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首先成立了兰德主义社团——零崇拜（Zero Worship）。兰德的辩论技巧是一流的，成功地促使许多学生反思原有的价值观。布兰登仿照学院课程，把客观主义整理成20个系列教程，包括“哲学是什么？”、“自由意志的意义和本质”之类。1958年1月，兰德开始授课。当年秋天，布兰登接受芭芭拉的建议，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报名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格林斯潘、佩科夫和布兰登夫妇也各自开设了自己的专题讲座。兰德团队变得很像一间民间大学。

在此期间，兰德赢得了对右派的最大胜利。巴斯夏圈的灵魂人物罗斯巴德写了一封请求和解的信件，赞扬

《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他的老师米塞斯虽然赞赏兰德对资本主义的忠诚，却从不佩服她的文学功力。随后，他率领巴斯夏圈的核心人物加入兰德的团体，其中包括乔治·雷斯曼和罗伯特·海森（Robert Hessen）。雷斯曼后来在派普丁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任经济学教授。海森后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任经济史教授。然而，这次短暂的和解却造成了更大的纠纷。一开始，双方对联合的解读就各不相同。罗斯巴德显然不打算弥合更基本的哲学分歧，更不会拜在布兰登门下。布兰登却认为，和解只是进一步营销的开始。罗斯巴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与布兰登和兰德邪教的决裂》（My Break with Branden and the Rand Cult）。他说，布兰登死缠滥打，要他妻子乔伊（Joey）放弃基督教、皈依无神论和客观主义。布兰登整理的兰德公开课确有一节叫“上帝”，专门用客观主义理论证明上帝不存在。这样一来，罗斯巴德在兰德圈内感觉越来越不自在。兰德团队在布兰登主持下，对待兰德就像希腊罗马异教徒对待祭司[4]（瑟夫和海顿也对他们的崇拜仪式颇为不满）。罗斯巴德、雷斯曼和几位同学搞了一场讽刺他们的即兴表演，得罪了布兰登。（罗斯巴德说：“归根结底，你们不该嘲弄上帝。”）

不久，布兰登就指控罗斯巴德的论文《科学的衣钵》（*The Mantle of Science*）剽窃兰德的高尔特演讲。争论不了了之，但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了。罗斯巴德在后半生不断将兰德亚文化比作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布兰登则一再诋毁罗斯巴德的智商。

罗斯巴德"破门"在兰德圈造成的后果非常类似托洛茨基反苏活动对斯大林的影响[5]。兰德的重点不是打击流亡在外的"叛徒"，而是对留下来的门徒加强管理。她提高了团体的准入门槛，扩大了等级差异。所有学员必须研读《阿特拉斯耸耸肩》，公开声明赞同约翰·高尔特的演讲。他们必须缴纳学费，而且以后不再获准自由提问。只有兰德本人和布兰登夫妇有权自称"客观主义者"，其他门徒只能自称"客观主义学员"。芭芭拉·布兰登辞去了圣马丁出版社（St. Martins Press）的编辑工作，全职为社团服务。她调侃地说："如果有人把兰德当成上帝，把纳撒尼尔当成耶稣；那我就是圣母玛利亚了。"任何人都能看出，兰德的脾气和架子越来越大，似乎有一种无形的规律驱使她模仿自己最憎恶的敌人——冷酷的独裁者。整个60年代，布兰登像基洛夫[6]侍奉斯大林一样，忠心耿耿地帮助兰德"统一思想"。照布兰登自己的说法，他向门徒灌输的兰德主义基本信纲包括：

一、兰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二、《阿特拉斯耸耸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杰作。

三、兰德是哲学天才，在涉及理性、道德或人类现实生活的所有问题上享有最高权威。

四、人们如何评价兰德及其作品，就足以反映他的品德。

五、客观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好恶理应跟兰德保持一致。

六、兰德是先知，纳撒尼尔·布兰登是她的“精神继承人”。

就兰德个人利益而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她的黄金时代。在布兰登的努力经营下，她的团队不断扩大。她的作品仍然畅销，收入和知名度不断上升。然而，整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气候不利于右派。兰德曾经嫌弃艾森豪威尔太软弱，对肯尼迪[7]当然更无法忍受。民主党政府大肆推进社会工程，增加赋税，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左翼文化圈扬眉吐气，将资本主义贬低为贪婪和仇恨的产物。麦卡锡参议员早已去世，右派群龙无首，

士气低落。兰德不断抱怨：为什么美国的有识之士、科学家和企业家没有公开站在她一边？恶意的批评家一再诋毁她的作品，贤哲都上哪儿去了？她心情恶劣，依靠咖啡、香烟和安非他命振作精神。她不再打扮自己，绝然地结束了与布兰登的身体接触。布兰登对此并非不感到欣慰。他觉得，有必要放下私人感情的负担，全身心投入方兴未艾的兰德主义大业。

在兰德主义团体看来，《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预言应验了。庸人掌握了舆论主导权，憎恶个人主义的美德。他们不能屈从，应该像高尔特一样直接诉诸公众。1959年2月，兰德的朋友说服电视主持人迈克·华莱士[8]为她举行第一次电视访谈。华莱士问道："兰德小姐，《新闻周刊》说您企图毁灭美国当代生活方式的一切基础，您同意吗？"兰德坦然回答："对，我要挑战众多习俗和制度的道德准则——利他主义。"如果兰德的门徒期望这次亮相能扭转媒体日益左倾的风气，那他们就只能失望了。华莱士的制片人阿尔·拉姆鲁斯（Al Ramrus）说："你很难想象她引来了多少敌意，大多数媒体像对待麻风病人和敌视基督者一样对待她。"

"安·兰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跟"麦卡锡"这个标签差不多。左派一见到这块红布，就会条件

反射地兴奋起来，发出“反动”、“法西斯”的叫骂。她的言论已经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她为崇拜者制定了标准教义以后，已经不可能修改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种事情就像公教会在尼西亚会议以后修改《使徒信经》一样不可思议[9]。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个人主义大祭司的神坛后面，俄罗斯犹太人阿丽萨仍然活着。她自己没有子女，宗族义务感却已经内化为本能。她寄到铁幕后面的包裹和礼物就像南北战争前的“地下铁道”一样[10]，不断引诱老家人前来投靠，正如她自己当年投靠芝加哥亲戚。50年代，她在加州农场接待逃出苏联的亲戚朋友。60年代，她在纽约接待堂姐维拉·古萨奇科的女儿丽塞特（Lisette Glarner）。70年代，她神秘而强大的长臂越过漫长的时空，找到了二战后失踪多年的妹妹诺拉，将她带到美国。这些任务的困难和神奇程度，不会比《辛德勒名单》[11]和《逃离德黑兰》[12]逊色多少。然而，兰德始终对自己家族讳莫如深，甚至她的崇拜者都很少了解她的背景。以色列已经建国，但兰德显然不愿意让美国社会想到她的出身。在塑造“极右分子”、“美国个人主义者”的形象工程中，兰德和她的左派敌人实现了荒谬的志同道合。

50年代末，美国右派的小圈子结构已经凝固。麦卡锡时代同仇敌忾的岁月一去不复返。这位参议员去世

后，兰德圈、奥地利学派、《国民评论》派的山头再也不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他们对麦卡锡的敬意始终不衰，构成了唯一不受时势影响的共同点。兰德自己已经高踞派系领袖的宝座，无法迁就任何人而不影响本团体内部的等级秩序。她只能为派系政治牺牲大部分老友。阿尔伯特·曼海姆接受不了布兰登的“自尊心理学”，跟兰德团体断绝了来往。1972年，他自杀身亡。兰德没有表示哀悼，她心中早就没有这位叛教者的影子。黑兹里特夫妇倒向巴克利一方，出版了《道德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攻击兰德背叛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原则。阿什比倒向教会，担任《信仰与自由》杂志（*Faith and Freedom*）的编辑，兰德跟他一刀两断。马修斯为《国民评论》撰稿，越来越接近新保守主义的阵营[13]。曾经无与伦比的马伦多尔迷恋致幻药，变成另一种（非宗教的）神秘主义者[14]。罗斯巴德说兰德是邪教教主，跟某某主义领袖一样邪恶。只有米塞斯跟她还有来往，邀请她参加80岁寿宴。不过，米塞斯是兰德的长辈。兰德只是敬他德高望重，毫无屈己从人的打算。她对奥派的晚辈嗤之以鼻，从来不跟“朝圣山学社”[15]来往。

注释:

1. 亚大纳西（Athanasius, 约 293—373）早期基督教护教士、神学家，曾任亚历山大主教，因为坚持正统派的三位一体观而几度遭到迫害。他的主张最终获胜，变成基督教会的标准理论。

2.《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创办于 1801 年，现属媒体大亨默多克（Murdoch）的新闻集团，其报道风格以煽情和八卦而闻名。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此报日发行量曾达 70 万份。

3.《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 1964—）的一部小说，2003 年由兰登书屋出版，并以 750 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记录，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小说集合了侦探，惊悚和阴谋论等多种风格，并激起了大众对某些宗教理论的普遍兴趣，包括：有关圣杯的传说、抹大拉的玛丽亚（Mary Magdalene）在基督教历史中的角色等通常被基督徒视为异端的理论。

4. 希腊罗马的多神教不严格区别诸神、半神、英雄和人，祭司经常可以分享半神所受的崇拜和人类享受的纵欲。

5. 斯大林放走了对手托洛茨基，却关起门来整肃没有走的部下。

6. 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 1886—1934）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斯大林的重要助手。他的死亡触发了大清洗。

7. 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肯尼迪政治家族的一员，被视为美国自由派的代表，是美国首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肯尼迪总统任期内的主要事件包括：试图废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猪湾入侵、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太空竞赛、越南战争的早期活动以及美国民权运动。

8. 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 1918—2012），美国记者、游戏节目主持人、演员以及媒体知名人士。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华莱士采访了众多新闻人物。他从1968年开始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谈节目《60分钟》（*60 Minutes*）的主持人，采访过多位政要。

9.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Magnus, 272—337）在尼西亚会议上界定了正统教义，是基督教发展史的一大分水岭。《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产生于尼西亚会议前，因此具有公认的正统性，以后的神学家不可能修改正统教义而不动摇自身的理论基础。

10. "地下铁道"是南北战争前美国北方的废奴组织，它不断将逃亡的黑奴秘密送到不承认奴隶制的加拿大或英国。

11.《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第66届（199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是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1946—）导演，真实的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1908—197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11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

12.《逃离德黑兰》（*Argo*）是2012年的一部的美国影片，改

编自 1979 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中的真实故事，夺得 2013 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片名“Argo”来源于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一个典故。1979 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刚刚取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伊朗人民团团包围，66 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长达 444 天。期间，一位精通伪装技巧的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Tony Mendez）策划了一个营救方案，成功地将困在加拿大驻伊朗使馆的 6 名美国外交官带离伊朗。在营救过程中，门德兹自己伪装成一个电影制片人，6 名外交官则谎称是和门德兹一起的剧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拍摄的电影叫“Argo”。

13.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现的政治思潮，其特点为：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

14. 这些神秘主义者崇拜自然界和前文明状态的和谐。

15. 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术团体，由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于 1947 年创立，是一个由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组成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提倡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倡导开放社会的价值。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和哈耶克都是该学会成员。

第十七章

文化战争

人的第一职责是对自己负责。文明是朝向一种个人社会的发展过程。野蛮人的整个生存状态都是公开的，受他所属部落的统治。文明就是一个逐步将个人解放出来的过程。人的唯一义务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反对奴性的社会。

——《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兰德一生的秋收时节。她不再创造，但往日的辛勤劳作不断给她带来新的收获。在公共空间内，她已经奠定了右派一方诸侯的地位。在自己的宗派内，她能行使东方神皇的绝对权力。布兰登夫妇虽有汗马功劳，在她面前的地位不会比阿里在穆罕默德面前的地位更高[1]。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在他们的社团内，只相当于轮值主持人。巴克利在他的作者群当中，更像一个招待贵客的俱乐部老板。这些人的作风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功成名就时的政治理论，不如说反映了他们自幼习惯的文化环境。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罗斯巴德和巴克利的同伴都是旗鼓相当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兰德圈的粉丝大部分是普通学生和外行群众，民科性质非常明显。结果，奥地利学派和新保守主义产生了类似英国上议院的贵族政治。兰德圈却产生了东方式宫廷政治，最终把“大维齐”[2]布兰登都牺牲了。论群众影响和宣传效果，兰德团体远远超过其他派系。罗斯巴德说兰德是邪教教主，至少暴露了一个事实：兰德学说能深入草根群众，他的理论却不能。他能写《安·兰德邪教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Ayn Rand Cult*, 1972），却没有人会写《罗斯巴德邪教的社会学》，因为没有群众的小团体根本够不上邪教的资格。

少壮种树，老大摘果。苹果不断落在兰德身边。1958年春,《阿特拉斯耸耸肩》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58年冬，兰登书屋出版了《我们活着的人》精装修订版。1960年，新美国图书馆（NAL）出版了《我们活着的人》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平装本。1961年，这家出版社又重版了《颂歌》。60年代以后，出版物进入指数增长期，兰德获益匪浅,《我们活着的人》销量达300万册。40年代《源泉》出版时，销量10万册就已经是奇迹了。兰德公开课越做越大，听众从美国各地甚至加拿大各地蜂拥而至。布兰登夫妇且喜且忧,最后还是决定不失时机，扩大开发。他们设计了“磁带转录代理服务”，将兰德讲课的录音带分送到费城、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甚至多伦多等地，给慕名求学的当地学员播音上课。他们通过广告招生业务，将兰德主义课程变成了成功的生意。兰德和布兰登都获得了接近脱口秀明星的知名度，这是罗斯巴德、巴克利等人望尘莫及的。当然，这也使学院派更有理由歧视兰德及其学说。

布兰登自豪地说，是他把兰德从遭到压制的小说家变成了广受欢迎的公共哲学家。兰德承认这个说法。文化精英对《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态度使她情绪低落，草根民众对兰德主义课程的热情使她恢复了自信。她看到，

即使最愚钝的学员都比以前“不知道理性了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草根民众没有受到精英阶级叛变的影响。人民,而且只有人民,仍然坚持《独立宣言》的理想。她说:“纳撒尼尔策划的讲座大受欢迎,使我明白我们可以为文化做什么。他从小本经营起步,迎着整个知识界的轻蔑与嘲讽逆风前进,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麦卡锡参议员去世后,右派群龙无首。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3]披着共和党的外衣,推行民主党的政策。越战的灾难造就了新的文化左派。麦卡锡击溃共产党以后,这是第一次有人不仅反对美国政府,而且反对美国的宪法体制。保守派仍然拥有沉默的大多数,但尼克松这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4]无法唤起他们的忠诚。“纯正右派”早就清楚,“狡猾的狄克”[5]加入麦卡锡运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同样的投机策略促使他言右行左,在社会工程方面比肯尼迪和约翰逊走得更远,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更蔑视宪法的神圣。左派没有多少群众基础,但暂时裹挟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右派在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以前,无法有效地运用自己的优势力量。兰德和布兰登首先填补了这个空缺的生态位,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胜过了那些理论功底更深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然而,美国草根右派的整合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新教性

格（新英格兰殖民者的传统）、本土性格（美国特殊主义的传统）、个人主义性格（美国的立国神话）。兰德主义的无神论和外国色彩过于浓厚，只能起到铺垫和辅助作用。只有戈德沃德参议员和里根这样的人才能继承“战斗性右派”的衣钵，完成第二次麦卡锡式绝地大反攻。

兰德恢复了自信，走遍全国各大高校，以进攻性姿态宣扬她的主义。她左右开弓，同时打击新政左派、文化左派（他们宁愿自称自由主义者）、基督教社区主义者和新保守派（也有人称他们为新自由主义者）。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工作完成后，共产党和亲苏左派已经毫无立足之地，即使越战也不能使他们枯木逢春。因此，兰德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在耶鲁大学，她各打五十大板：“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背叛生命……人类只要挪动脚步，据说无比强大的集体主义和习俗惯例就会作鸟兽散。”在普林斯顿大学，她自称“资本主义激进派”，直接挑战巴克利和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繁荣和进步源于上帝和宗教，而非源于自由市场。波士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和西点军校相继邀请她举行讲座，这些讲稿大都收入 1961 年出版的《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哲学》（*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当中。

各地大学生纷纷成立安·兰德俱乐部。著名作家戈尔·维达尔[6]身临其境，恼怒地说："他们聚在大学城的小吃店里，热忱地讨论兰德作品，犹如他们的前辈讨论凡勃伦[7]和马克思。"《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嘲笑说："兰德小姐堪称自由企业的圣女贞德，只是用美元代替了十字架。"迄当时为止，这种盛况仅仅出现于宗教信徒和左派的传道活动。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习惯于少数派地位，自新政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被左派抢走了,不知道该欢呼还是该谴责。古典自由主义者、纽约大学哲学和历史学教授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重申伊莎贝尔·帕特森当年的反对意见，嘲笑兰德哲学的民科性质。兰德怒不可遏，但她的宗师身分已经不适宜亲自出手反驳。布兰登这位忠实的门徒不辞劳苦，给兰德讲座的所有学员写信，敦促他们向《纽约时报书评》投书抗议。他亲自撰写长文，重申兰德当年对帕特森的反驳。《纽约时报书评》不肯免费刊登，他就花钱购买广告版面，全文刊出。我们很难想象，米塞斯、哈耶克或罗斯巴德能要求他们的学生做同样的事情。苏联人在发动工农群众"怒斥帝国主义诬蔑"之时，倒是经常这么做。这些现象很适合卡尔·曼海姆的文化社会学分析[8]。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兰德跟新政左派的分歧在于反对社会工程和计划经济，支持自由市场；跟文化左派的分歧在于反对女权和少数派特权，支持机会平等；跟基督教社区主义者的分歧在于反对神秘主义和利他主义，支持无神论和理性个人主义；跟新保守派的分歧在于反对征兵，支持堕胎。在至关紧要的征兵问题上，奥地利学派分裂了。米塞斯支持新保守主义的征兵（实际上就是支持越南战争）立场，罗斯巴德支持兰德的生命权（实际上就是反对征兵和越南战争）立场。兰德的致命伤在于：她既要激烈反对绥靖主义，又要维护生命权。罗斯巴德却没有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将无政府主义和绥靖主义视为一个整体。

1962年1月，布兰登建议兰德办一份政论期刊。她同意了。这就是《客观主义者时讯》（*Objectivist Newsletter*），后来改名为文摘版《客观主义者》（*The Objectivist*）。兰德和布兰登约定分摊责任，每人每期至少写一篇严肃文章。兰德原先不喜欢写时论，觉得"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更过瘾。《阿特拉斯耸耸肩》似乎耗尽她的文学想象力，她发现自己很难写出新小说了。她只需要善加利用小说积累起来的声誉，发挥杂文家的敏锐和清晰，就能适应时评家的新角色，向为数更多的读者宣传兰德哲学。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给她提供了充

分的靶子。兰德评论的深刻和犀利远远超出了普通时论家，因为她能从一切现象深入到政治原则的起点。《紧急状态伦理》(Ethics of Emergencies)、《人的权利》(Man's Rights)、《政府的性质》(Nature of Government)、《战争的根源》(Roots of War)重申个人权利的根本性和绝对性、有限政府的正当性、资本主义的美德和计划经济的邪恶。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新奇，但在这个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宣传绝对个人主义的基要真理，无异于小加图在凯撒的时代宣传古罗马的美德[9]。兰德来自苏联，自然深悉政治辞令的欺骗性。在她眼里，美国政客的宣传不过是小儿科。她警告公众，不要为权宜之计牺牲基本原则，任何限制自由的临时措施都可能导向永久性奴役的单行道。无论在古罗马还是当代,这些洞见都不会过时。今天的罗恩·保罗[10]一定熟读了兰德的政论文，因为他质疑《美国爱国者法案》[11]的逻辑几乎全盘袭用兰德的《紧急状态伦理》。

《客观主义者》几乎就是兰德圈的同仁杂志，极少发表外人的作品。布兰登发表的文章多半是他的“自尊心理学”理论，后来收入他的几部畅销书。“自尊心理学”可以概括为兰德哲学在心理学领域对弗洛伊德[12]的反攻，把自尊的丧失（代替性的压抑）视为心理问题的根源，

把重建个人责任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艾伦·格林斯潘、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佩科夫、海森和雷斯曼（George Reisman）都为《客观主义者》撰稿。我们从格林斯潘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对金本位的执着跟兰德哲学有关。他在美联储任内的宽松政策却似乎讽刺性地应验了兰德的预言：经济管理者不会维护财政保守主义和货币稳定性，这是他们的利益而非观念造成的。马丁·安德森后来在里根时代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以另一种方式（增加债务）背叛了财政保守主义。他们向政治现实做出的妥协都超过了兰德愿意支持的程度，但仍然堪称促使美国右转的重要人物。兰德自认为（在原则上）失败的地方，往往就是后人认为她（在事实上）成功的地方。

1964年，参议员巴里·戈德沃德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3]，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洛克菲勒出身富家，是共和党自由派的希望（大体而言，“进步的”自由派是富人，“反动的”保守派是草根），他如果赢得提名，共和党就跟民主党没有什么区别了。戈德沃德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天敌。他发明了“折扣商店新政”[14]一词，嘲笑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不过是民主党的模仿者。1964年预选，他喊出的口号是：“保卫自由的极端措施并非罪恶。”1964年大选，

他的竞选口号是："你从内心深处知道他是对的。"在兰德和青年罗纳德·里根眼中，戈德沃德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纯正右派"。《客观主义者时讯》赞扬参议员敢于唾弃不光彩的机会主义："以前的竞选中，共和党的罪责在于妥协、回避、懦弱、亦步亦趋。巴里·戈德沃德不是这样，他勇敢、坦诚、正直。"兰德把拒绝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全都送给了戈德沃德，甚至不介意他反对无神论。她未经邀请就主动为参议员写了一篇演讲稿，没有忘记体贴地加入信仰上帝的表白。然而，戈德沃德的竞选团队没有接受她的善意。这种单相思的关系颇能体现主流与非主流的地位落差。

约翰逊和"伟大社会"胜利了[15]，左倾的程度超过了当年的新政。1968年，见风使舵的尼克松政府延续了肯尼迪－约翰逊的内政，引进了欧洲式的马基雅维利外交。与此同时，兰德和布兰登合作的《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却大受欢迎。60年代似乎颠倒了美国政治的常规，左派在朝、右派在野。兰德也颠倒了文化斗争的常规，创造了激进主义右派这样似乎自相矛盾的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从观念和立场角度上讲，她是右派或理性主义者；从气质和行为角度讲，她是革命者或宗教改革者。

注释：

1. 阿里是穆罕默德的近亲和爱将，阿拉伯骑士文化的代表人物；但穆罕默德明确表示自己是最后的先知，没有人能继承他的地位。

2. 维齐（Vizire）是伊斯兰教帝国的高级行政官。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随时可能成为替罪羊或被抄家以充实国库，因此不同于西方君主国的大臣。

3.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第36任美国副总统（1953—1961）与第37任美国总统（1969—1974），1972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尼克松是美国史上唯一当过两届总统与两届副总统的人，但也是唯一在位期间被弹劾的总统。

4.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是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西文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理论是“政治无道德”的政治权术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一系列对于获取和掌握政府权力的建议。许多世纪以来，人们把那些为达到自己目的，缺乏对常规道德的关心而不惜在人际关系中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审视和摆布别人的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5. “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外号，暗示他聪明能干但缺乏原则。

6.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 1925—2012），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出身于显赫的政治家庭，是美国政治的犀利评论者。

7. 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著有《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8.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著名社会学家，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他强调文化–政治角色的结构性因素。

9. 小加图（Cato Minor, 95 B.C.—46 B.C.）在罗马共和国末年以身作则，宣扬共和国早期的淳朴美德，抗拒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 100 B.C.—44 B.C.）利用军队和群众僭取政权的企图，最后以身殉道。他的名字变成了“高尚但不识时务”的代名词。

10. 罗恩·保罗曾在国会公开指责《美国爱国者法案》是布什总统的社会主义政策。

11.《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是 2001 年由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 1946—）签署颁布的国会法案，正式的名称为“使用适当之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of 2001）。此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的目的，扩张了美国警察机关的权限。根据法案的内容，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外国情报单位的限制；扩张美国财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管理金融方面的流通活动，特别是针对与外国人士或政治体有关的金融活动；并加强警察和移民管理单位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这个法案也延伸了恐怖主义（Terrorism）的定义，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了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

1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

13. 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美国副总统，是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成员，也是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之一。

14. “折扣商店新政”（The Dime Store New Deal），意为表面上的确提供了一堆公共服务，但是都打了折扣出售的。

15. 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1973）继承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大幅度提高税收和福利开支。他称之为“伟大社会”计划，宣称要以此消灭贫穷。

第十八章

门派与宫廷

对罪人的怜悯就是对无辜者的背叛。

——《浪漫宣言》，1969

兰德与科班哲学家的唯一一次友谊充分体现了她的革命气质。1960年春，兰德在布鲁克林学院举行《信仰与暴力：现代世界的破坏者》（Faith and Force：Destroyers of the Modern World）讲座。哲学教授约翰·哈斯普斯（John Hospers）大为震撼，邀请兰德共进午餐。此后，他经常去兰德家做客，还把自己的著作《人类行为》（*Human Conduct*）送给她。哈斯普斯后来说："她几乎从来不读哲学。"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思想完全是自发生长、成熟的，要不就是神明完完整整地塞进她脑袋里的。"哈斯普斯跟所有书呆子哲学家一样，不喜欢兰德的理性概念。他更不喜欢兰德团体的个人崇拜文化，说她把年轻人变成了唯唯诺诺的绵羊。"孩子们吓得瑟瑟发抖，害怕说错话惹她生气。"兰德回敬说：她本来指望达成"智力共识"，结果只得到"智力分歧"。

哈斯普斯拒绝加入批判悉尼·胡克的行列，严重考验了兰德的耐心。哈斯普斯注意到，兰德对哲学问题的态度与其他激进主义者类似，认为这是一种争夺领地的军事行动。她奉行勃列日涅夫[1]后来的名言："我们得到的东西，绝不会让出去。"因此，门徒的异议跟背叛没有区别。他说："任何人只要流露出走回头路的迹象，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哈斯普斯自己暂时享有更大的宽容，

因为他的身分不是门徒，而是“统战对象”或“同路人”，提供了兰德主义跻身学院派的桥梁。兰德一再抱怨专业哲学家对她的歧视，哈斯普斯就在哈佛大学为她安排了一次学术会议。兰德率领大批门徒光临，她的演讲《作为生命意识的艺术》（Art as Sense of Life）更多地体现了叔本华的心理学洞见[2]。哈斯普斯用调侃的语气批评她，兰德军团集体退场抗议。女王或许并非不容质疑，但绝不能在她的臣仆面前丢脸。后来，哈斯普斯的朋友安慰他说：“算了吧，约翰。你是学者，她是革命家。”

兰德的芝加哥亲戚芬·布朗（Fern Brown）第一个称她为“加冕的女王”，咪咪则称布兰登为“奴隶——反正是她喜欢的那种人”。兰登书屋的老朋友瑟夫怪罪兰德的粉丝，觉得他们无原则的阿谀奉承害了她。然而，问题更有可能源于兰德自己的矛盾心理。她对学术界的看法类似苏联对美国的看法：既有非正统的自卑，又有创新者的自傲。她在《自私的德性》中创造了一个学术平行世界，以约翰·高尔特演讲为主要引注来源。只要兰德团体绵延不绝，不断追加注疏，《阿特拉斯耸耸肩》就不难逐渐积累起类似《尚书》在儒学传统中享有的权威性。然而，兰德主义道统却在第一代继承人身上破裂了。三角恋已经摧毁了无数王室，也没有放过兰德和布兰登。

1963年，布兰登觉得自己爱上了23岁的时装模特帕特丽西亚·格里森（Patricia Gullison）。格里森和她丈夫拉里·斯科特（Larry Scott）都是兰德公共课的资深学员。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找到团体首席心理学家布兰登。帕特丽西亚在诊疗室表现出"非哲学式"的狂热崇拜，使布兰登有"身在宫殿"的快感。他跟兰德在一起时，总是自居帕特丽西亚的位置，给兰德提供女王式的快感。自然，他非常享受这种新鲜的感觉，没有把持住自己。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布兰登在床上告诫宝贵的崇拜者，万万不可在兰德面前露出马脚。他说："我不能坐视这一切化为乌有。我不想这么做，我喜欢这些。"帕特丽西亚天真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对安实话实说？她那么理性，那么现实。"布兰登苦笑道："那你就会领教无法想象的大地震了。"显然，这时的帕特丽西亚还处在成长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知识分子告诉她：政治家一般不会实践他们宣扬的理论。在第二阶段，她必须自己发现：知识分子一般也不会实践他们宣扬的理论。在第三阶段，她从周围的世界体会到：她自己一般也不会实践自己相信的理论。不过，等到最后这个阶段，基于崇拜的爱情就死了。

帕特丽西亚顺从情人的指教，瞒过了丈夫和芭芭拉·布兰登（Barbara Branden）。布兰登自己负责欺骗兰德，称

帕特丽西亚为凡夫俗子。他承认:“我钻研请假借口，卓有成效。”1964 年初，芭芭拉爱上了兰德公开课的同事。她没有对布兰登保密，布兰登也勉强同意了。三年后，他向芭芭拉坦白了这段私情，要求妻子帮他瞒住兰德。芭芭拉也勉强同意了。如果布兰登真是他自以为那么了不起的阴谋家，大概就不会制造这样三角套三角、欺骗套欺骗的复杂局势了。只有简单的骗局才能维持长久。布兰登骗过了兰德，却没有骗过兰德公开课的职工和学生。他们多次碰见布兰登和帕特丽西亚一起参加舞会，驾车兜风。谣言四起，芭芭拉忍受不了。两人低调分居。消息传到兰德耳中，她乘机建议布兰登恢复原先的情人关系。布兰登不敢说实话，拿精神不好当借口。兰德怀疑他嫌自己上了年纪，布兰登矢口否认。尤其可怕的是：兰德也认识帕特丽西亚，而且相当喜欢她；因为她长得很像《源泉》女主角多米尼克（Dominique Francon）。显然，最后露底摊牌只是个时间问题。

1965 年 12 月，帕特丽西亚跟拉里·斯科特离婚。几周后，布兰登夫妇离婚。1966 年底，布兰登公开跟帕特丽西亚同居。一切缓冲余地消失殆尽。各地兰德主义者窃窃私语，等待“女王和王储”图穷匕首见。兰德主义门派变成了东方的宫廷，空气中充满阴谋的气息。各方

要角不由自主地陷入文艺复兴式的多重背叛中。兰德和布兰登秘密谈判，要求他根据客观主义价值观调整行为。布兰登跟芭芭拉秘密谈判，要求她在兰德面前斡旋和拖延。布兰登要求兰德允许他保持秘密的私情，同时维持“女王和王储”的工作关系和柏拉图式感情。芭芭拉要求布兰登利用她争取的缓冲时间，跟帕特丽西亚友好分手。弗兰克·奥康纳像逊位已久的太上皇一样，既愤怒又无助。他对芭芭拉说，他想离开兰德和这个家，却又无处可去。照左拉[3]的说法，婚姻总会让一方的灵魂吃掉另一方。兰德已经把他吃光了；离开兰德，他就只剩下空壳。

1968年7月3日，布兰登给兰德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用华丽的措辞表示感激和歉意，但决绝地宣布原有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希望这段感情不会影响两人的友谊。当天晚餐时，他把这封信交给兰德。“无法想象的大地震”立刻爆发了。兰德稍稍浏览前几页，立刻尖叫起来：“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垃圾！骗子！猪猡！”她当即给芭芭拉打电话：“你瞧瞧，这个魔鬼都干了什么！”芭芭拉进门时，兰德仍在詈骂，气得浑身发抖。她指控布兰登一直都在欺骗她、剽窃她的思想，发誓跟他一刀两断。这时，她还不知道，布兰登和芭芭拉早有默契，芭芭拉比她先看到信。布兰登最害怕丧失兰德社

团内的地位，这是他隐瞒真相的主要原因。兰德似乎看透了他，当晚就下达苛刻的最后通牒。布兰登必须跟“矫揉造作、自以为是”的帕特丽西亚断绝一切往来；除了备课、写书、撰稿以外，什么都不能做；除了生活费以外，不得多挣外快。否则，他就永远别想回来。

布兰登递交坦白信的时候，所抱的希望肯定不是这样。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精神上勇敢、肉体上软弱，甚至习惯用前者掩饰后者，欺骗自己。帕特丽西亚已经为他离了婚，不再有退路。他的前提是分手，只希望分手后不要反目成仇。然而，他没有勇气抵抗面对面的威胁，把原来的计划抛到九霄云外，立刻接受了兰德的所有条件。兰德吞噬性的个性是驰名遐迩的，身边容不下平起平坐的人。个性强的人最后总会变成敌人，软弱的人免不了做门徒。布兰登跟芭芭拉玩了几年“太监哄骗皇帝”的小动作，摊牌都要写信，自己说不出口，已经充分说明了他是哪一类人。他如果熟悉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善于总结政治经验，就会明白，认罪求饶是最坏的策略。洗心革面必然导致切香肠式的步步紧逼，每一次交待都会引出更多必须交待的隐私。罪人越是深挖思想根源，领导就越会相信此人确实罪大恶极。立刻逃跑的人获得最好的结局，顽抗到底的人至少死得比较痛快。如果你

抱有以认罪换宽恕，将来重获大用的幻想，你的死亡就会最漫长、最痛苦、最可耻。不用说，布兰登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或者更正确地说，他软弱的个性使他没法走别的路，即使他出众的智力早已预料到后果。希腊公民和欧洲绅士都认为勇敢和美德是一回事，懦弱和邪恶是一回事，原因就在这里。布兰登最大的幸运就是长辈很有远见地让他生在美国，因此兰德或任何人至多能把他赶出大门。兰德虽然不大走运地生在俄罗斯，长在苏联，但以她主动挑衅，果断出走，筚路蓝缕，创业垂统的行径判断：她即便每次都运气很糟，也会死得痛快。

8 月 23 日，受到冒犯的女王、受到欺骗的情人作出最后的裁决。她在门厅接见布兰登和芭芭拉，公开宣布他的罪状，打他的耳光，诅咒他阳痿二十年，把他赶出门去。兰德从《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扉页上删去了献给布兰登的题词，从遗嘱中删去了布兰登的名字。然而，没有人能接替“精神继承人”（intellectual heir）和兰德主义社团“维齐”的重任。女王默然接受了绝嗣的命运。从布兰登破门那天起，她就不再写日记。8 月 28 日，布兰登正式退出社团和《客观主义者》杂志。9 月 2 日，兰德公开课关门大吉。兰德主义是兰德创造的，兰德主义运动却是布兰登经营的。没有布兰登，兰德主义运动就不

会如此兴旺。兰德在10月号的《客观主义者》上发表了她的绝交书：

> 谨此通知我的读者和所有对客观主义感兴趣的人们，纳撒尼尔·布兰登和芭芭拉·布兰登不再和这份杂志、我本人或我的哲学有任何牵连。
>
> 在私人交往、职业来往和业务联系方面，我已和他们永远断交，并收回他们将我的名字用于其商业、职业、智力或其他活动的权利。
>
> 我特此声明不再支持他们本人及其未来的工作和活动。我彻底并永远拒绝他们俩成为我本人或客观主义的发言人。

最后，她还责备布兰登为个人问题占用她的时间，借用她的名气为自己服务，从事可疑的财务活动。最后这一点肯定是没有依据的。布兰登确实欠了2.5万美元，但是没有任何不法之处，而且都已还清，更没有损害兰德的利益。布兰登和芭芭拉在公开信《答安·兰德书》（In Answer to Ayn Hand）中反驳了这项指控，然后各自离开纽约。布兰登和帕特丽西亚正式结婚，迁往洛杉矶。格林斯潘和佩科夫追随兰德，跟布兰登绝交。

注释：

1.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 1906—1982）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先为第一书记，后为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

2. 叔本华认为艺术的崇高之美本质上是生命意识面对自己脆弱无常的颤栗。

3. 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19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亦是法国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角色。

第十九章

王者的孤独

一个人回首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渴望某种未知的辉煌，渴望意外的刺激，渴望出类拔萃，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而衰老的过程就是梦想和渴望逐渐逝去的过程。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生活中太多的失望扑灭了人们心中热情的火焰。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序言

（Introduction to Hugo's *Ninety-Three*），1962

大清洗后，兰德社团事实上已经瓦解。兰德身边只剩下六七个老朋友和一批没有什么重要性的粉丝。奥康纳患上了心脏病和脑部血管硬化，说话越来越困难。兰德自己也上了年纪，创作力衰退。营销从来不是她擅长的事情，随着布兰登的叛变而烟消云散。威廉·巴克利和罗素·柯克却渐入佳境，不断写出新的力作。新保守主义在右派的主流地位日益巩固。罗斯巴德的自由意志派仍然承认兰德的开创之功，推出哈斯普斯参加1972年总统选举，但她跟他们的私人关系已经完全破裂。兰德指责这些人剽窃了她的思想，却没有全面理解她的哲学理论；但她无意力挽狂澜，而是日益退入私人的世界。在这个小圈子内，她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女王。佩科夫和其他门徒绞尽脑汁争夺她的宠爱。妹妹诺拉过不惯美国的生活，最后返回苏联。兰德失望地发现，苏联已经把年轻时热爱西方的妹妹磨平了。诺拉留恋稳定的退休金，不再认同美国；甚至看不上姐姐的著作，说她也是靠“家族的集体主义”才混到美国的（这一点倒是事实）。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诺拉最后还是失去了她的退休金。她活到苏联解体以后，1999年在恢复原名的圣彼得堡去世。这样的结局大概不出兰德所料。

佩科夫是兰德晚年的最大安慰。他对宗师深信不疑，

经常对别人说，兰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把兰德比作大都会歌剧院，把学校的课程比作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我98%的思想来自兰德，14年学院生涯只提供了2%的资料。”兰德飞扬跋扈的脾气丝毫未改，对佩科夫也不留情。佩科夫仍然安之若素，他说：“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把我的脸踩在脚下。”他到处辟谣，否认布兰登曾经是兰德的情人。他警告门徒，不得在兰德和布兰登之间脚踩两条船，任何人敢于购买布兰登的《自尊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lf -Esteem*），就会丧失继续订阅《客观主义者》的资格。据说，他制定的黑名单包括数百人。佩科夫的新书《不祥的相似处：美国自由的终结》（*The Ominous Parallels: 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发挥兰德《法西斯新边疆》（*Fascist New Frontier*）的观念，从美国战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背后发掘出社会主义的根源，从社会主义背后发掘出国家主义的根源，从国家主义的胜利预见到法西斯胜利的前景。当时的见证人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Smith）说：“佩科夫力图证明自己的虔诚。我们一再听说他写完一章就找安·兰德审阅，然后回头重写。”兰德为本书作序，这是布兰登渴望而没有得到的殊荣。她赞扬本书是“除我以外的第一部客观主义哲学家著作……亲眼见证如此伟大而重要的新观念，不胜欣慰”。

然而，她仍然没有把原属布兰登的“精神继承人”头衔转交给佩科夫。对女王而言，臣仆比继承人更安全。她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一误不可再误。

在其他人眼中，佩科夫已经中了“兰德邪教”的蛊药。他不顾学校的反对，在自己的课堂上宣讲兰德主义，结果丢了亨特大学、纽约大学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教职。1987年，佩科夫搬到加利福尼亚。他三次申请教职，都因为观点的缘故而失败。兰德的敌人、佩科夫的导师悉尼·胡克不无恶意地说：如果佩科夫不能保证不推销兰德的教义，他就没法帮他推荐教职。他还说：佩科夫只会把学生当做传教的潜在对象，无助于他们培养独立人格。由此看来，兰德一向鄙薄学院派的门户之见和鼠肚鸡肠，并非毫无依据。悉尼·胡克正确地指出，兰德的哲学功底很差，重犯了一系列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澄清的错误。但他同样指出过黑格尔主义者[1]和法兰克福学派[2]更多的错误，似乎并未妨碍这些人的著作高踞参考书的神圣殿堂。歧视内在于世界秩序之中，学术界并非例外。如果你是科班或正统，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职业风险；如果你是外人或异端，错误就是不可饶恕的民科和邪教。

兰德本人已经不再为这些小心眼的书呆子操心。她积累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任何学院派人士。许多门徒和

读者身居要职，更提高了隐遁女王的威望。其中，格林斯潘地位最为显赫。他加入了福特总统[3]的经济委员会，公开承认兰德的影响。据说，加尔布雷斯[4]开玩笑说，只有布尔什维克或兰德主义者才能治愈当前的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应声答道："至少我就是。"后来，格林斯潘在回忆录《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表示，多亏了兰德，他才从经验和统计的世界返回人间。"他们的价值观、工作方法、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远远超过了我学到的经济模型，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1974 年，《客观主义者》的后续刊物《安·兰德通信》（*The Ayn Rand Letter*）停刊。自此，兰德的毕生事业基本结束。经过了颠沛流离的斗争，她开始享受"国老"的清福。艾伦·格林斯潘邀请她出席阿波罗 11 号飞船（Apollo 11）的发射典礼。《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书迷荷尔曼·艾维上校（Col. Herman Ivey）邀请她给西点军校的毕业班学院讲话。

兰德对登月飞船的喜爱不亚于她对原子弹的喜爱："从本质上讲，我们所见所闻集中而抽象地体现了人类的伟大。"美国科学家和宇航员雄辩地证明了自由乃创新之父，以事实驳斥了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谬论。"有人说，与其大搞航天项目，不如致力于消除贫困。这些人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把造就宇航员品格的前提和价值，用

来给智障者教一辈子拼音字母，端一辈子尿壶；他们就满意了吗？”她对艾维上校表示，西点军官和学员自愿参军的勇气体现了美国的优秀传统，集才干、荣誉和克己于一身。她告诫学员，要勇于运用自觉的理性，抛弃混乱和谬误的思想，特别要警惕康德－黑格尔一系的哲学（德国先验论和思辨哲学的传统）。后者是培育集体主义的温床。“荣誉是自尊在行动中的体现……热忱坚定、奉献精神和荣誉感是美国建国的典型特征。”这些宝贵的价值都要依靠西点人维护。

这时，反战运动已经大获全胜。尼克松身败名裂，美国撤出了越南。罗斯巴德和哈斯普斯的自由党借助兰德的“自由意志主义”名号和“生命权”理论，跟左派结成了极不自然的联盟。他们不仅反对战争和常备军，甚至坚持连民兵都不符合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原则。从政治上讲，自由党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是最有可能拥戴她的势力；但她毫无假借之意，坚定不移地逆水行舟，反对一切绥靖主义。兰德只反对强制征兵，因为这会侵犯基本权利。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始终是她理想中的军队。因此，她支持尼克松以志愿兵取代义务兵的计划。在这个时间点上，赞美西点军校的“抢劫犯”（罗斯巴德的说法）和“杀人犯”（左派的说法）需要极大的勇气。兰德从来不

缺乏勇气，正如她从来不识时务。她唯一一次“符合潮流”是在麦卡锡时期，完全是出于原则的考虑。尼克松等人搭乘反共班车，从此飞黄腾达。兰德一无所求，仍然心安理得。她的性格更像小加图[5]或查理一世[6]，只为骄傲，不为利益，不屑于歪曲自己的理论迁就现实政治，宁愿做反潮流的殉道者也不愿意做投机的成功者。我们不难理解：佩科夫为什么对兰德五体投地，甘愿牺牲自己，却不把老朋友罗斯巴德放在眼里。

兰德返回纽约之前，艾维上校请求她允许西点军校新版哲学课本用她的讲演做序言。兰德主义步入正规教科书的美梦似乎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实现了。然而，她未能久享这样的晚福。她刚刚回到纽约，就感到呼吸困难。德沃雷茨基（Murray Dworetzky）医生在她的胸部X光片上发现了肿瘤，她不得不切除半边肺叶。直到这时，她才同意戒烟。即使如此，她在医院里仍然我行我素，不听医生的劝告。手术是成功的，但她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此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东方君主一到多病的晚年，就会越来越猜忌、多疑，不断诛杀近臣，更换继承人，日益陷入孤独的自我世界中。兰德的表现正是这样。她一个接一个地“开除”老朋友，包括在布兰登风波中支持自己的艾伦和琼·布卢门撒尔夫妇（Allan and Joan）。

另一位遭到清洗的“近臣”凯·史密斯(Kay Smith)说：“一个错误就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她变成了一个残酷的女人，或许她本来就是一个残酷的女人。”最后，只有佩科夫留在她身边,分享她的猜忌和焦虑。他有个熟人说：“伦纳德完蛋了。他变成了一个言听计从的机器人。”这样一来，佩科夫就成了她唯一的继承人。

弗兰克·奥康纳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他出不了门，认不出熟人的面孔。兰德强迫他接受自己发明的“认知疗法”，强迫他吃饭。朋友和亲戚都觉得她待丈夫太残酷，但她大概确实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她虽然欺骗和背叛弗兰克，仍然觉得丈夫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奥康纳弥留的最后几天内，兰德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暗自垂泪。1979年11月7日，弗兰克·奥康纳去世。兰德买了两块相邻的墓地，一块给丈夫，另一块留给自己。她对佩科夫的一个朋友说：“我也不会痛苦多久了。”然而，她低估了自己的生命力。在最后的三年里，她还要再一次为自己的理论牺牲自己的盟友。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对于失意已久的“纯正右派”而言，这次胜利无异于诺曼底登陆[7]。戈德沃德把里根当作自己的分身，他没有失望。里根不是又一个随波逐流的艾森豪威尔，而是扭转风气的“右派版富兰克

林·罗斯福”。然而，兰德并不打算放过弹冠相庆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她坚持对上帝发动最后的进攻。1981 年 4 月，兰德在福特论坛（Ford Hall Forum）举行讲座。她的讲演题目是《平庸的时代》(Age of Mediocrity)，目标直指新保守派的宗教虔诚、社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她犹如 19 世纪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落日余晖，仍然天真而虔诚地相信：扫除神秘主义的污染，理性的光辉就会烛照大地。1981 年 11 月 18 日，兰德最后一次在公共场所露面，参加“全国货币改革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onetary Reform）财经会议。她的讲演题目是《受害者的制裁》(Sanction of the Victims)，意思是创造者经常为了慈善的目的，无意中帮助了敌人和破坏者。她引用高尔特的演讲结束自己的论断：“你要捍卫自己的人格，捍卫自尊的美德，捍卫人的本质：至高无上的理性头脑。你应该无比坚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为地球曾经存在的一切成就、价值、伟大、善良和幸福而斗争。谢谢。”全场欢声雷动。

回家的路上，兰德突感不适。次年 2 月，她住进了医院。不久，她决定回到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1982 年 3 月 6 日，兰德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佩科夫守候到最后关头，直到她长眠在自己预先选定的墓穴中。全世

界媒体像对待伟人一样，报道她去世的消息。不过即使在这时，左派自由主义者的喉舌《纽约时报》和右派保守主义者的阵地《国民评论》仍然没有忘记她给予的伤害。

注释：

1. 英国的弗朗西斯·赫伯特·布莱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和美国的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试图将黑格尔的思辨传统（Hegelianism）引入英美经验主义的传统。美国黑格尔主义者又称圣路易斯学派，试图建立休谟－康德－黑格尔的道统。他们翻译和引进了许多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但无法解决经验和先验的矛盾，在美国哲学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2.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弗洛姆（Erich Fromm）、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第二代人物包括的柏格（Peter Burg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

3.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Gerald Rudolph Ford Jr., 1913—2006)，美国第37位、第38任总统（1974—1977）。

4.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5.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乌地森西斯（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 or Cato Minor, 95 B.C.—46 B.C.），罗马共和末年的政治家，以坚守原则、道德高尚著称。他维护没落的共和国，抗拒凯撒（Caesar）的得胜之师，事败后自杀身亡，成为后世（包括法兰西共和派和华盛顿将军）的楷模。

6.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1625 年加冕，1649 年被处死（他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期间卷入了与国会的权力斗争。他介入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的活动，未经国会同意而收税，助长新教势力，迎娶罗马天主教的公主，重用当时具有争议的教会人物并迫使苏格兰进行宗教改革，从而引发主教战争。他与国会对抗，引发两次英国内战，最后被击败并以叛国罪处死。

7.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接近 300 万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诺曼底，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第二十章

安·兰德之后的兰德主义运动

因为人们不敢直视前方，所以他们给自己制造了问题。而你需要做的是，往前看，找到路，当你看到路的时候，就别坐在那看了——开始往前走吧。

——《我们活着的人》

（*We the Living*），1936

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兰德的去世非但不是兰德主义运动的结束，反而是这一运动的解放。她晚年日益沉溺于私人的世界，对自己的徒子徒孙失去了兴趣。她跟兰德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其他大师的个人恩怨严重妨碍了自己思想后裔的发展，非常类似于弗洛伊德与荣格、阿德勒的类似纠纷[1]。只有在个性坚强、强求一致的大宗师去世后，各派小宗师才得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宗师如果在世，就会把这些发展斥为异端，运用自己的威望纠正错误。罗马的强大始于元老对罗慕路斯的谋杀，有赖于元老院和民会的党争[2]。人生的荒谬就在于：自己往往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敌人往往是自己最大的功臣。

20世纪70年代以后，布兰登一直在酝酿自己的“修正主义”学说。他实践“自尊心理学”越久，就越相信清晰的思考源于清晰的感知。兰德在她晚年最固执的时候，像神谕一样宣布“感知不是认知的工具”。布兰登的修正实际上意味着绝对理性主义向英美哲学传统妥协，如果不是回归的话。布兰登的哲学功底比兰德更科班，营销手段更专业，但他缺少先知的气质、意志、超凡魅力和独断性格。先知型人物开宗立派,科班型人物搞修正主义。这种模式在历史上一再出现，似乎切合人性的某种普遍

性规律。2010年，布兰登出版了批注本《安·兰德的洞见：客观主义基本原理》（*The Vision of Ayn R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bjectivism*）。正文是兰德的教导，批注是他自己的修正意见。从经传到注疏，兰德主义完成了“传统的创造”。

芭芭拉·布兰登从另一个方向修正兰德主义。她跟大多数女性一样，不大在意哲学或认识论的问题，更关心道德和社会关系。兰德的决绝态度很容易让不求甚解的读者（也就是大多数读者）认为，她在鼓吹一种毫无同情心的冷酷社会，本能地避而远之。性情高傲的人会从中体会到“冲决罗网”的快感，性情温和的人却受不了孤独和误解。后一种人占了人类的大多数，对他们而言，亲社会性比思想的正确与否更重要。芭芭拉理解这种人，她力图证明：兰德的个人主义并不排斥人类对善意和关爱的追求（这一点不需要修正兰德本人的意见），也不否认人类天然的局限性（这一点就需要布兰登式或帕特森式的修正）。她这种做法没有引起任何一方的反感，但她的作品《安·兰德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yn Rand*, 1986）却引起了一场杯中风暴。许多兰德门徒无法接受宗师的婚外恋，佩科夫甚至因此跟她绝交。

如果布兰登代表兰德亚文化的修正主义传统，兰德

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佩科夫就代表了正统派的传统。1982年，他出版了《不祥的相似处》（*The Ominous Parallels*）。此书可以称为兰德主义历史学，罗列了古今一切暴政跟集体主义思想的渊源。1985年，他和艾德·施耐德（Ed Snider）一起创立了“安·兰德学会”（ARI）。学会旨在推广兰德的作品和思想，支持世界各地对兰德的研究。施耐德是费城鹰队（橄榄球队）的老板，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对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就有切身体会。冷战结束后，许多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加入了兰德崇拜者的行列。知音的感觉和惨遭“乞丐与匪徒”折磨的切身经历构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就这样，兰德在身后获得了“美国商业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她在世之日，对美国商业精神只有一般性的赞赏，鲜有具体的论述，至少，跟她对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关注相比，她对商业的兴趣实在相形见绌。

如前所述，兰德终生是学术界的局外人。对此，她自己科班训练不足和学术圈的门户之见都有一定责任。然而，任何运动只要积累了足够的社会影响，早晚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1995年，纽约大学的克里斯·马修·塞亚巴雷（Chris Matthew Sciabarra）出版了《安·兰德：一位俄罗斯激进分子》（*Ayn Rand: The Russian Radical*）。此后，兰德虽然还不一定能算学者，但兰德研究无疑

可以视为学术了。1999年，塞亚巴雷和另外两位编辑创建了《安·兰德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进入21世纪以后，兰德研究一直保持了稳步上升的势头。

如果套用图解式的左右分类法，兰德生前的位置介于自由意志派和保守派之间。她比自由意志派偏右，主要是因为越战、美国军队、绥靖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问题。罗斯巴德和哈斯普斯的自由意志派从生命权的概念出发，得出了非常接近于左派的结论：反对越战、反对征兵制、反对海外干涉。兰德从同一个前提出发，得出了另一种结论：支持民兵和志愿兵的伟大传统、坚持维护麦卡锡主义的正当性、毫不妥协地打击任何非美势力。她把尼克松政府的募兵制视为个人的成功，把趋同论和和平共处论视为卑鄙的绥靖主义。她比保守派偏左，主要是因为宗教、社区和家庭价值观的问题。保守派一点也不喜欢跟布尔什维克分享“集体主义者”的标签，更不用说这种标签正是他们动员草根选民的重要法宝。兰德生前骄傲地炫耀“无神论者”的旗帜，实际上给自己帮了倒忙。后兰德的兰德主义者明智地忽略了涉及宗教和社区的问题，结果第三、第四代的兰德门徒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祖师是无神论者。这些人往往更清楚应该反对什么，却不太清

楚应该拥护什么。

无论如何，冷战的结束是广义右派的共同胜利。柏林墙倒塌以后，他们的势力都大大扩展了。各派都坚信历史证明了他们各自的理论正确，孰是孰非至少在目前还是个党派性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保守派是最大的现实收割者，无论他们在理论上正确不正确。宗教团体和社区组织承担了美国绝大部分日常生活任务，成年人几乎不可能不跟他们合作。没有这个基本盘，就没有共和党了。这些基本选民心目中的"好人"是玛格丽特·撒切尔[3]父母那种正直勤恳、才智有限的社区杂货店老板，不是约翰·高尔特那种天资卓绝、特立独行的大企业家、发明家。罗斯巴德的支持者、兰德的支持者总的说来是文化过高，太知识分子、太民主党了，反而不利于票房。相反，麦卡锡和乔治·W. 布什[4]的支持者多半根本不知道威廉·巴克利或罗素·柯克写过什么。《圣经》和生活经验对他们就足够了。

思想家如果有能力永保思想的纯洁性，他的思想就多半扩散不了。如果思想的影响范围很大，歪曲和选择性忽视就无法避免。冷战结束后，最积极支持兰德主义的政治家莫过于罗恩·保罗父子；但罗恩·保罗同时也是罗斯巴德的支持者。如前所述，兰德和罗斯巴德在越战

时期的政治态度相去甚远，彼此的感情像和平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样友好。我们实在无法保证，兰德如果死而复生，对反恐战争会有什么看法；但不难看出，保罗的安全政策更接近于罗斯巴德。在经济和税收问题上，罗斯巴德和兰德的差别极小，但原因主要在于兰德的经济学水准不高，除了一般性反对大政府高税收以外无话可说。保罗父子在经济问题上祖述兰德，实际上等于泛泛地赞同里根以后的共和党主流派，是无需做出具体承诺的。兰德生前在经济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具体主张，这跟她在政治方面总是有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罗恩·保罗自己处理经济问题，完全有能力拿出具体方案；但兰德对这些方案恐怕只起了护身符式的激励作用。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内的政策其实非常机会主义，严重违背了自由意志派和整个右派的价值倾向[5]；但他也非常强调兰德的影响，显然也是从激励角度而非遵守教条角度考虑。

里根对冷战后美国政治的主导作用之大，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二战后美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可以相比。一般的政党更迭不足以改变整体趋势。艾森豪威尔是半民主党的共和党总统，克林顿则是半共和党的民主党总统[6]。他们都没有让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势力感到忧虑。艾森豪威尔时代是沃伦和福利国家节节胜利

的时代，克林顿时代则是金里奇和财政保守主义节节胜利的时代[7]。只有奥巴马2008年的胜利和他的财政扩张政策才唤起了右派的警惕，激起了2009年以后“茶党”的草根反击[8]。“茶党”又激起了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左派反击[9]。这些社会运动都有后冷战的碎片化倾向：逻辑连贯的思想流派和政策主张瓦解了，代之以标签大拼盘式附身符游戏。意象形态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姿势重于问题。“茶党”除了“小政府低税收”的基本倾向以外，没有多少共同纲领。组成这个运动的众多小团体要么只有倾向，没有方案；要么在具体政策上几乎没有共同语言。“占领华尔街”甚至连“大政府高福利”的底线共识都不存在了。他们只是泛泛地呼吁“更有同情心的社会”，实际诉求涵盖了从宗教到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光谱。这些主张彼此之间的矛盾比它们跟共和党主流派政策的矛盾还要大。

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形势下，兰德符号和兰德思想的关系已经非常有限。历史人物西蒙·玻利瓦尔[10]的实际主张与查韦斯[11]的“玻利瓦尔主义”能有多少契合，兰德符号和兰德思想就能有多少共同点[12]。二者作为旗帜，主要发挥日本人所谓“感情炼金术”作用：团结、凝聚、区别敌我。群众的兰德符号非常接近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祖

先，一点不像历史上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政治家的兰德符号非常接近善于经营的天才企业家，一点不像不懂经济的政治哲学家。前者可以团结右派大家庭，后者却会掀起分裂性的危险论争。2012 大选中，共和党副总统瑞安[13]是这样消费兰德符号的。我们回顾这位年轻政治家的历史，不难看出以下两点。第一，瑞安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没有独到的见解，一直是个随大流的人[14]。他不是，也不可能是另一位麦凯恩[15]或罗恩·保罗。他如果上台，不会有里根式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政策。第二，瑞安获得提名的主要原因在经济方面。人们公认他在这方面有能力，尤其是可以反衬出奥巴马的无能。他的竞选策略是打经济牌，淡化其他不太擅长的方面[16]。兰德是瑞安的“自由经济和企业家精神”旗帜，而不是“保卫自由人权和自由世界”图腾。如前所述，真实的兰德在前一方面只有浮泛的倾向和文学性赞美，在后一方面倒是有具体的主张和理论体系。

站在保罗、瑞安和格林斯潘等人的立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利用或歪曲了兰德思想。相反，他们会认为，他们借助兰德思想的启发，解决了兰德时代没有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有充分理由把这种成就归功于兰德，即使这些影响在技术上不符合兰德的原意。所有宗教和政

治理论的门徒不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祖师吗？基督和孔子都没有提到共和的概念，并不妨碍他们的门徒大谈基督教或儒家与共和宪政之间存在或应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相形之下，现代兰德主义者对祖师的修正非常有限。何况，这种待遇本来就是历史赋予人中龙凤的特权。他们早已步入不朽，不再属于自己。

注释：

1.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和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是弗洛伊德的晚辈和崇拜者，一开始非常支持弗洛伊德。但不久之后，他们就感到难以忍受弗洛伊德执拗的性格。弗洛伊德也不能忍受荣格用集体无意识理论、阿德勒用自尊理论修正他的理论。精神分析学会因而分崩离析，各派自立山头。

2. 根据传说，罗马元老杀害了建城者罗慕路斯（Romulus, 771 B.C.—717 B.C.），支解他的尸体。英国文化史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认为这是古老的祭祀仪式：国王—祭司必须牺牲自己为祭品，求得部落的风调雨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是罗马共和制度生命力旺盛的表现。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就是元老院（贵族）和公民大会（人民）的长期斗争和妥协，一直到共和国灭亡。因此，罗马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就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3.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1925—2013）英国右翼政治家，第49任英国首相（1979—1990），是至今英国唯一一位女首相，也是自19世纪初以来任期最长的英国首相。

4.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 1946—），共和党成员，美国第43任总统（2001—2008），其父是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1924—）。

5. 格林斯潘施行了温和的货币扩张政策，是1990年代经济繁荣的主要功臣，同时也为2008年经济危机种下了祸根。他如果坚持严格的财政保守主义，这两者都不会发生。18世纪的英格兰银行能坚守原则，但当代的美联储主席不为经济繁荣而牺牲财政纪律，是不可能在位的。

6.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46—），民主党成员，第42任美国总统（1993—2001）。艾森豪威尔名义上是共和党人，实际上继承了新政以来的民主党政策。克林顿名义上是民主党人，实际上继承了里根的政策。

7. 厄尔·沃伦（Earl Warren, 1891—1974）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高法院法官，美国社会平等的主要推动者。纽特·金瑞奇（Newt Gingrich, 1943—）克林顿时代的共和党领袖，提出"美利坚契约"，推动削减赤字、厉行财政保守主义。

8. 茶党（Tea Party）是美国的一个政党，发端于1773年美国波士顿。当时仍为英属殖民地的波士顿民众为反抗殖民当局的税收政策，发起了倾倒茶叶的事件，参加者遂被称之为"茶党"，从此"茶党"成了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茶党运动在美国兴起，主要参与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是对2009年奥巴马刺激经济复苏计划所导致的国债增加的抗议发展而来的。抗议者

使用了多种网络手段互相联络策划纳税日的抗议活动。

9. 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2011 年 9 月 17 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示威者的意图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及社会不公正。2011 年 10 月，“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11 月，纽约警方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

10.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178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为南美洲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而独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从与西班牙君主的斗争中取胜后，玻利瓦尔参与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联盟，并于 1819 年至 1830 年任该国总统。

11. 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1954—2013, 委内瑞拉左翼政治人物，是委内瑞拉立国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执政 14 年，也是现当代全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12. 历史上的玻利瓦尔将军是精英主义者。他制定的宪法保证有产者俱乐部的政治垄断权，辞职后仍然默许部下军官发动政变，驱逐不合心意的政府。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Bolívarism）是措辞含混的民粹主义，主张群众运动、大众民主和社会福利。

13. 保罗·瑞安（Paul Ryan, 1970—），美国众议院议员，被共和党提名为 2012 年总统选举中副总统的候选人，拜服安·兰德为其思想导师。

14. 瑞安在众议院的投票纪录足以说明问题，他一向不是外

交和安全事务的负责人。

15.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1936—），美国政治家、共和党重量级人物，现为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属于党内“温和派”，曾于2008年参选过美国总统。

16. 瑞安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公认的预算问题专家。“平衡预算”和“经济发展”是大选的中心话题。瑞安主张削减预算、改革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福利项目来控制政府支出。民主党则攻击他拿穷人开刀，帮助富人逃避社会义务。政治和外交问题不是他们争论的重点，瑞安在国会中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第二十一章

安·兰德哲学及其思想史系谱

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

——《关于作者》(About the Author)

来自《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兰德主义在哲学上是一条野路子，原因不仅在于创始人的非科班出身，更在于她颠倒了正统哲学理论的建构程序。她逆向推演：首先根据文学政治的需要补充政治哲学，然后根据政治哲学的需要补充认识论。这种奇特的模式跟她的生平颇有关系。曹公自述：少年时志不过征西将军，勤王意外功成，以致骑虎难下。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

安·兰德处境类似。她从封闭社会的文学青年起步，起初志向不过羡慕好莱坞银幕式自由，有当明星的梦想而已。少年兰德和所有的聪明学生一样，看破了苏联的宣传。她出于逆反心理构建对抗性理论，但对抗性理论的基础仍然是产生苏联的同一个激进主义传统。两者在哲学上是亲兄弟，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卑鄙的机会主义者。这时，她只想击破谎言，同时给自己创造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

随着形势的发展，她的地位超过了一个普通“投奔自由的宣传家”。她的才智使她无法满足于表象上的揭发和论争，她要寻找自由社会的基石。于是，兰德政治哲学产生了。这种政治哲学的脑袋是美国宪法，身体却是好战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衣冠是个人主义，灵魂却是骄傲的尼采主义。政治斗争暂时掩盖了兰德主义及其盟友的

哲学分歧，但争论早晚会爆发。兰德的成功使她升级为派系团体的领袖人物，因而更无法回避论战的需要。这种需要迫使她在创作力基本消失的晚年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制造认识论基础。在这方面，她做得不很出彩，即使百分之百赞同她政治理论的学生也能看出其中的矛盾。

简而言之,兰德式“理性”只有在个体认知边界无限，感知能力无限的前提下才可能“客观”。她其实并不在意哲学基础部分，只顾为政治理论弥缝，所以说出这样的话：理性的人没有真正的利益冲突，因为他们对利益冲突有正确的认识。兰德的门徒绝少提及她的认识论，总是集中宣传她的政论，原因就在这里。

兰德形而上学基础薄弱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缺乏哲学训练。她智力超人、精力过人、意志惊人，绝非寻常混饭吃的哲学教师可比，自学根本不足以构成致命的障碍。关键在于，她早年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的成就，没有准备政治宣传以外的东西。等到需要奠定理论基础的时候，她在社会上的名誉已经太大、政治上的立场已经凝固。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考虑修正自己原先说过的话，动摇徒子徒孙的忠诚和信念。因此，勉强拼凑“为政治服务的认识论”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由于以上原因，兰德文学政治、兰德政治哲学、兰

德认识论之间缺少内在的统一。因此，兰德主义的思想史系谱相当错乱。在文学政治层次上，她是反苏反共的苏联式宣传家。她的作品完全符合“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理论，只是用在了相反的方向。她非常相信“先进人物的启蒙能影响历史进程”，说明她是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后裔，也就是“有俄罗斯特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精神表兄弟。在政治层次上，她是坚定的尼采个人主义者，同时反对宗教、社区与国家，不能区别政治强制和习俗约束，对叛逆姿态怀有俄国式的爱慕。在政治哲学层次上，她是理性建构主义者，坚决地排斥一切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设计不受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的理想蓝图，说明她是欧洲大陆绝对理性传统的再传弟子、俄罗斯激进主义的表兄弟。在这方面，兰德主义跟英美有限理性和经验主义传统相距太远，反而无法引起冲突；跟罗斯巴德学派容易冲突，恰好因为他们系属同门而必须争夺解释权。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兰德哲学不存在，只存在一系列概念的错乱，包括绝对理性个人主义推出客观主义的逻辑不可能性。（推出主观主义倒是顺理成章，只有假定理性个人主义者具有《使徒信经》所谓“圣徒相通”才能避免矛盾[1]。）

兰德少年时崇拜柏拉图，她的哲学和政论始终是理

念模型而非经验模型。自从波普尔把《理想国》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后[2]，反共界人士经常觉得负有反对柏拉图的社交义务。兰德未能免俗，但她思想方法的柏拉图性质终生未改。兰德接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很晚，她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从亚里士多德身上找到绝对理性的基础，但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有浓厚的经验性质[3]，兰德所需的那种倒金字塔式的绝对理性只有在笛卡尔以后才能产生。休谟（Hume）－贝克莱（Berkeley）一系的情感主义（Emotion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4]会破坏兰德理论的所有前提，不过她对英美哲学传统几乎没有接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跟兰德哲学有近亲关系，都是欧陆绝对理性的产物，但以下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根据兰德哲学的标准，德国古典哲学完全是神秘主义的派生物，物自体和彼岸性都是理性的背叛[5]；根据德国古典哲学的标准，兰德的理性主义是唯意志论的伪理性，兰德的客观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伪客观。

一切哲学体系都有作为初始前提的公理，然后才有根据公理证明的定理。只有定理的分歧才能付诸证明，公理的分歧只能依靠信或不信来解决。没有人能论定欧几里德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的优劣[6]。哲学上的

近亲可能是政治上的死敌。兰德毕生反苏反共，在右派内部跟罗斯巴德关系最糟。然而，两者都是她的哲学近亲、绝对理性的同门。她誓死维护的美国宪法体制是基督教新教和英国经验主义两种传统的汇聚，跟她的哲学系谱极其疏远。

最后，我们不妨运用兰德喜欢的“观念人物戏剧冲突”来展示她和各种宗教、哲学信徒的关系。

基督徒：我们不要忘记《圣经》的教训。智者的理性在神的面前全是愚拙，敬畏上帝比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更可靠。人类的理性和人类本身一样不完善，何况撒旦经常利用人的优点，正如利用人的缺点。信仰之外，人类道德的基础不外乎骄傲与恐惧。兰德主义如果没有在她自己身上造成恶果，那只是因为她的骄傲使她鄙视一切不义。但她的骄傲能使她免于一切谬误吗？但愿我能说是。如果有人才干、意志不过平平，却完全信任她的理论，那就会出现《罪与罚》的场面[7]。此人以为拿破仑的才干和成就足以为拿破仑的罪行辩护，结果发现自己只有罪行，没有才干和成就。如果我首先考虑对读者公正，然后才考虑对作者公正，那就实在不能把这样危险的思想推荐给别人。我知道我的判断可能也是错的，但我还是只能这样说。

各种非宗教的经验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希腊罗马哲人和孔门弟子：我们对各种信仰和各种理论绝无不敬之意，但我们的举措仅仅基于政治共同体所受的实际影响。如果人类能够享受明智而公正的统治，没有人会比我们更高兴。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们所见所闻的范围内，人类一般受到自己的弱点统治。忽视人类的优点，引起的灾难小；忽视人类的弱点，引起的灾难大。如果我们能有真正的贵人和智者统治庸人和愚人，那确实是苍生之福。不过事实上，我们只能满足于说服庸人和愚人：他们的统治者已经是贵人和智者了。我们没法赞成和鼓励这样的理论：它让人人自以为足够优秀，可以无视古老而行之有效的习惯。不过，有能力制造这种理论的人无疑属于贤能之列。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或没有把这样的人纳入精英圈内，那就是体制的错误。只要我们在简拔贤能方面判断正确，在理论学说方面判断错误是无伤大雅的。反过来可就不是这样。

各种无神论理性主义者（包括欧洲大陆系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理性是万物的尺度。人类依靠理性，祛除神秘和蒙昧，不断走向更大的进步。我们当然会错，但只有理性才能纠正我们的错误。总会有那么一天，一切混乱和困惑都将厘清。那时，只有愚

钝和恶意才能使人反对明明可见的真理。我们现在正在路上。兰德反对的一切，都是我们同样反对的。她赞同的种种论证，显然包含了诸如此类的谬误。我们虽然暂时还没有弄清一切问题，但已经弄清的那一部分就足以纠正她的许多错误了。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如果她足够理性，早晚会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行列。如果她仍然愚钝或恶毒，我们就要努力在观念播种方面超过她。

后现代主义者[8]、精神分析学派[9]、庄子和禅宗的门徒：谁还在说理性？难道我们还没有教会你们，一切理性不外乎语言营造的幻梦吗？没有谁比谁更正确，没有什么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真实。你们只以为追求真理，其实就像拉磨的驴子一样原地打转。我们不想追求什么真理，而是想废掉真理这个概念，从而使问题不存在。我们甚至不想说服你们，说服本身就是屈身于语言的奴役。我们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奴役。等我们把语言解构完了，你们就不会这么着急啦。谁是约翰·高尔特？谁是安·兰德？谁在乎？

注释：

1. 兰德认为，只要不同个体正确地认识，就不存在认识的冲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假定存在超乎个人认知范围的普遍理性。早期基督教认为"圣徒相通"是普遍理性的证明，但这个结论只有在承认上帝和圣灵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2. 参见波普尔所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

3. 亚里斯多德的理性是练达公民的思维、理解和判断，这三者都来自他处理共同体事务的经验。没有共同体资格的生物人，例如妇女，就不具备理性。

4. 休谟以前，道德和规则的基础在理性。休谟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中提出感情才是道德和规则的基础。贝克莱把经验等同于主观体验，论证只有上帝存在才能避免主观唯心论的虚无主义。

5. 思辨哲学不可能付诸理性。物自体是先于人类认识的存在，彼岸性是基督教天国的哲学对应物。

6. 承认平行公设，可以推出欧几里德几何学 (Euclidean Geometry)；否定平行公设，可以推出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 (Lobachevsky's Non-Euclidean Geometry)。两者都是合乎逻辑的，只是前提不同。

7.《罪与罚》里的主人公以拿破仑自居，认为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

8.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哲学体系倾向的一种思潮，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提出过自成体系的后现代论述，不同时期具有反传统理论倾向的哲学理论流派都可归于后现代主义，如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等。后现代主义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包括对《圣经》和其它信仰宣告），滑入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折中主义，认为道德、真理和信仰都是相对的。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价值评判的标准模糊。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Nihilism）。

9. 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或称为心理分析学，是19世纪末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一门学科。精神分析学派产生于1900年，其学派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广为流传，颇具影响。

结　语

火与电

任何人只要了解安·兰德的生平，都不能不感到：她天生就属于才智和意志高人一筹的极少数。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她都会轻易凌驾于周围凡人之上。所谓“锥处囊中，其末立现”，简直就是她的写照。任何人只要接近她，就很难抗拒她的魔力和压力。妨碍她比顺应她困难得多。仅仅依据著作评判她，大概会漏掉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把她看做毕达哥拉斯[1]和卡米尔·德穆兰[2]的合体，庶几近之。许多人阅读她的作品，自以为可以驳倒她。一旦亲自跟她接触，立刻就屈服于火与电的力量，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与生活反差甚大，兰德并不例外，但她更像伊壁鸠鲁[3]，而非叔本华[4]。伊壁鸠鲁鼓吹快乐主义，引来了长达两千年的诬蔑。然而考察这位哲

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享乐”跟世俗所谓“行善”没有太大区别,但他宣称这就是最纯粹的快乐。相反，叔本华鼓吹悲观主义而躬行享乐主义。兰德声称精英对公众并无义务的伦理，但自己的行为和政治家所说的义工很像；她断言这完全是一种价值观投资，跟利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不遭冒犯的前提下，她比大多数善男信女更慷慨仁慈。

兰德相信哲学的用途在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她的哲学有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她并非先构建本体论和认识论，然后解释此岸世界，而是先确定了支持和反对的现实事物，再回溯，寻找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她晚年的论著非常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二、三卷（草稿笔记），主要是为了给早期著作打补丁。她的小说则另当别论，因为作品的力量比作者的意图更强。兰德的本意是要让人物体现观念，甚至不惜牺牲读者的愉悦，但她灵魂的火焰还是自然而然地流入人物心中。尤其是女性角色较少承担说教的使命，更多投射出作者本人的性格，反而比刻意塑造的男主角更有吸引力。在党争的喧嚣渐渐沉寂以后，这些人物仍然会在文学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热情似火，熠熠生光。

注释：

1.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72 B.C.—497 B.C.）是古希腊神学家和几何学家，他认为数学体现了万物的神秘性质。毕达哥拉斯派的秘密会社不是学术团体，而是宗教组织，违背戒律或泄露秘密（包括数学发现）者会遭到全体门徒的制裁。

2. 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演说家、群众煽动家，“进军凡尔赛”的主要功臣。

3. 伊壁鸠鲁（Epicurus, 341 B.C.—270 B.C.）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成功地发展了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的享乐主义，并将之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结合起来。他的学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要达到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

4.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不同于同代的哲学家取消物自体的做法，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并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人们只有在审美的沉思时逃离其中。叔本华将其著名的极端悲观主义和此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欲望和冲动的压抑、扭曲的理解预言了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

索 引

A

Altruism 利他主义 54, 102, 109, 117, 133, 148, 200, 212, 233, 264
Anarcho-capitalism 无政府资本主义 13, 186, 192, 193, 234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 3, 17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257
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经济学派 13, 178, 187, 192, 193
Authoritarianism 威权主义 22, 38, 46
Ayn Rand: *The Russian Radical* 《安・兰德：一位俄罗斯激进分子》 244
Ayn Rand Institute（ARI） 安・兰德学会 243

B

Bastiat, Frédéric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198
Berlin Wall 柏林墙 47, 115, 122, 204, 245
Berlin, Isaiah 以赛亚・柏林 129, 139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4, 15, 21, 42–46, 48, 50, 51, 58, 92, 95, 98, 113, 117, 135, 172, 174, 185, 233, 244
Branden, Barbara Weidman 芭芭拉・魏德曼・布兰登 176, 183, 184 187, 188, 189, 196, 198, 222–227, 242
Branden, Nathaniel 纳撒尼尔・布兰登 173–177, 181–184, 186–189, 195–200, 202, 207–209, 211–213, 215, 221–227, 230–232, 235, 241, 242
Psychology of Self -Esteem 自尊心理学 181, 202, 213, 231, 241
Burke, Edmund 埃德蒙・柏克 5, 16, 184, 191

C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50, 58, 192
Circle Bastiat 巴斯夏圈 186, 187, 193, 196, 197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9, 27, 67, 72, 81, 93, 105, 106, 107, 117, 118, 120, 127, 132, 135, 137, 144, 147, 148, 159, 167, 170, 176, 210, 230,

233, 234, 243, 244
Comte, Auguste
奥古斯特·孔德 110, 126, 138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3, 13, 14, 16, 25, 26, 75, 78, 117, 119, 125, 180, 184, 191, 202, 205, 207, 210, 212, 214, 230, 237, 238, 241, 246, 247, 250, 259
Cooper, Gary 加里·古柏 146, 152, 171
Cult 邪教 156, 197, 202, 207, 232

D

Decembrist 十二月党人 4, 14, 15, 53, 105, 128, 256
Descartes, René 勒内·笛卡尔 56, 107, 147, 153, 257

E

Emotionalism 情感主义 257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56, 57, 60, 111, 140, 147, 152, 153, 238, 256–259
Epicurus 伊壁鸠鲁 263, 265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60, 61

F

Fabianism 费边主义 18, 90, 123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232, 238

G

Gall, John 约翰·高尔 131
Galt's Gulch
高尔特谷 170, 183, 187
Greenspan, Alan 艾伦·格林斯潘 182, 183, 186, 189, 191, 196, 214, 227, 233, 246, 248, 250

H

Hazlitt, Henry
亨利·黑兹利特 186, 195
Hollywood Ten
好莱坞十人 161, 162
Hook, Sidney 悉尼·胡克 211, 220, 232
Howard Roark 霍华德·洛克 10, 35, 63, 116, 118–121, 128, 135, 137, 145, 146, 150, 171, 188
Hugo, Victor 维克多·雨果 132, 140, 229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5, 16, 20, 31, 60, 147, 153, 191, 238, 257, 261
Huxley, Aldous Leonard
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 18

I

Ibsen, Henrik Johan
亨利克·约翰·易卜生 87, 88, 96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 3, 9, 10, 26, 54, 56, 64, 67, 69, 83, 92, 96,

104, 105, 106, 117, 132, 133, 134, 135, 137, 138, 144, 146, 147, 154, 155, 163, 167, 170, 171, 172, 176, 178, 182, 188, 190, 193, 199, 200, 201, 202, 210, 212, 213, 242, 243, 254, 256

K

Kant, Immanuel 伊曼纽尔·康德 60, 147, 153, 191, 234, 238, 257, 265

Kirk, Russell 罗素·柯克 184, 186, 191, 230, 245

L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13, 61, 178, 193

Laski, Harold 哈罗德·拉斯基 99, 120, 123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 5, 20, 32, 38, 75, 100, 118, 122, 125, 139, 178, 192, 193, 205, 228, 231, 246

Liberals 自由主义者 3, 4, 5, 11, 14, 21, 25, 33, 53, 125, 141, 160, 210, 211, 238, 256, 259

Libertarianism 自由意志主义 3, 13, 61, 153, 178, 192, 234, 241

Lobachevsky's Non-Euclidean Geometry 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非欧几何） 257, 261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60, 133, 140, 141, 153

Lubitsch, Ernst 恩斯特·刘别谦 64, 70

M

Machiavelli, Niccolo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215, 216, 249

Machiavellianism 马基雅维利主义 209, 216

Mont Pelerin Society 朝圣山学社 202, 205

Hayek, Friedrich 弗雷德里希·哈耶克 178, 205, 211

Polanyi, Michael 迈克尔·波兰尼 205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尔 205, 257, 261

Moral Basis of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146

N

Nabokov, Olga 奥尔加·纳博科夫 7, 20 –22, 28, 29, 32, 133

Nabokov,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4, 5, 14–16, 31, 41, 45, 50, 51

Lolita《洛丽塔》（小说） 20, 31

National Review《国民评论》（杂志） 184, 190, 202, 238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
25, 202, 205, 207, 212, 230
Night of January 16th《一月十六日夜》(剧本) 95, 102, 107, 108, 114, 127
Nora 诺拉
6, 23, 54, 65, 150, 201, 230

O

O'Connor, Frank 弗兰克·奥康纳
63, 83, 87, 90, 94, 102–104, 125, 127, 143–145, 148, 149, 155, 160, 173, 175, 181, 183, 184, 186–188, 224, 230, 236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
56, 57, 60, 61, 64, 74, 178, 182, 186, 188, 189, 196–198, 212–215, 224, 226, 227, 231, 233, 242, 256, 257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61, 97, 135
Nineteen Eighty-Four《1984》(小说) 61, 91, 97, 98, 126

P

Paterson, Isabel
伊莎贝尔·帕特森 131–134, 136, 138, 143, 144, 148, 149, 155, 172–174, 176, 211, 242
Peikoff, Leonard 伦纳德·佩科夫
182, 186, 189, 196, 214, 227, 230–232, 235–237, 242, 243
petty bourgeoisie
小布尔乔亚 9, 17, 90

R

Random House 兰登书屋(出版社)
189, 195, 203, 208, 221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56, 60, 93, 133, 134, 147, 148, 152, 153, 156, 170, 176, 187, 188, 190, 215, 237, 241, 259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33, 130, 139, 210, 214, 215, 236, 246, 248, 250
Reid, Thomas Mayne
托马斯·马因·里德 116, 117, 122
Remington Rand
雷明顿兰德(公司) 76, 79
Rockefeller, Nelson
纳尔逊·洛克菲勒 214, 218
Rogers, Ginger 金杰·罗杰斯 161
Cerf, Bennett 贝内特·瑟夫(老板) 189, 195, 197
Haydn, Hiram 希拉姆·海顿(编辑) 195, 197
Roosevelt, Franklin
富兰克林·罗斯福 104, 110, 114, 125, 127–130, 133, 138, 139, 156, 162, 165, 191, 196, 199, 209, 237, 246
Rothbard, Murray 穆瑞尔·罗斯巴德
3, 13, 178, 186, 187, 192, 193, 196–198, 202, 207, 208, 211, 212, 230, 234, 235, 244–246, 256, 258

S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60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177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主义 125, 138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10, 177
Statism 国家主义
38, 45, 46, 117, 122, 125, 231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
主观价值论 193
Syndicalism 工团主义 39, 46

T

Tea Party 茶党 79, 247, 250
Terrorism 恐怖主义 32, 217
Thatch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撒切尔 245, 250
The Fountainhead《源泉》(小说)
10, 63, 71, 80, 101, 117, 124, 125, 127, 134–137, 142, 143, 145, 146, 150, 154–156, 158, 167, 171, 173, 175, 176, 182, 206, 208, 223
The God of the Machine
《机器的上帝》172
The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安·兰德研究期刊》(杂志) 244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113, 121, 137, 164, 171, 192, 196, 238
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自私的德性》180, 215, 22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109, 111, 192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113, 121
Time《时代》杂志 131, 191
Tocqueville, Alexis de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20, 31, 117, 122
Trotsky, Lev 列夫·托洛茨基
5, 15, 47, 55, 59, 104, 198, 203

U

Universal Pictures
环球影业(公司) 94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9, 193

V

Veblen, Thorstein
托斯丹·凡勃伦 211, 217

W

Watkins, Ann 安·沃特金斯
108, 114, 127, 134, 135
Wallace, Mike
迈克·华莱士 200, 204
Warner Bros 华纳兄弟(公司)
143, 145, 150

We《我们》（小说） 91, 98, 126
We the Living《我们活着的人》（小说） 57, 64, 65, 66, 95, 103, 106, 107, 113, 114, 115, 117, 174, 208, 240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139, 140
West Point 西点军校 210, 233–235

Y

Yalta 雅尔塔（城市） 45, 160

Z

Zinovy 吉诺菲 22, 51–54, 66, 67, 68, 91, 116, 150

参考文献

英文文献：

1. Anne C. Heller, *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 Random House, 2009

2. Robert Mayhew, *Ayn Rand and Song of Russia: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1940s Hollywood,* Scarecrow Press, 2004

3. Jeff Britting, *Ayn Rand*, Overlook, 2004

4. Charles Sures & Mary Ann Sures, *Facets of Ayn Rand*, Ayn Rand Institute, 2001

5. James S. Vallliant, *The Passion of Ayn Rand's Critics: The Case Against the Brandens*, Durban House, 2005

6. Scott McConnell, *100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yn Rand*, NAL Trade, 2010

7. John Earl Haynes, Senator Joseph McCarthy's Lists

and Venona, www.johnearlhaynes.org/page62.html, 2007

8. Stephen J. Sniegoski, The Reality of Red Subversion, *The Occidental Quarterly*, Vol.3, No.3, 2003

9. William F. Buckley Jr. & L. Brent Bozell, *McCarthy and His Enemies*, Crown, 1977

10. Michael Paxton, *Ayn Rand: A Sense of Life*, Gibbs Smith Publishers, 1998

中文文献：

1. 塔拉·史密斯：《有道德的利己》，华夏出版社，2007

2. 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南方出版社，2005

3. 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4. 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的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5.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6.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7. 穆瑞尔·罗斯巴德：《自由的伦理》，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8

8.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乔治·凯南：《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商务印书馆，1980

10. 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1. 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3

12.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95

13. 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4.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

15. 汪介之：《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译林出版社，2003

16. 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7.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8. 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

和紧缩政治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9.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0. 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观与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08

附录一

安·兰德年谱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出生。

1910年，诺拉（安·兰德最小的妹妹）出生。

同年，吉诺菲（安·兰德的父亲）获得克林格药店合伙人资格，生意兴隆。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同年秋，安·兰德进入斯托由宁学校。

1915年，安·兰德开始秘密写作。

1917年，安·兰德与奥尔加·纳博科夫结为密友。

同年3月，沙皇退位。

同年11月，列宁推翻临时政府。

1918年1月28日，列宁解散立宪会议。

同年夏末，罗森鲍姆全家逃往克里米亚。

1920年底，红军攻陷克里米亚。

1921年夏，罗森鲍姆全家返回彼得格勒。

同年8月，安·兰德在圣彼得堡大学社会科学院入学。

1922年，安·兰德结识男友列夫·贝克尔曼。

同年秋，“哲人船”大清洗。

1924年10月13日，安·兰德获得圣彼得堡大学毕业证书。

1925年秋，安·兰德获得美国探亲护照。

1926年1月7日，安·兰德离开圣彼得堡。

同年2月19日，安·兰德抵达纽约。

同年2月24日，安·兰德（当时还叫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在纽约到芝加哥的列车上改名为安·兰德。

同年8月，安·兰德抵达好莱坞。

1927年1月，导演塞西尔·B. 德米尔任用安·兰德为电影编辑。

同年5月，安·兰德与演员弗兰克·奥康纳相爱。

1929年4月15日，安·兰德与弗兰克·奥康纳结婚。

同年7月，安·兰德为雷华电公司工作。

1934年12月，奥康纳夫妇移居纽约。

1936年春，安·兰德结识作家伊莎贝尔·帕特森。

同年 4 月 7 日，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我们活着的人》。

1938 年，安·兰德为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助选。

1939 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1 年 4 月，安·兰德起草《个人主义者宣言》。

同年 12 月 8 日，美国对日本宣战。

1942 年底，《源泉》截稿。

1943 年 12 月，奥康纳夫妇返回好莱坞。

1944 年，奥康纳在圣费尔南多谷购地。

1945 年，安·兰德撰写《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

同年秋，安·兰德撰写《致源泉的读者》。

1946 年，安·兰德撰写关于原子弹的电影剧本《最高机密》。

同年，安·兰德加入"保卫美国理想"执行委员会。

1947 年 10 月，安·兰德在众议院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

1948 年 5 月，安·兰德与伊莎贝尔·帕特森决裂。

同年 6 月，安·兰德将《源泉》改编为电影剧本。

1949 年 6 月，电影《源泉》首映。

1950 年 3 月 2 日，安·兰德结识纳撒尼尔·布兰登（纳撒·布卢门撒尔）。

1951 年 10 月，奥康纳夫妇返回纽约。

1953 年 1 月，奥康纳夫妇出席布兰登夫妇的婚礼。

1955年1月，安·兰德与纳撒尼尔·布兰登同居。

1957年3月，《阿特拉斯耸耸肩》截稿。

同年10月，兰登书屋出版《阿特拉斯耸耸肩》。

1958年1月，布兰登开始举办兰德公开课。

1960年，安·兰德开始举行巡回讲演。

1962年1月，《客观主义者时讯》出版。

1963年，纳撒尼尔·布兰登与帕特丽西亚·格里森相爱。

1964年，安·兰德为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沃德助选。

同年，新美国图书馆出版《自私的德性》。

1967年，安·兰德撰写《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

1968年8月23日，安·兰德与纳撒尼尔·布兰登决裂。

同年9月2日，兰德公开课结束。

1969年7月，艾伦·格林斯潘邀请安·兰德出席阿波罗11号发射典礼。

1974年3月，荷尔曼·艾维上校邀请安·兰德赴西点军校讲演。

同年，安·兰德接受肺癌手术。

1979年11月7日，弗兰克·奥康纳去世。

1981年4月，安·兰德在福特论坛举行最后一次演讲。

1982年3月6日，安·兰德去世。

附录二

安·兰德著作目录

（星号表示已有中译本）

安·兰德生前著作

剧　本

《红色人质》（*Red Pawn*），1929

*《一月十六日夜》（*Night of January 16th*），1934

*《理想》（*Ideal*），1934

*《三思而行》（*Think Twice*），1941

小　说

《小街》（*Little Street*），1928

《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1936

*《颂歌》（*Anthem*）[中译本名为《一个人》]，1938

*《源泉》(*The Fountainhead*), 1943

*《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1957

非文学作品

《个人主义者宣言》(*Individualist Manifesto*), 1941

《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Moral Basis of Individualism*), 1945

*《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哲学》(*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 1961

刊物《安·兰德通讯》(*The Objectivist Newsletter*), 1962—1966

*《自私的德性》(*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与布兰登合著), 1964,节选中译本名为《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2007年4月新中译本名为《自私的德性》——译者注。

《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与布兰登、格林斯潘、海森合著), 1966

刊物《客观主义者》(*The Objectivist*), 1966—1971

*《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 1967

美学论著《浪漫宣言》(*The Romantic Manifesto*), 1969

刊物《安·兰德通信》(*The Ayn Rand Letter*)，1971—1976

《回归原始：反工业革命》(*Return of the Primitive*：*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1971

安·兰德学会（Ayn Rand Institute）
在安·兰德身后出版的作品

*《谁需要哲学》(*Philosophy*：*Who Needs It*)(佩科夫编辑)，1982

《早期的安·兰德》(*The Early Ayn Rand*)(佩科夫编辑、评论)，1984

《安·兰德词典：客观主义 A-Z》(*The Ayn Rand Lexicon*：*Objectivism from A to Z*)，(哈里·宾斯万格［Harry Binswanger］编辑)，1986

*《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The Voice of Reason*：*Essays in Objectivist Thought*)(佩科夫编辑，内附佩科夫和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的文章)，1989

*《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第二版)(*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second edition）（哈里·宾斯万格编辑，增加了佩科夫贡献的新数据），1990

*《安·兰德专栏》（*The Ayn Rand Column*）（彼得·施瓦茨编辑）[中译本名为《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1991

《客观主义：安·兰德的哲学》（*Objectivism: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佩科夫著），1991

《安·兰德批注：对20位作者的批判评论》（*Ayn Rand's Marginalia: He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Writings of over Twenty Authors*）（罗伯特·梅休 [Robert Mayhew] 编辑），1995

《安·兰德通信》（*Letters of Ayn Rand*）（迈克·柏林纳 [Michael Berliner] 编辑），1995

《安·兰德杂志》（*Journals of Ayn Rand*）（大卫·哈里曼 [David Harriman] 编辑），1997

《安·兰德读本》（*The Ayn Rand Reader*）（加里·哈尔 [Gary Hull] 和佩科夫编辑），1998

《安·兰德：一种生命意识》（*Ayn Rand: A Sense of Life*）（迈克尔·帕克斯顿 [Michael Paxton] 著），1998

《好莱坞的俄国作品》（*Russian Writings on Hollywood*）（迈克·柏林纳编辑），1999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Why Businessmen Need Philosophy*），

1999

《小说的艺术》(*Art of Fiction*)(托尔·伯克曼[Tore Boeckmann]编辑)，2000

《非小说的艺术》(*Art of Nonfiction*)(罗伯特·梅休编辑)，2001

《客观主义研究》(*The Objectivism Research*)(将兰德作品以 CD-ROM 的方式收藏)，2001

《安·兰德面面观》(*Facets of Ayn Rand*)(查尔斯·祖雷斯[Charles Sures]和玛丽·安·祖雷斯[Mary Ann Sures]著)，2001

《〈我们活着的人〉论文集》(*Essays on Ayn Rand's We the Living*)(罗伯特·梅休编辑)，2004

《安·兰德与俄国之歌：1940 年代好莱坞的共产主义与反共主义》(*Ayn Rand and Song of Russia：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in 1940s Hollywood*)(罗伯特·梅休著)，2004

《安·兰德小传》(*Ayn Rand*)(杰夫·布里汀[Jeff Britting]著)，2005

《安·兰德批评者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yn Rand's Critics*)(詹姆斯·威利昂特[James Valliant]著)，2005

《〈颂歌〉论文集》(*Essays on Ayn Rand's Anthem*)(罗伯特·梅休编辑), 2005

《安·兰德答问》(*Ayn Rand Answers*)(罗伯特·梅休编辑), 2005

《〈源泉〉论文集》(*Essays on Ayn Rand's The Fountainhead*)(罗伯特·梅休编辑), 2006

《100种声音：安·兰德的口述历史》(*100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yn Rand*)(司各特·麦康奈尔[Scott McConnell]著), 2010

《了解客观主义：安·兰德哲学学习指南》(*Understanding Objectivism: A Guide to Learning Ayn Rand's Philosophy*)(佩科夫著，迈克·柏林纳编辑), 2012

安·兰德著作及相关著作中译本

《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

《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

《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新星出版社，2005

《源泉》，重庆出版社，2005

《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

《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华夏出版社，2007

《一个人》，华夏出版社，2007

《自私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7

《阿特拉斯耸耸肩》，重庆出版社，2007

《谁需要哲学》，华夏出版社，2010

《有道德的利己》（*Ayn Rand's Normative Ethics: The Virtuous Egoist*）（[美]塔拉·史密斯[Tara Smith]总结和解读安·兰德伦理思想的作品），华夏出版社，2010

安·兰德影视剧作品年表

《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

导　　演：塞西尔·B. 德米尔（Cecil B. DeMille）

上映日期：1927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一部关于基督的生与死的史诗剧。安·兰德在

影片中担任临时演员，遇到并爱上了后来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奥康纳在片中饰演一个罗马士兵。

《一月十六日夜》（*Night of January 16th*）

导　　演：威廉·克莱门斯（William Clemens）

上映日期：1941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一部法庭情节剧。电影版依照的是委托他人修改过的剧本，安·兰德既没有同意拍摄，也没有参与其中。

《我们活着的人》（*We the Living*）

导　　演：戈弗雷多·亚历山大德里尼（Goffredo Alessandrini）

上映日期：1942年

地　　区：意大利

介　　绍：在没有经过兰德的承认或同意下，此小说于1942年两次被拍成电影，片名分别为 *Noi vivi*（《我们活着的人》）和 *Addio, Kira*！（《再见，基拉！》）。在墨索里尼统治下，影片开始险些被禁。由于小说根基于反苏意识形态，得以上映。影片成功后，政府转变态度，迅速禁了此片。后来，影片被重新剪接成新版本，并获兰德批准，

于 1991 年以 *We the Living* 为名重新上映。

《情书》(*Love Letters*)

导　　演：威廉·迪亚特尔（William Dieterle）

上映日期：1945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一个爱情与谋杀的故事。剧本由安·兰德改编自一部英国小说。影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并使主演成为明星，却为批评界诟病。

《你出现了》(*You Came Along*)

导　　演：约翰·法罗（John Farrow）

上映日期：1945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战争年代的爱情喜剧。安·兰德参与了剧本创作。

《源泉》(*The Fountainhead*)

导　　演：金·维多（King Vidor）

上映日期：1949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由华纳兄弟公司制作，安·兰德撰写剧本，著

名演员加里·古柏饰演男主。兰德最初坚持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设计电影中的场景，但因为莱特的收费过高而作罢。

《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访谈》（*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Ayn Rand*）

上映日期：1961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这是安·兰德在一次讲座后接受的采访，由密歇根大学拍摄。

《安·兰德：一种生命意识》（*Ayn Rand: A Sense of Life*）

导演：迈克·帕克斯顿（Michael Paxton）

上映日期：1997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讲述安·兰德生平及思想的纪录片。曾获 1997 年最佳纪录长片之金卫星奖以及 1998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安·兰德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yn Rand*）

导　　演：克里斯托弗·梅诺尔（Christopher Menaul）

上映日期：1999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根据安・兰德的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的前妻芭芭拉·布兰登所著同名传记改编的传记片，讲述了安·兰德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描绘了她无比极端的个性。

《理想》（*Ideal*）

导　　演：迈克・帕克斯顿（Michael Paxton）

上映日期：2004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根据安・兰德创作的同名剧本改编。

《阿特拉斯耸耸肩：第一部》（*Atlas Shrugged: Part I*）

导　　演：保罗・约翰逊（Paul Johansson）

上映日期：2011 年

地　　区：美国

介　　绍：根据安・兰德的同名小说改编。

《阿特拉斯耸耸肩：第二部》（*Atlas Shrugged: Part II*）

导　　演：约翰・普奇（John Putch）

上映日期：2012 年

地　　区: 美国

介　　绍: 根据安·兰德的同名小说改编。

《安·兰德和〈阿特拉斯耸耸肩〉的预言》(*Ayn Rand & The Prophecy of Atlas Shrugged*)

导　　演: 克里斯·莫特森(Chris Mortensen)

上映日期: 2012 年

地　　区: 美国

介　　绍: 一部纪录长片。安·兰德备受争议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再度引起大家关注。小说里对美国作出了可怕的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是正确的。

附录三

安·兰德语录摘选

A creative man is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achieve, not by the desire to beat others.
人的创造源于对成就的渴望，而不是击败他人。

A government is the most dangerous threat to man's rights: it holds a legal monopoly on the use of physical force against legally disarmed victims.
政府是对人类权利最大的威胁，因为它能对被合法缴械的受害者施与合法垄断的暴力。

Achievement of your happiness is the only moral purpose of your life.
获取幸福是你一生唯一的道德目的。

Achieving life is not the equivalent of avoiding death.
追求生命和逃避死亡可不一样。

All public projects are mausoleums, not always in shape, but always in cost.
所有的公共项目都是坟墓，不总是外表相似，付出的代价也总是相似。

An attempt to achieve the good by force is like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man with a picture gallery at the price of cutting out his eyes.
试图用暴力行善，就像试图为一个人提供画廊，但代价是挖掉他的双眼。

Ask yourself whether the dream of heaven and greatness should be waiting for us in our graves—or whether it should be ours here and now and on this earth.
问问你自己，关于天堂和伟大的梦想，究竟是应该在坟墓中等我们呢，还是就应该此时此地，在人世间，就属于我们。

Civilization is the progress toward a society of privacy. The savage's whole existence is public, ruled by the laws of his tribe. 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文明就是朝着一个“个人”的社会前进的过程。野蛮人存在都是公开的，受制于他所在部落的约束。文明就是将个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Contradictions do not exist. Whenever you think you are facing a contradiction, check your premises. You will find that one of them is wrong.
矛盾是不存在的。当你发现你面对矛盾的时候，查查你的前提。你会发现它们中有一个是错的。

Every man builds his world in his own image. He has the power to choose, but no power to escape the necessity of choice.
每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建造自己的世界。他有选择的权力，但他无法逃避选择。

Every movement that seeks to enslave a country, every dictatorship or potential dictatorship, needs some minority group as a scapegoat which it can blame for the nation's troubles and use

as a justification of its own demands for dictatorial powers.
在每一次旨在奴化国家的运动中，每个独裁者或潜在的独裁者都需要某个少数团体成为替罪羊，他们将国家的问题怪罪到这些人身上，以证明他们对独裁权力的要求是正当的。

Evil requires the sanction of the victim.
邪恶是需要受害者支持的。

Force and mind are opposites; morality ends where a gun begins.
暴力和心灵是相对的；枪声一响，道德无存。

From the smallest necessity to the highest religious abstraction, from the wheel to the skyscraper, everything we are and everything we have comes from one attribute of man – the function of his reasoning mind.
从最小的需要到高度的宗教抽象，从汽车轮胎到摩天大厦，我们的所有身分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人类的一个属性——头脑的推理功能。

Government "help" to business is just as disastrous as government persecution··· the only way a government can be of service to national prosperity is by keeping its hands off.
政府对商业的"帮助"，其实就像政治迫害一样，是场灾难……唯一能让政府对国家繁荣有用的办法就是——政府放手。

I swear by my life, and my love of it, that I will never live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man, nor ask another man to live for mine.
我发誓，以我的生命和对它的热爱，我永远不会为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Individual rights are not subject to a public vote; a majority has no right to vote away the rights of a minority;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is precisely to protect minorities from oppression by majorities.
个人的权利不屈从于公共投票；多数人无权通过投票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权利的政治功能恰恰是保护少数人不被多数人压迫。

It only stands to reason that where there's sacrifice, there's someone collecting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Where there's service, there is someone being served. The man who speaks to you of sacrifice is speaking of slaves and masters, and intends to be the master.
毫无疑问，有牺牲，必有人获得奉献。有服务，必有人享受服务。如果有人和你谈牺牲，实际上他是在谈奴隶和主子，而他正想当那个主子。

Money is only a tool. It will take you wherever you wish, but it will not replace you as the driver.
金钱只是工具。它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但它不能代替司机。

Money is the barometer of a society's virtue.
金钱是一个社会美德的晴雨表。

Only the man who does not need it, is fit to inherit wealth, the man who would make his fortune no matter where he started.
只有不需要财富的人才适合继承财富，因为无论从哪里开始，他都会创造出自己的财富。

People create their own questions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to look straigh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straight and see the road, and when you see it, don't sit looking at it—walk.
因为人们不敢直视前方，所以他们给自己制造了问题。而你需要做的是，往前看，找到路，当你看到路的时候，就别坐在那看了——开始往前走吧。

Run for your life from any man who tells you that money is evil. That sentence is the leper's bell of an approaching looter.
如果有人告诉你金钱是邪恶的，赶快逃命去吧。因为那句话是强盗来临的警钟。

Statism survives by looting; a free country survives by production.
政府主义靠劫掠而生存；自由的国家则靠生产而存在。

The hardest thing to explain is the glaringly evident which everybody had decided not to see.
最难解释的是那些显而易见，但大家却选择不去看的事情。

The most depraved type of human being is the man without a purpose.
最堕落的人是没有目标的人。

The purpose of morality is to teach you, not to suffer and die, but to enjoy yourself and live.
道德的目的是教你享受和生活，而不是教你受苦和死亡。

The question isn't who is going to let me; it's who is going to stop me.
问题不是谁允许我，而是谁会阻止我。

The right to life is the source of all rights—and the right to property is their only implementation. Without property rights, no other rights are possible. Since man has to sustain his life by his own effort, the man who has no right to the product of his effort has no means to sustain his life. The man who produces while others dispose of his product, is a slave.
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起源，而财产权则是让所有这些权利生效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财产权，其他任何权利都不可能存在。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活，那么，如果一个

人失去了对其劳动成果的权利，也就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手段。假若一个人的生产成果得由别人来处置，那他便是奴隶。

The smallest minority on earth is the individual. Those who deny individual rights cannot claim to be defenders of minorities.
世界上最少的少数派是个人。如果一个人否认个人的权利，那他便不能声称自己是少数派的捍卫者。

The spread of evil is the symptom of a vacuum. Whenever evil wins, it is only by default: by the moral failure of those who evade the fact that there can be no compromise on basic principles.
在基本原则上不能妥协。人们不能逃避这个事实，否则由于道德疏忽，邪恶会发生。邪恶的传播就像真空的特性，只有在该有的缺位时，真空(邪恶) 才会发生。

The truth is not for all men, but only for those who seek it.
真理不是给所有人的，它只给那些追寻它的人。

The worst guilt is to accept an unearned guilt.
最大的罪行是接受不应得的罪行。

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 issue：one side is right and the other is wrong, but the middle is always evil.
每种争议都分成两派：一派是正确的，另一派是错误的，但中间派永远是邪恶的。

To say "I love you" one must first be able to say the "I"。
要说"我爱你"，首先必须能够说出"我"字。

We can evade reality, but we cannot evade the consequences of evading reality.
我们可以逃避现实,但逃避现实带来的后果是无法逃避的。

Wealth is the product of man's capacity to think.
财富是人的思考力的产物。

When you see that trading is done, not by consent, but by compulsion—when you see that in order to produce, you need to obtain permission from men who produce nothing—when you see that money is flowing to those who deal, not in goods, but in favors—when you see that men get richer by graft and by pull than by work, and your laws don't protect you against

them, but protect them against you—when you see corruption being rewarded and honesty becoming a self-sacrifice—you may know that your society is doomed.

如果你看到，交易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进行——如果你看到，为了生产，必须从不事生产的人那里得到许可——如果你看到，钱不是流向商品的交易者，而是流向特权的玩弄者——如果你看到，人们不是靠工作，而是靠贪污和关系变得越来越富有，而法律不保护你却保护他们——当你看到，腐败得到奖励，而正直则成为一种牺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注定要灭亡了。